

高橋俊乘著

秦企賢譯

日本教育史

中日文化協會發行

書 叢 術 學

史 育 教 本 日

著 士 博 乘 俊 橋 高

譯 賢 企 秦

編 主 組 版 出 會 協 化 文 日 中

行 發 會 協 化 文 日 中

譯序

本書的初版，刊行於日本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增訂改版發行，昭和九年（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再版，昭和十五年（民國二十九年）三月第三版發行。本譯本即據最新的昭和十五年的版本譯出。

著述日本教育史，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對於日本的歷史，既須有深湛的研究，而同時對於教育學，又須有專門的修養。高橋俊乘博士是日本史的專家，同時對於教育學亦是研究有素，本書的盛譽所以歷久不衰，為各方所推許，決非偶然。

現在再不揣冒昧，將本書的優點，據譯者所知，略舉如下，以供讀者參考：第一，教育現象和其他社會現象，有其密切的有機的關聯。本書於敘述教育現象時，將各種社會現象，一并予以述及，因為這樣，讀者對於教育現象的進展的軌迹，才能獲致充分的認識。從這一點上說，本書可作專門的日

本教育史讀，亦可作爲簡明的日本社會史或是文化史讀。第二，歷史的敘述，必須有徵信。才能有價值。本書於敘述每一個教育現象時，必將各項有關史料，旁徵博引，詳爲闡述，務使學者能夠澈底了解。著者學問的淵博，至足欽敬。第三，本書以時代爲經，以各種教育思潮爲緯，層層敘述，使讀者一目了然。於江戶時代各派思想家的生平及其思想，介紹尤爲詳盡，彌足珍貴。第四，對於教育制度及教育思想，兼收並蓄，不偏不頗，深中肯綮，其他優點尙多。茲不贅述。

吾國介紹日本教育的文字，多屬零星片斷，未克窺其全豹，本書的譯出，或可略資補救。此種缺點，但翻譯亦是一件難事，爲翻譯者所懸爲目標的信、雅、達三字，事實上每多不易做到。譯者不文，就不敢以此自許，缺漏或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千祈原著者及讀者予以鑒諒，實所感幸。

再者，歷史是有繼續性的，所以以某年爲某時代之終，某年爲某時代之始，如西洋史以西羅馬帝國（The western Empire）滅亡的四七六年爲上古史之終，以東羅馬帝國滅亡的一四五三年，或丹第（Dante Alighieri）誕生的一二六五年，或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發現陸的一四九二年等年爲近世史之始等，原是不甚妥當的，但不失爲便於學習的一種方法。學

習日本史，他須稔悉其年代，始可頭緒清晰，便於記憶。吾國史家如能編著日本歷史年表或中日歷史對照表等書，其貢獻必極偉大，而其裨益於本書的理解，亦非淺鮮。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

譯者

課
序

序

人生的歷史，是人生對於生活問題的處置的連續。所謂生活課題，並不是自然地展開在人生之前，而是人們自身所創建。人們如果停止了繁殖的機能，那末必然要歸於滅絕；人們如果不再創建其生活課題，那末文化的萌長也就成爲不可能。在混沌的人生的漩渦中，以及在悠久的自然的懷抱中，想找出若干生活課題，那末精神的貫注以及注意的集中，自屬必要；換一句話說：作爲生活向上力的「無限理想性」的存在和活動，是不可缺少的。此種力量，也就是處理並解決生活課題的理性和努力。澈底地說：所謂「無限理想性」是產生並培育生活課題的「聖母」，同時，也就是在重重葛藤中燃着理想實現的燈火而向前邁進的「神父」的威力。因爲這樣，人類才與僅渡着本能生活的一般生物區別出來，以創造高度文化的歷史，向着無限的方向不斷前進。在此種意義之下，人類的歷史，便是爲實現其理想而努力的歷史。

教育史就是在此種意義下的人生史的一部份。教育的生命，是在人類人格發達的過程中，尋求向上的理想和理想的實現。教育史在某一種意義下，便是人格發達過程的一面。人格發達的過程，和人類的發達，以及國家社會的發達，是有着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的，所以對於教育制度及其思想變遷的研究，從世界的立場說起來，便是關於人類向上的研究，從一國國民的立場說起來，便是關於一國國民的發達的內面的研究。

歷史上的事實，雖已成爲過去，但其含蘊在底流的生命，却和現代及未來有着連鎖的關係。歷史的研究，從此種意義說起來，也就決不僅限於過去的世界。教育教化的進展，時刻在創造其歷史，而創造下來的歷史，再繼續創造出次代的歷史，此種有創造性質的歷史，才是有價值的歷史。缺少創造性質的偶發事件，被時代的煙波掩埋了去，成爲沒有生命的過去的死物。從此種意義上說起來，教育史便是創造教育生命的歷史。

在教育史中所論述的，以指導時代的教育教化的制度及其思想變遷爲主，但這並不是教育史的全體。要認識拿破崙在歷史上的意義，對於和拿破崙共鳴並協同作戰的麾下兵卒在歷史上的

意義，也應當予以認識。要憧憬裴斯托洛齊在歷史上的意義，對於向裴氏精神表示共鳴的若干教育者在歷史上的意義，應當予以讚美。英雄的歷史以及民衆的歷史，相助相成，構成一個整體的人生史。民衆的文化民衆的習慣以及民衆的風氣，是民衆從有意識地或是無意識地將「指導理念」予以生活化起來的；所謂時代的「教風」是該時代一般教育者以及民衆將教育化的理念在生活中予以具體化起來的。前一個理念固足以直接產生次一個理念，而理念在生活化時的實際狀態，又爲暗示產生清新理念的強有力的動機。根據此種意義說起來，現代教育者的本身，便是創造歷史的一員，便是暗示新理想和新理念的力量。因此，教育者的研究教育史，不僅要研究教育活動的全體，還應將自身作爲全體的一部而加以研究。這樣研究的結果，便可以了解全體和自身間的關係。教育史的研究，並非研究過去，而是有着研究現代和未來的價值。同時，教育史的研究，並非僅是客觀地研究他人的事業，也可以解釋爲教育者對自身的研究。這樣，才可以了解「存在於一切以及超越於一切」的全體的精神，像舒帕蘭所說的那樣。

最近，敬愛的高橋文學士，脫稿了日本教育史，爲教育界放一異彩，本人於欣喜之餘，因述關於

歷史的感想，以祝本書的刊行。

大正十一年十二月

洛北塔之段

小西重直

增訂版 自序

日本人是富於忠君愛國之念的國民，這是日本人全體的信念。雖然這樣，明治大正時代的日本人，對於自國的歷史，却僅有一點極爲貧弱的知識。一談到教育史，像是僅有西洋教育史似的，至於日本教育史，則委於少數的研究家，一般教育學者和教育家，對於日本教育史，似是並不關心。當然，在這裏，日本教育史的研究家本身，也是負着一部份的責任的。

余自愧淺學，曾於大正十二年出版日本教育史，請求賢達的批判，幸得重版，實出望外。但原稿大抵係從學校的研究室和圖書館借得參考書，匆匆寫成，不免有誤寫的地方；加之余既不善校對，印刷所又在東京，余之居所則在京都，所以雖加校對，而在微細的地方，印刷工就未能悉遵余意。因這種種原因，所以在初版中，就有若若干謬誤，而且誤植之處尤多。

當教育史的專門家閱讀初版時，是可以立即發現錯誤的，所以余之負罪尙輕，惟當並不是專

門家而閱讀本書的時候，或許會予以誤信，言念及此，深感不安。因為這樣，所以當初版刊行之後，深願於短時期內，重刊改訂版，而其後，由於多數學者的努力，日本教育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步。余自初版刊行之後，也作進一步的研究，在思想上也有所改進，因思追隨學界的進步，將本書改訂。加入余之新的研究，校正初版的錯誤，特別是在初版中，明治維新以後的教育史資料，尙付缺如，對於擬窺日本教育史全貌的人士，諸多不便，因亦擬予補叙，重新裝訂，再行問世。當於去年六月，將此意商諸發行書肆的主人辻本君，蒙大加贊許，因即於同年七月起，着手增訂。

本書的結構，當然承襲前書，但章節則已多數變更或增加，文字亦復重寫，加以增補，且因鑑於前書的失敗，故將參考書的大半列諸座右，校對工作亦復於可能範圍內，嚴密將事，甚達五校之多。文句亦務求明晰。但因僅利用一些公務的餘暇作為著述的時間，所以未克迅捷，到了最近，校正的工作，才告完成。

在著述並校正時，已盡力之所及，審慎將事，其間因未加注意而發生的謬誤及誤植，或尙難免；而文字庸拙，使讀者發生誤解的地方，或亦難保其必無；特別因才力菲薄之故，對於全書內容，即在

本人自身亦仍頗多不滿之點。如蒙讀者諸賢，賜以指正，將來自當加以訂正，不稍怠懈。

關於現代的敘述，至大正末年爲止。其中關於明治末葉以後學說的變遷，僅選擇極重要的思潮，加以簡明的敘述。對於今日尚在活躍的諸人的學說，筆端常有述及，爲着德義上的關係，所以力求避免批評。當然，應予敘述的人士及其學說，而全予省略者，恐亦不在少數。這是著者的見聞未週，特在此處道歉。再者對於今日在世的人士，均於姓名下添一「氏」字，以表敬意。

本書的完成，全賴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諸先生的指導，以及諸同學的誘導，特別是小西重直先生，長年賜以週詳的指導，且閱竟全書，賜以序文，特乘此機會，表示熱烈的謝意。

昭和四年四月

高橋俊乘

增訂版 自序

日本教育史目次

譯序

序

增訂版自序

第一章 日本教育史的概念及資料

第一節 日本教育史的概念

第二節 史料的選擇

第二章 太古的教育

目次

520.931
642
2

71552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第二節 家庭生活與教育

第三節 教育的理想及其機會

第四節 漢學及佛教的傳來

第三章 奈良時代的教育……………三〇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第二節 家庭生活與教育

第三節 大寶令的學制 附中國古代的學制

第四節 學校外的教育

第四章 平安時代的教育……………五二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第二節 家庭生活與教育

第三節 大寶令學制的變遷 私學

第四節 貴族教育的內容與方法

第五節 武士的興起 庶民的教養

第五章 鎌倉時代的教育……………七四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第二節 家庭生活與教育

第三節 道德的發達 敬神崇佛的風氣

第四節 武士道的發達

第五節 古典教育

第六節 武士與平民的教養

第七節 足利學校與金澤文庫

第八節 女子教育

第六章 室町時代的教育……………九六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第二節 家庭生活與教育

第三節 道德心信仰心與教育

第四節 朝臣及武家的教育

第五節 寺子屋（學房）的發生 庶民的教養

第六節 童話的發達

第七節 女子教育

第七章 江戸時代的教育……………二七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第二節 文運的復活

第三節 天主教與教育事業

第四節 中國儒學的變遷

第五節 幕府的獎勵與學術的大勢

第六節 朱子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藤原惺窩

第二 雨森芳洲

第三 新井白石

第四 室鳩巢

第五 山崎闇齋

第六 中村惕齋

第七 貝原益軒

第八 香月牛山

第七節 陽明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中江藤樹

第二 熊澤蕃山

第三 中根東里

第八節 古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伊藤仁齋

第二 荻生徂徠

第九節 武士道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山鹿素行

第二 吉田松陰

第十節 折衷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細井平洲

第十一節 國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國學的發達

第二 本居宣長

第三 鈴木朗

第四 佐藤信淵

第十二節 兒童的養育與教育

第十三節 朝臣的教育

第十四節 武士的教育 幕府經營的學校 藩學

第十五節 庶民的教育 寺子屋(學房) 鄉學 私學

第十六節 社會教育

第十七節 女子教育

第十八節 江戸時代的教育思想總說

第八章 明治大正時代的教育……………二五

第一節 時代的概觀

第二節 明治初年的教育

第三節 學制頒布以後的教育

第四節 教育令發布以後的教育

第五節 國家主義教育的確立

第六節 甲午戰役以後的教育

第七節 日俄戰役以後的教育

第九章 結語……………三五

日本教育史

第一章 日本教育史的概念及史料

第一章 日本教育史的概念

文化的發達 從深山間林木的葉子上落下來的水滴，集積起來，成爲溪，成爲淵，成爲貫穿岩石的深谷，更多量地集聚起來而成爲河道，再流出山嶽，放流於平野之上；這時候，本來有如飛矢的急湍，已經變成白帆相望的緩流了。在山間絕少利用的河流，在平野間，却能灌溉無數田畝以裨益無數住民。這道河流，還有着多數支流注入，水愈多而效用益大，流到最後，出現若干分流，構成了三角洲，而注入大海。歷史也有如河流一樣，從太古草昧未開的時代，進至今日文明開化的時代，其間



決不僅限於自國固有文化的發達。深山中的細流，因集聚及併合了許多細流及支流，就形成了大河長流；一國文化的發達，也正與此相似。在固有文化之上，吸收入四隣的文化，而形成極偉大的文化。日本文化的發達，也不能外此。當然，日本是接受了受中國影響而以發達起來的韓土文化的刺激，更蒙受了中國本土的文化的影響，再接受了經由中國而來的印度文化的影響。中國的影響，自漢代以後，歷世不絕。到了近代，又受到了歐美文化的有力感應，直至今日。依然深深受其影響，此項影響，即在未來，恐仍將極為有力。日本的文化，雖如是深受外來文化的感應，但絕不能斷言固有文化的全無。此項固有文化，或許是貧弱無力；但正因為有此文化，才能接受外來文化。外來文化的所以能夠開花結實，就是因為此項固有文化的根，深固地蔓延於地中的緣故。此項固有的文化，其姿態及面目，時至今日，殆已不易明瞭。也有人認為日本書紀和古事記的神代的記事，以及繼續此二書的極上代的記事，是表明固有的文化的。當然，在此等記事之中，確也含有固有的文化；但因上述二書，是在多量接受朝鮮以及中國六朝隋唐的文化之後編纂起來的，很多混雜着外來的文化，所以要辨別外來文化和固有文化，便極為困難。即在漠然認為固有者的中間，却也意外地有着輸入

的在內。在這裏，祇有下列一事，可以說沒有錯誤的，這就是歡迎並學習外來文化而使爲已有的精神，是極純粹地屬於固有的。精密地說起來，因外來文化而獲得發達的精神，是激動起來了。再經平安朝鎌倉時代以降，此種精神，也多量地接受外來刺激而發達起來。故在古代，此種精神，原是固有的，這便是日本人獨特的精神。即在以後，雖然文化的內容本屬輸入的，但一經輸入，便日本化起來，使成爲日本人的所有，此種精神，也自是日本人之所固有，至少也可說是最近於固有的。

日本教育史研究的對象 關於日本教育的發達，祇要認教育與政治經濟以及學術宗教有同等地位而係文化史的一面，那末上述的觀察，當然可以適用於教育。太古時代的教育事實，殆非有意識地進行的，其後受了朝鮮和中國的刺激，才有顯著的進步。而中國的影響，尤其是廣泛而永久。在中國的影響之上，再益以佛教的巨大影響，在此等背景之下，教育事業，愈見進展。到了江戶時代，佛教的影響，趨於衰微，中國的儒教，再度爲中心勢力，但到了明治維新以後，歐美的教育學說及其實際事業，經熱烈地介紹研究模倣起來，而蔚成今日的盛況。在江戶時代，儒教的勢力支配了思想界；多數鴻儒碩學，樂育英才，在道德上和教育上，成就了許多事業。但此澎湃巨濤的勢力，自揭開

明治維新之幕後，便告消聲匿影，今日的教育界，較諸江戶時代的教育，竟判若晝夜有如另一世界。在日本教育的連續發展上，難免有一旦發生間斷的感覺。不論是教育制度或實際事業，前後似乎絕不相同。但是在教育史上，如果要尋求自德川時代以至太古時代一直連綿不斷繼續發展下來的東西，尋求的結果，所能找得到的，決不是表面的教育制度學校設備，以及教育著作等，而是產生此等外表現象的內部的力量，此種內部的力量，即是日本民族累世努力於教養其子孫的精神。此種精神，有時以佛教為背景，有時借助儒教的力量，到了現在，又模倣歐美的文化，以實施教育。惟有此種精神的發展，才是真正的日本教育史。

如果以教育解釋為某一個時代的人們將其獲得的文化傳給次一時代的方法或形式，那末在無論任何時代，所謂教育，即是文化發展的原動力。沒有教育的發達，就沒有文化的發達。認教育為僅存於文化人間的社會現象，視野未免過狹。就是在野蠻人之間，苟能自覺地稍稍促進文化的發達，就可說在那一種族之間，也正有其教育的存在。日本從過去以迄今日，所以能夠不絕地發展起來者，就是因為此種意義的教育，不絕地進行，而且時常擴張和發展的緣故。在以教育作為文化

的原動力而研究的時候，對於世世代代的人們想以文化傳給子孫的活動的變遷，亦即從事教育的意志的歷史，自是應當加以研究的。

日本教育史，以前是曾經以種種方法研究並發表了過來的。第一，便是對學校及類似學校的公私設施的制度、武士道的發達、洋學的發達等的沿革的研究；第二，便是對為政者或教育上的先覺者以道德及學術的立場指導國民或後覺者的思想的研究。簡單地說起來，或許也可以說前者是教育制度史，後者是教育學說史。如果認教育只是文化的一個樣相，特別僅認歷史只是過去事實的集積，那末對於教育史的研究，上述的兩個方法，並無不妥，而應當予以承認的。但是，如果以歷史為人類發展到現代的「價值生活」的痕迹，且為暗示今後永久伸展的方向者，那末歷史便應當是適應現時的「價值生活」而予以研究。歷史的研究，是過去的研究，但同時也是在某種意義上的現代研究。研究過去，在過去中尋求現代的進行的指針，且以資助未來的參考，如是研究，才有價值。「現代」是「過去」伸展過來的尖端，不知道「過去」便無從理解「現代」。

但是，現代日本的教育，大部分是歐美教育的輸入、模倣或是脫胎換骨。江戶時代的學制，現在

並未繼承，大寶令的學令更非今日學校法規的淵源。寺子屋（學房）並不與今日的小學校直接連續。維新前教育家的努力和今日教育家的努力，各異其系統。因為這樣，所以研究西洋的教育學說及其學校制度，便可以發現許多今日日本教育的直接的淵源；但是，如果以日本的教育史，與西洋一般的教育史，作相同的結構，却就難以贊同。西洋一般的教育史，都是將內面的教育學說的變遷，和外面的學校制度的沿革，一併予以記述，日本自過去一直延續下來，即在今日仍為日本教育的基礎的，便是上面所說的「從事教育的意志和精神」。著者就想研究此種意志的源流。

教育學說史和制度史，自是必要，但「從事教育的意志」的發展史，却更為重要。當然，此種內面的意志和外面的環境相凝之後，就形成歷代的學校制度和教育思想。如果以後者（外面的教育環境）為客觀的教育史，那末前者（內面的教育意志）便是主觀的教育史。當說明主觀的時候，客觀就成為說明的一種手段；在說述內面意志的根本時，總得採用客觀的制度以及思想，但著者的目的，却在主而不在客。本末輕重之差，原是顯明地存在着的。

再者，還有所謂教化史、政教史以及文教史者，主要在寫出日本過去的民族文化（道德及學

術)怎樣進步,先覺者怎樣誘導。在這些著述中,很多能週詳地道出「從事教育的意志。」但此等書籍中的意義,未免過於廣泛。教育學中所限定的狹義的教育,較諸上述諸項書籍所說的教育,意義更爲狹小。我們的教育史,是教育學的一部。但是在上述各種著述的態度中,自有其長處的存在,如果以此種長處與上述的客觀的教育史折衷起來,那末著者所希望的日本教育史,或許就可以出現了。

第二節 史料的選擇

國史專攻者在研究教育史的時候,對於史料的處理,雖能駕輕就熟,但不免缺乏教育學素養的遺憾;反之,專攻教育學者在研究教育史的時候,對於史料的處理,却又頗多缺點,甚至詳加思考而獲得的論斷,還不免仍欠正確。以前在日本發表的日本教育史,幾乎可以說很少能脫出上述兩種傾向中的某一種。求欲兩方面都能優爲之,這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所以我輩教育學的研究者,應當盡力傾聽國史學者研究的結果,且將其論斷,從教育學的見地加以考察。

例如日本書紀卷九載：神功皇后征伐新羅，新羅王降服之後，遂入其國中，封貴重之府庫，收圖籍之文書。

於是就有人根據此項記事，斷定當時已有「收圖籍之文書」之事，那末當時以前亦即王仁渡日以前，漢學定已有若干的流行。但如果仔細地想，即可知此項文句，僅是從史記的蕭何世家等探取得來加以修飾而成的，並沒有像此文句所云的事實，因此，此種文句，對於上面那樣的論斷，並不能成爲任何的證據。

再舉一個例子。菅原道真當舉世流於漢土崇拜之時，獨慨然於國民精神的應予注重：作如是論述的人們的論據，便是菅家遺誠，特別是該遺誠中的下述文句：

國學殊重要，蓋雖欲涉古今而究天人，設非和魂漢才，豈能闕其闕與哉。

但菅家遺誠，恐係室町時代的著述而托名於菅公者，而且對於上引文句現在還有考證，說是當幕末時竄入的（註）。由此看來，此項論斷，也就不攻自破了。在教育史的研究中，像這樣的例子，所在都有。因此，對於史料的取捨選擇，我們必須傾聽國史研究家的忠告，並應盡力引用正確的材

料，以圖獲得正確的論斷。

註：在文學士加藤仁平氏著的和魂漢才說中，有詳盡的考證。

教育史從一方面看起來是制度史，從另一方面看起來是思想史。制度史的史實，可以從歷代的詔勅、律令格式、官符、朝廷及貴族的記錄、日記、文書等中找得。至於思想變遷的歷程，也可從此等史料中獲悉，但有時在小說、歌集、隨筆雜書等難以認為正式史料者中，反能發現確實的論述。在此等難以認為正式史料的著述中，很多是年代不正確，記述誇張，或者是偏於一面之詞。特別是小說，並不表示任何確實的史實。但根據此等書籍，却可以知道某一時代的風俗以及思潮。官撰的歷史以及貴族的記錄文書等，易於流為表面的文章；而稗史雜書，反能深刻地揭穿出事實來。例如有人推測當平安朝中期有才學的女子輩出之時，女子和男子同樣能作漢詩，能讀漢文，他們引出紫式部和清少納言為最顯著的例證，但此項推測，為紫式部日記明白地推翻了，該日記中說：

堆積着許多書籍的人（指夫宣孝）亡故之後（長保三年卒），就沒有人去翻檢。有時覺得寂寞，抽出一二冊來閱讀，女伴們就發出惡言：「讀書是要薄命的。」女子讀些什麼漢

籍。以前連讀經（佛經）都要被禁止呢。」

一由此可知平安朝中期的女子，普通是不讀漢籍的，紫式部和清少納言，僅屬例外。包蘊在社會裏層的文化的記述，不易見於官樣的歷史記錄，却反見於私人的日記或隨筆之中。

這樣看來，研究教育原理的研究家和西洋教育學者的學說的人，要想在另一方面，從事於日本教育史的研究，是不會有成績的。反過來說，日本史學者所著的日本教育史，如果從教育學的方面加以觀察，也定有許多感到不滿。在將來，一定會有這麼一個時代到來，這就是需要對教育學和日本史同樣有素養的人，去研究日本教育史。而且，也不是僅賴一二人之力所能完成的事業，必須許多人各從所好，分別擔任，或依時代分，或依教育的部門分，或依教育思想家的學派分，如是分工合作，始能進入成功之域。但此種希望，前途還很遼遠。

附記：本書自初版問世之後，瞬息已經五載（自大正十二年至昭和四年）。今日與初版問世之時，迥不相同，研究日本教育史的人，已漸見增多。在帝大教育學的卒業論文中，以前寫日本教育史的人寥寥無幾，現在却是不在少數了。

第二章 太古的教育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傳說的時代 嚴密地說起來，日本推古天皇以前，是傳說的時代。成爲上代研究的史料。日本書記和古事記，是在推古天皇時代約百年之後編纂起來的。作爲該兩書主要內容的古代傳說，大約終止於仁德天皇時代，所以此等傳說，可以推論爲自仁德天皇之子履中天皇時起，以迄雄略天皇時爲止的一個時期中整理起來的；此種推論，想屬正確。（註）當然，在履中天皇以後的記事，中，也有傳說的成份；而且該兩書自經上述的整理工作以迄奈良時代的編纂爲止，其間約經二三百餘年，自當時整理以後，必然經過數度的改作和增補。如此看來，在履中天皇以後的記事，中，縱多正確的事實；而以前的記事，在長期間發達起來的傳說中，究竟含有多少事實，殊難判別，這是不待煩言的。且縱令是事實，但分隸於各時代的記事，究竟是該一時代的事實呢，還是前一時代或是後一時

代的事實呢，又往往極難下正確的判斷。新羅王子天日槍歸化的傳說，就是一個例子。日本書紀言其歸化在垂仁天皇時代，而播磨風土記（與古事記及書紀約為同時的著作）則謂為神代。兩者記述，總不相同。如果以書紀所載新羅國當垂仁天皇之父帝崇神天皇時代興起之記述為正確，則風土記之說，自是不能成立。關於此點，書紀所載是說得通的，但在書紀中又有着當垂仁朝之際日槍的玄孫出使常世的記錄，這又是不合理的了。又有同一事件，而先後予以兩度記載的，例如雄略天皇之時，兄媛和弟媛自吳赴日，而幾乎是同樣的事情和人名，却又記述於應神天皇的時代。關於這一點，正如本居宣長所指摘，記述於應神朝方面的，想是並非事實。

註：關於此事，請參照津田左右吉博士的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研究。日本文學講座中的次田潤學士的古事記日本書紀研究也是出色的作品。

自覺教育的缺乏。但是，在許多場合，却不必定要從傳說的濱邊拾取「真實之貝」。在並非史實的傳說中間，也可以獲悉古代人的思想、信仰及風習，這是因為傳說是從古代人的集合心理產生出來的。在太古時代，教育是有意識地進行的還是怎樣的，如果從傳說中探求答案，那末古事

記和書紀兩書的字裏行間，都找不到在應神天皇以前「有意識地進行教育」的痕跡。可證明此種事實（指有意識地進行教育）的史料，裏面並無所傳，而反對的史料，却是數見不鮮。播磨風土記的飾磨郡條載：

昔大汝命之子火明命，性恣肆。父神引以爲患，欲棄之。乃赴因達之神山，命其子汲水，乘其未返，駛舟遁去。

對於性行不良之子，不施教育，且放棄之，這是明白表示出缺乏改善孩子品性的希望及要求。將蛭兒流於海上的傳說，以及將素戔鳴尊追放至母的住所根之堅洲國的傳說，和上述一節，實具着相同的傾向。

當時文化程度低，欲望小，生活物資又比較豐富，祇須稍稍勞動，就可容易地得到食物及其他日常用品，所以古代日本人，是無憂無慮地生活着的。加之因爲沒有優秀的異民族的壓迫，所以沒有民族或國民的自覺，也好像沒有顯著的愛國心。日本的古代人，是並不怠惰的，但奮勵努力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勇於冒險以達成最後光榮和希望的堅毅心，却比較缺乏，幾乎沒有苦悶，也幾乎

沒有反省。度着輕鬆的和平的樂觀生活。在那個時代，大約沒有思想和決心，來自覺地教育後繼者，使之成爲比較自身優秀的人類。

但在應神天皇時代（西曆第四世紀末葉，中國東晉時代）是否事實固是另一問題，而當時有着有名的阿直岐及王仁傳入儒教的傳說。其後有意識的教育，像是逐漸發展起來。而足以證明此項發展的史料，也漸見增加。倘把這種事象，和自王仁以後不出百年即應神天皇之孫履中天皇時起開始整理傳說的事跡對照起來，便可察知大約從此時起，日本人已經自覺。這是因爲日本自建國以來次第增厚起來的國力，到了此時，已廣被了舊日本全土，且發展勢力至朝鮮；而中國文化，在以前固已有所傳來，而自此以後，更有大規模的輸入。

善惡的彼岸 很多人有着這樣的見解：王仁的渡日，是日本傳入儒教的發端；在王仁渡日以前，日本已經具有儒教中所闡述的優良的道德，有忠孝仁義之實，僅是無此名稱罷了；自儒教傳來以後，才加上了忠孝仁義的名稱。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便是在此種立論下寫成的，賴山陽的日本政記應神天皇章節內，特別記述此種意義，而本居宣長的葛花卷上，也有同樣說法。即在今日，抱此

同一見解之人，亦復不少。但某種事物實際既已存在且完全表露於日常生活中，却偏偏尙無名稱，豈非大可訝異。關於仁義道德，正復相同。當然，著者亦不信在日本古代全無道德。因爲全無道德的狀態，社會決無由保存。在上古的日本，大概道德諒已存在，但未充分發揚。在他們的道德觀念中，善惡的觀念，尙未發達。他們並不住在明辨善惡之鄉，而是住在善惡的彼岸。自從儒教和佛教傳入以後，對於道德以及教育的理想之眼，才逐漸展開。但這並不是一躍而起的，却是日本人。歷代堅苦奮鬥得來，而有今日的成就，這實在是日本人祖先慘澹經營的賜物。

同樣地，在應神天皇以前，也不是沒有教育的，無意識無自覺的教育，定已存在。如果對孩子完全不予教育，那末孩子較父母或許會惡化而平凡。日本不絕地進步起來，是教育的賜予。根據考古學上的研究，可知雖在未開化的時代，也因時間的展演，而有顯著的文化的發達。這卽是表明教育的存在。如果沒有教育，那末當孩子成長之時，便不會與父母相等或是較父母優秀，而孩子的時代，也不會較父母的時代進步。雖然鮮有自覺的教育，但在日常生活之中，有着無自覺的教育的存在，這是無可疑義的。我們的研究，就想從此「無自覺的教育」的時代開始。

第二節 家庭生活與教育

古代的日本人，在男女結婚之時，另建「妻屋」。夫婦固有同居妻屋中者，但多數僅使妻居之，夫則另住他處。

因夫婦別居，夫婦愛情，易趨冷淡，夫婦結合，未臻強固。設結合因故破裂，男子即另求新戀。乳兒當然由母養育，所以所生子女，都由母撫養成長，不過有時亦與其父晤面而已。父子關係較諸母子關係，遠為疎淺。所以說到「親」字，（一）指祖先全體；（二）在指直接之親時，不併稱父母二人而僅指生母。孩子多承襲母名，承襲父名的，極為罕見。所生之子，如同父異母，則視若路人。故異母兄弟，不稱「同胞兄弟」。（古事記傳卷十）由此看來，古代的家庭教育，係由母管理的。雖在今日，幼兒接觸母之機會仍多於接觸父之機會，但尤以古代為甚。

當生育之時，特造「產屋」，妊婦即入內產子，故所請「造產屋」其意義與生育相同。

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並不記述一般民衆的生活，於此不妨引用萬葉集的材料。在萬葉集中，關

於孩子動作的動詞，有如下述：

哭	一七
爬	二
吵	二
乞乳	一
母抱	一

其中「哭」字特多，大概是該時代的人，對於孩子的哭泣，極爲注目。這或許是因爲育兒法拙劣之故。但因考古學曾經發現可以視作玩具的小土器及小泥娃娃等，因此可以相信當時已有玩具。

第三節 教育的理想及其機會

缺少自覺教育的古代日本人，也是希望成功有用的人和偉大的人的。然而怎樣才算偉大會做什麼才算是有用的人呢，在這裏大概有着兩個理想。其一是善於事神祭祀，其二是長於武勇。

事神的教育 上面已經說過，當時「親」之一字，（一）係指母親，（二）係指祖先全體。而不論（一）之場合或（二）之場合，均相當於「祖」字。反之如言「子」字，則係指子孫全體而言。所以如果做照漢字的用法名事「親」之事爲孝，那末當時的盡孝於「親」亦即是祭祀祖先全體。神武天皇於卽位的四年二月，在鳥見山祭皇神天神時下詔：

我皇祖之靈，自天降鑒，庇護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內無事。因郊祀天神，以申大孝。

諸氏的祭祖神（氏神），如中臣氏祀其遠祖天兒屋根命於河內的枚岡神社（大阪府中河內郡枚岡村），自奈良時代起祀於奈良的春日神社。天照大神爲日本人全體的祖先，奉祀於伊勢五十鈴川的旁邊。

崇拜遠祖同樣對歷代的祖先也非常尊敬。當時以祖先以來傳下的世襲的職業，稱之爲「名」。

註：關於「名」的詳細說明，請參看本居宜長的古事記傳卷三十九及歷朝詔詞解。

崇拜祖神及累代的祖先，自然會尊敬氏的今之主人卽氏之至尊。因此，日本人全體崇奉日本

人全體的祖先的天照大神之心，也就成爲崇拜今之天皇的心。所以，敬神和忠君是同一的。仰奉天皇爲神，這是日本古代普遍的思想，推古天皇八年，新羅任那二國之王所奏上的表文中也說：

在天上有神，在地有天皇，除此二神之外，更有何可畏者哉。

由此可知，卽朝鮮人，也是仰奉天皇爲神的。

古代的日本人和其他古代國民同樣，宗教心極爲強烈。認事神較任何一切爲重要，一朝有事，大至國家的事變，小至一家一身的吉凶，都要伺候神意，仰求神助。政治讀作「マツリゴト」也足徵日本初期的重要政務，係以祭事爲主。

武事的教育 第二個理想，便是長於武勇。在未開化的時代，狩獵是獲得食物的主要方法，武勇實屬必要。又因當時有部落與部落之爭，大和朝廷與地方之戰，注重武勇，自屬當然。當時皇子中嗣承皇位者，似多屬長於武勇者。

教育的機會 然則上述祭祀和武藝的練習，是怎樣進行的呢。在上面已經說過的缺乏意識教育的時代，自難想像有着特別的方法。雖然也許並非全無，但縱或有之，也恐僅係極偶然的稀有

的事象。一般地說，此種練習，大概是在下述兩種機會下進行。其一便是職業的世襲，其二便是傳說。古代稱同祖先的血族團體爲「氏」，「氏」中有一「氏人」及屬於氏人的一部曲之民，「凡此均由在其上的「氏之上」支配之。氏人與部曲之民，似非直接朝廷之民，而爲氏之上的私有。部民構立一戶，營獨立的生計，終身舉家隸屬於氏族。

氏併氏人及部民爲一團體，成部落，部落大了，就重新尋求土地，俾便殖民。各部落都建神社，祭祖神。例如齋部氏本殖民於四國的阿波，更移至房總地方，他們就在阿波建忌部神社，在安房建安房神社，以祀祖神。

因爲這樣，所以氏人和部民，從孩提的時候起，對於祭祀的式例典故，就看慣聽慣了。從前各家舉行「新嘗祭」均閉戶不與他人來往，所以孩童似亦參加幫助。氏既成一個團體，但因當時經濟組織未週，交通不便，所以普通的日用品，想係自給自足。而且諸氏各有專門的職業，代代世襲，從事一定的勞役，並將特定的生產品，提供於社會，獻納於朝廷。除日用品之外，對當時屬於奢侈的物品，似亦力求自行供給。根據日本書紀的雄略天皇卷，可知當時有力的諸氏，曾有役使秦氏的部民之

舉秦氏係善於養蠶織絹之氏，當時的貴族珍愛絹布，認從秦氏之手買取，殊屬不便，於是想將秦氏之民，分取若干於己方，使爲自己的部民，而令其供給絹布。由此可知各氏之民，從事於生活上各項工作，而日用品大概是自行供給的。氏人及部民，一生屬於氏，故自幼見聞親長的行事，職業上的知識不必說，且亦獲得了生活上必須的普通的知識和技能。

氏族除成爲知育的場所之外，同時還可使知祭祀的典例，即關於親子，兄弟，夫婦，主從間的道德，亦可於無意識中接受感化。而對於宗教教育上及德育上更予以有力的效果的，便是講述傳說及神話的風習。

後世到平安時代爲止，有所謂「語部」的一定的職業，當舉行「大嘗會」的儀式之際，應召而來，有節奏地朗讀着古代傳說。再從種種史料考察，可知此種風習，在太古時代廣行於民間，當時不論舉行任何儀式，均將古代傳說，高聲地有節奏地予以背誦。人們時常聽聞到皇室的事蹟及祖先的功名，就記憶起來，而且奮發了家族的精神和愛國心及尊王心。此種情形，和希臘人的聽聞賀曼格斯及赫筱桃斯的史詩的誦讀，由是養成國民的志操，正屬同一事例。

女子教育 關於女子教育，難於發現特別的理想，大概和男子並無極大差異。歷史上所傳的女界偉人，都掌理祭事，長於武勇。

第四節 漢學及佛教的傳來

漢學的傳來 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應神天皇卽位十五年（日本紀元九四四年）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因阿直岐精通經典，天主任之爲太子菟道稚郎子皇子之師。某日，天皇問阿直岐曰：「汝國有勝於汝之博士乎？」對曰：「有王仁者最優。」天皇因遣上毛野氏之祖荒田別及巫別赴百濟，徵王仁。翌年，王仁渡日。皇子以之爲師，學典籍。再根據古事記的記載，王仁於此時獻納論語及千字文。

日本自建國以來蓄積的國力，至神功皇后之時，及於大陸的一角，而日本的國史，也就和世界史相融接。在此以前，朝鮮中國與日本間的交通，顯已存在，所以漢字也必已有若干的輸入。但日本國民的自覺，當時還未能予以深切的接受。到了神功皇后的時候，不論在政治上或制度上，國民均

已有顯著的進步。從此時起，似已開始輸入中國的典籍，使用漢字。阿直岐及王仁的傳說，即是顯示此種文化現象業已存在的一個指針。

但書紀的年紀有所錯誤，這是周知的事實，根據專門家的研究，當應神天皇之頃，約有百年之差。在續日本紀所載桓武天皇延曆十年（一四五二）文忌寸最弟等上奏之文中，謂當百濟的久素王之時，貢舉王仁；而在延曆九年管野真道的上奏文中，却寫作百濟貴須王。所稱久素王或貴須王，定係同為韓史中的近仇首王。此王自日本紀元一〇三五年起至一〇四三年止，頗有權力，王仁的渡日，定係此一期間。此時中國當東晉之世，其歷史係確實者，而百濟的歷史，係以此為基礎而寫成的，所以關於王仁的年代，自以朝鮮的史實為可信。

管野真道的上奏文，有如下述：

應神天皇命上毛野氏之遠祖荒田別出使百濟，搜聘有識者。國主貴須王，恭奉使旨，擇採宗族，遣其孫辰孫王，隨使入朝。天皇嘉之，特加寵命，使為皇太子之師。

雖然是同一傳說，但在該奏文中，却非王仁而是辰孫王。因此時係歸化人極多的時代，故本居宣長

下一折衷的判斷，解說爲二人同時渡日（古事記傳卷三十三）王仁的傳說是書記以下許多史書採取的通說；而另一方面，真道是著名的學者，其言當不致有僞；因此理由，兩說殊不容偏廢，而折衷說也就是妥當的了。再者現存通行的千字文，其時在中國尙未出現，所以當時傳入的（註）大概是類乎千字文的凡將篇、太甲篇、急就章之類。

註：此係新井白石之說。今日贊同此說者甚多。那珂通世遺書中的外交釋史第三十二章載有詳說。伊勢貞丈謂怒係孝經（安齋隨筆）

關於王仁渡日的傳說，有如上述，其間頗多謬誤和矛盾，所以也有否定王仁存在的人。（註）此項否定，或許反見較近事實。總之是將經多數人在一個並不短暫的期間內傳入的東西，歸功於某一人，而此傳說就因是發生了。

註：請參照津田左右吉博士的關於百濟的日本書記的記載（古事記及日本書記的研究附錄）

漢學的發達 縱使否定了王仁的傳說，總之在此期間，已有漢學和儒學的傳來，當係事實。這是經過多數人之手，而且在很久的時期中傳來的。當時的歸化人及其子孫，被雇於朝廷及其他所

在，擔任書記之類。最爲顯著的，便是有名的以王仁爲祖的西文首氏，以阿知使主爲祖爲東文直氏，和弓月君之子孫的秦公氏等。東西文氏，在其下有「史部之民」，專以文筆奉仕朝廷。在此約二〇〇年前，約當三國之世，崇神天皇的時代，已有任那（朝鮮的一部）的服從；再上溯而至漢代，中國的史籍（後漢書東夷列傳等）有倭人與在朝鮮的中國殖民地相往來的記述。因此，可以想見日本人的大部份，在當時已經多少知道了些漢字。但是在學術範疇中的漢學研究，當屬日本文化充分進步之後的事，這也就是說，當是應神天皇時代以後的事。

自此以後，漢字的用法，漸見普遍，而教育也次第在意識的狀態中進行了。國民教育主要教材（傳說）的開始整理，也是漢字的用法普及之後的事。此種整理工作，有如上述，已於雄略天皇時代見其端緒。但漢學的研究，尙屬微鮮，雖也有人認爲當時的漢學已極發達的，似未能信以爲真。據傳履中天皇四年（一〇六三）諸國始置史官（書記）。「記載言事，以達四方之志」但在中央集權尙未實現，卽封建制度依然進行的當時，中央政府的此項命令是否可行呢，且中央政府有否此項措置的必要呢。對於上述傳述，殊屬不無疑義。再者，書紀載稱自顯宗天皇時代起，開始「曲水宴

「云云，如果確係事實，那末當時漢詩文定已進步，因為此種宴會，有賦詩於「曲水」的習慣之故。迨其後二百年間，却並無「曲水宴」的記述，由此觀察，正和大日本史所表示懷疑的一樣，這記事也是可異的。而且日本文化的發達，每隨三韓及中國的影響，因百濟新羅文化之進步及漢學佛教的發展，便始於日本繼體天皇時代，則在此以前，日本的漢學尚無顯著進步之跡，自屬當然。

繼體天皇七年（一一七三）百濟薦舉通五經（詩、書、易、春秋、禮記）的博士段揚爾，此係五經博士渡日之始。繼體天皇十年，段揚爾博士薦舉漢高茂安以自代。其後常有諸種博士渡日，而漢學日進。直至允恭天皇時代為止，判罪時常用「盟神探湯」，卽是以手放入熱湯之中，以分正邪。約經七十年後至繼體天皇時代，已不復爲人所信（註）這大概也是中國思想的影響。另外有一段傳說，謂當敏達天皇元年（一二三二）高麗來貢之時，命諸史官讀其表文，但經過三日，沒有人能讀得出來；辰孫王的後裔王辰爾，獨能讀解；天皇大加嘉許，並叱責東西諸史。從這一點看來，當時諸史官的學力，似是極低；但此項傳說，却是可以置疑的，因為雖然在書紀中僅載稱不能讀表疏，而續日本紀的管野真道的奏文中，便說是沒有讀「烏羽之表」的人。真道是王辰爾的子孫，其言自可致信。

因爲是寫在「鳥之羽」上，字跡當然難以認清，而且，在書紀中亦有王辰爾讀鳥羽的記載，惟錄爲敏達天皇元年的另一段文字。大概在書紀中，係將一個傳說錄爲二個。總之在這裏是表明了所以沒有閱讀者，並非由於學力的不足，而是因爲沒有精辨字跡的人。因爲這樣，所以在是年之後的三十年卽是推古天皇的時代，就有出色的漢文傳之後世。以聖德太子爲中心之時代的漢文學的發達，是五經博士段揚爾等渡日以後的結果。

註：日本書紀卷十七載繼體天皇二十四年秋九月，毛野臣置「誓湯」曰：「實者不爛，虛者必爛。」以是投湯爛死者甚多。

佛教的傳來 在此以前，因接受中國魏晉南北朝佛教昌隆的影響，在朝鮮也有了佛教的繁榮，百濟新羅自日本繼體天皇的時代起，佛教大盛，根據書紀的記載，日本於欽明天皇十三年（一一二二）也有了佛教的傳入。法王帝說及其他史料，謂日本的傳入佛教更遠在是年的十四年前，此說似爲正確。佛教的輸入不僅是宗教的信仰的輸入，而且傳來了各種藝能學術，促進了國內諸種學問藝術的發達。不斷地進步着的文化，因是而更加速度地進步起來。指導此一新時代的偉

人，很顯明的就是聖德太子。書紀讚太子云：

生而能言，有聖智，及壯，同時聞十人之訴告而無混誤，兼知未然。且習「內教」於高麗之僧惠慈，學「外典」（儒書之意）於博士覺努，悉能通達。

太子所著的法華、維摩、勝鬘三經之疏，極爲出色。參考中國先哲的解釋，但不盲信，而嚴加選擇取捨。學問的廣博，徵諸上述三疏及太子所作憲法十七條中徵引典籍之多而可知。據專門家的研究，憲法之中，除詩經、書經、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左傳、管子、墨子、莊子、韓非子、史記、漢書、文選等漢籍之外，並博引佛說及陰陽家之說。在此時代，和隋開通國交而遣送留學生，也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實。在此以前和中國間的交通固已早開，但遣送留學生之舉，則以此爲始。法隆寺以學問寺的見地建造起來，這是一種宗教學校，較普通學校的建造約早六十年。

太子的憲法十七條中，其第二條云：

人鮮極惡者，應善教導之。

第七條云：

世間生而即知之事雖少，亦應克念作聖。

太子對於教育的確信，由是可知。憲法並非普通地闡說法律以及道德的作品，而是匡救時弊的警告，此項警告並不落空，其後就由中大兄皇子的努力，而有大化新政的展布。

教育事業雖是在有意識的狀態中進展了，但教育的全部，却尚未截然轉變。換一句話說，當時教育的大部分，還是浸潤於舊習之中的。

第三章 奈良時代的教育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在前一個時代次第抬頭的外來文化，在各方面發生了深切的影響，終於在聖德太子的時代，統一起來，而有着非常的力量。這一時期，適當中國唐代（漢民族最後的最大帝國）之始。看到了唐代隆盛的一新人，「醉心於外來文化，對於以前達官巨吏藉以恣肆的舊制，深致不滿，擬有以破壞之，依據唐制而設施新政。」新人「確屬具有實現此項理想的力量，其中心人物便是中大兄皇子，萬事以皇室爲中心而設施的日本，隨着皇子的改革運動，在政治、經濟、學藝、風俗等各方面，都來了一個絕大反響。此項運動，開始於大化的革新（一三〇五），成功於大寶令的撰定（一三六一），而完成於平城的遷都（一三七〇）。世襲職業的民族制度宣告破壞，有才能者遂不再受身分的羈絆而得被任用。從前雖每有富於知能，因身分低下而無法榮達者，但從此以後，全視努力的程度

如何，雖身分低下者亦能榮達。此種轉變，對於意識教育範圍的推廣，實與有力。

但是不論大化的革新或是大寶令的撰定，都不是從民衆的自覺中產生出來，不適合社會實情的地方，自是難免。氏族制度雖經破壞，但在不知不覺中復活了起來。由於大伴氏的式微和平羣、物部、蘇我氏的亡去，氏族制度確已呈現破壞的狀態，但支配當時社會根柢的氏族制度，實不會因一度的勅命和一部的法令而根本顛覆。在教育上還有着貴族的特權，獲得政府教育設施的利益，一般地說起來，却僅限於上流貴族。中國唐代連庶人都能獲得教育的教育制度，一經輸入日本，却使之僅限定於貴族而已。

奈良朝可以說是藤原氏次第增大其勢力，而開始造成後來藤原氏專權時代的一個時代。大化革新，將以前豪族支配的土地人民，悉歸朝廷，成爲公地公民，改變以前的地方分權制度，成爲中央集權制度。於是國富集於皇室，朝廷聲威，顯著增進。但在交通不便的時代，以及國民全部平均的道德知能程度低下的時代，中央集權的制度，是無法順利推行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到達，監督未能盡善，於是地方官吏就利用地方居民的無智，肆行無忌。加之業經破壞的氏族制度，重復萌長，

於是京都及地方的貴族弁髦法，令構成「私有地」這便是所謂「莊園」又高官大吏及對國家有勳功者，隨其身分而有「食封」「位田」「功田」等之賜。且地方的豪族，雖經大化的革新，仍似有擁有私有的土地人民的。因此回覆到氏族制度的因素，可說是早經具備。

政治如果由門閥推行，那末一方面是人心沈滯，一方面是維持僅屬表面的和平。民衆一般的學德不進步，而非門閥政治，有才能者得因競爭而獲致榮達，於是發生種種陰謀軋轢，而無間時裏面的運動和權變，這在任何時代都屬難免，但此一時代，似乎最爲顯著。正因爲這樣，有才幹者榮達的機會，也就增多。另一方面，因着閥族的不固定，朝臣的行動，也就趨於積極。爲要養成才能，而教育的要求，便愈見增加起來。

社會的一部，充滿着活潑氣象。同時並極力派遣使節赴唐；齊明天皇時代以百濟故而與唐朝作戰；淳仁天皇時代憤新羅的無禮而有征伐的準備。全部雖未十分進步，而却已吐露一部份的光輝。因此，在天平時代，已有可與希臘彫刻嬌美的優秀彫刻。都城有如花朵的盛開，而地方尙含苞未放；貴族耽於榮華，而下民仍度着質朴的古風的生活。此一時代的朝廷及貴族，對於此等庶民，並非

不予顧及，且力謀救濟。將一定的田畝頒與每一個人的「計口授田」制度，便是救濟政策的實行之一。山上憶良作貧窮問答歌以罵富者（萬葉集卷五）那樣的事，在後世却也少見。但此等社會政策，大體上仍係中國社會政策的搬運，所以未見實效。而「計口授田」也未盡實現，即告終止。這是因為固有的文化和從大陸輸入的文化，並未緊密同化之故。在教育方面，也正具着同樣情形。因着大陸文化的顯著輸入，於是文學、藝術、風俗、禮儀等，都逐漸感受浸潤，但在此一時代尤其在此一時代的初期，尙未有充分的同化，這是確切的事實。

第二節 家庭生活與教育

夫妻別居的風俗，從前代繼續下來，還是相當普遍地流行着，另一方面，同居也漸漸多起來。夫婦別居，在生活上諸多不便，這大概是同居漸見增多的原因。又上代的孩子，都做照母名，但到了本時代，却是做照乳母之名。此種風習的變遷，大概因同母所生子女甚多，如果都做照母名，那末孩子的名字就難於區別。模倣中國法令的大寶令，不必說一家之主是屬於父的。社會組織，也成父系時

代，但在感情上，却還有着母系的蹤影。

生育的風俗，因材料缺乏，不易明瞭，大概較上代並無變化。各種遊戲及玩具，大概尚都存在，惟其詳不可得聞而已。

第三節 大寶令的學制 附中國古代的學制

大寶令中所規定的大學，是天智天皇時代所建學校的繼續。但當時是否稱為大學，又學校的內容如何，均所未明。惟在天皇十年時，有學職頭鬼室集斯之名，大約是上述學校的長官，也許就是後世「大學頭」（大學校長）之始。在天武天皇紀中，有「大學寮諸學生」之語，可見此時則確已有大學。在持統天皇紀中，也時常可以見到「大學博士」及「音博士」等名稱。

文武天皇大寶元年（一三六一）制定律令，更於元正天皇養老二年（一三七八）加以修改。在學令（律令的一部分）中，有着關於大學及國學的種種規定。在學令的規定之外，還有着「陰陽寮」、「雅學寮」和「典藥寮」以養成各種技術員；與普通教育，殊少關涉。大學一稱大學寮。在大

學中舉行春秋二回的「釋奠」(孔子的祭典)此外專門從事教育。以上都是在國都的。至於地方的學府，則有「國學」兼具大學及典樂二寮的性質。大學寮制度，對後世有深切的影響，自應有詳細的敘述。爲着便於參照對比起見，茲先將中國古代的學校制度，記其大要如次。

中國古代學制的沿革 舜時契任司徒，敷五教，弘教育；夔任典樂，以音樂資風教。此時尙無學校，學校是從夏代起才有的，孟子曾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滕文公上)庠是養老之義，校是教民之義，序是習射之義，此等都是地方之學。在國都的叫「學」，三代同其名稱，學記中說：「古之教者，在閭有塾(二十五家之村有一塾)在黨(五百家)有庠，在州有序，在國有學。」前面三個是小學程度，後面一個是大學。國都王宮的學校，有小學和大學。年八歲，自王公以下以至庶人的子弟，皆入小學，習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年十五歲，自天子的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迄凡民的俊秀，皆入大學，習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至於女子，據禮記內則所載，自十歲起不出門，習婉順、服從之德，蠶絲、紡織、裁縫、割烹等之功，祭祀之儀節，而其注意之點，是婦德、婦容、婦言、婦功的四行。但中國古代的學制，漢儒所述，互有參差，故詳細

的情形，殊屬難於明瞭。

漢代起初的數世，因值草創之際，教學不振。及至武帝之時，根據董仲舒的獻策，開大學，立五經博士，以教育子弟（西紀前一三六年）自此以後，文教復興。後漢的光武帝也大興大學，非常優遇學者。因獎勵名節，故後漢一代尚氣節重清廉之士極多，當後漢之末桓帝之世，宦官跋扈，學生三萬人奮起攻擊，可見學風蓬勃的一斑。

三國以後，干戈屢起，雖好學之君出而獎勵教育，但無後漢時的昌盛。晉及後魏，稍見發達。西晉的時候，設大學及國子學，盛時學生達七千人。後魏道武帝亦建大學，學生達三千人。其後至後魏孝文帝時，遷都洛陽，建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大興教育。唐承隋的一統，平天下，竭力振興政教。唐時學校，在國都由國子監支配的有六：國子學令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孫三百人入學，大學令文武五品以上的子孫五百人入學，四門學令六七品之子五百人和庶人之俊異者八百人入學；此外律學五十人，書學三十人，算學三十人，收容八品以下之子及庶民。以上稱六學。教官中有博士，其下有助教，但書算不置助教。此外有所謂二館者：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令天子之親

屬、宰相及功臣之子入學。地方學校的學生，計京都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

各項學生的入學年齡，自十四歲至十九歲；僅律學則自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經書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爲小經；孝經、論語，必須兼修。四書中的大學、中庸，存於禮記，孟子在當時尚不被重視，故未經列入。在修經以外，均須習時務策（關於治國要務的論文。）其成績每第十日有旬試，年終有歲試，分上中下三等。三年連試下等，或在學九年（律學六年）仍無力應官吏登用試驗者，令其退學。學問如有成就，每年由州縣監館推舉至尙書省，在尙書接受試驗。及第而尙欲作進一步研究者，四門學生可補大學生，大學生可補國子學生。

唐代官吏登用的試驗有三：一爲生徒，二爲鄉貢，三爲制舉。所謂「生徒」是上述學校中的畢業考試；所謂「鄉貢」是州縣的官吏，選拔人材（經過試驗或不經試驗）送往京師，再經試驗；所謂「制舉」是天子親加試驗，惟此係臨時選拔非常之才的方法，所以並非時常舉行。生徒和鄉貢兩者的試驗，分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明史、開元禮、童子等科，以此試士，依照成績登用。

稱之爲科舉或科第。諸科之中，進士科最受重視。進士科試時務策五道（卽五題）和對大經一部的帖。所謂「帖」是展開經書，僅露出一行，其他遮蔽，再裁紙成帖，覆於該行文字之上，僅顯出約三字，而由受驗者依據記憶答出此三字以外的文字。唐代學制的整頓，有如上所述，但到了玄宗之世，發生安史之亂，學校破壞，生徒離散，卽於亂事收平之後，也未克充分復興。（唐書選舉志）

大寶令的學制（一）大學 大寶令的學制，大體上是模倣着唐制。「大學寮」屬於式部省管掌。寮中有「頭」「助」「允」「屬」四部的事務官，和此並列的有「明經」「音」「書」「算」四道的教官。明經的教官，單稱博士，其下有助教。音、書、算各有音博士、書博士和算博士。其人員和官位，有如下述：

大學頭 從五位上
一人

大學助 正六位下
一人 博士 正六位下
一人

大學大允 正七位下
一人 助教 正七位下
二人

大學少允 從七位上
一人 音博士、書博士、算博士 從七位上
各二人

大學大屬從八位上

大學少屬從八位下

博士和助教，掌教授經書及課試學生；音博士、書博士、算博士分掌教授字音、書道及算術。故雖分四道，實際可以視作二道。學習明經的生徒，單稱「學生」，其定額為四百人。他們於學習經書之際，先就音博士學習正確的中國音。「訓讀」似始於奈良朝，所以學生或許也從事於漢籍的訓讀；但他們先學中國音，然後再習經義。因為這樣，在音博士之下，是沒有音道的生徒的；不過在平安時代，却有着「音生」的名稱。書道學生的是否募集，亦屬不明。明經的學生，想起來是要一併學習書道的；但大寶令中却並無明文。算道有專攻的學生三十人，叫做「算生」。

「明經道」的教科有禮記、左傳、大經、詩、周禮、儀禮、中經和易書的小經，共七經，其中如學畢大經中經中的任何二經，或僅是中經中的任何二經，即可畢業，並有應官吏登用試驗亦即貢舉的資格。此外，論語和孝經，不論何種學生，均須兼習，和唐制一樣。此等經書的註釋（註一）均有規定，須能背出。一經而有兩個註釋的，習其一，兼習自無不可。教官自開講之後，應當講畢，不可中途廢

止，講畢賜賞。「算道」用孫子五曹九章海島六章綴術三開重差周髀九司等十書（註二）。

註一：各經所據的注釋如下：尙書孔安國鄭玄，易鄭玄王弼，三禮與詩鄭玄，左傳服虔杜預，孝經孔安國鄭玄，論語鄭玄何晏。

註二：當時的數學，是今日的開平開立程度。圓周率用整數3，假如正方形之邊爲5，則對角線以7計算。

每十日有一天的休假，休假前有試問。「發音」每一千言試「一帖三言」，「帖的意義」和唐制不同，是遮掩連接的的三字，而使生徒背出。「意義」每二千言試驗大義一條，試三條而通二條者及第，全不通者加體罰。至學年末卽七月，試驗「意義」問大義八條，通六條以上者爲上，通四或五條者爲中，通三條以下者爲下，如三年均試下等，令其退學。年終不試「發音」。在學逾九年尙無成績，令其退學。無學年學級之別；修業年限不定，但不准九年以上的在學，入學之日隨意；學而有成，卽可畢業。此等情形，一直繼續至江戶時代。「國學生」通二經而尙欲作進一步學習者，經試驗之後，令入大學，在此場合，亦不准通兩學而逾九年以上。不循師教者，或在規定的休假以外而有百日以

上的告假者，均令其退學。在九年以內因服忌而退學者，准其再度入學，但在學期間前後合計不得逾九年。行「禮」之時，因各種事務，可以差使學生。所謂「禮」，令義解謂是「釋奠及束脩（註）之類」。釋奠是祭祀孔子，束脩是就學之際的執贄。生徒於納束脩之後始入學。除此以外，不可任意差使學生。學生於彈琴、弓射之外，禁作樂雜戲。由此可知，當時的德育方針，是完全依據儒教的。

註：論語述而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許入大學者，限於五位以上者的子孫和東西史部之子。史部是今日的書記，大抵是六位以下的屬官。其他六七八位之子，僅許志願者入學。在五位以上中間，包括諸王和諸臣。親王家皆置侍講，故不在內。以上皆限於十三歲以上十六歲以下之聰穎者。初位（八位之下）以下庶民之子，不入大學。根據大寶令中的職員令，五位以上之官約一五〇人，六七八位之官約七六〇人，實際上有兼官的，亦有僅有位而無職的，互有增減，約如上列的比率。當此等官吏之子或孫入學時，五位以上者無限制，六七八位者則有限制。

實際上當大學寮之始，生徒極少，朝廷亦未勵行獎學。很多人說，大寶令是為政者的理想，並不

是想全部實現的，但大寶四年藤原武智麻呂任「大學助」之時，距大學的始設已約經三十年，其間因天武天皇的駕崩及藤原遷都等，世事多忙，好學者寡，學校頓挫，生徒流散（家傳）。由於武智麻呂的努力，大學亦見發展，但經三十年後的天平二年（一三九〇）三月，太政官有如下的奏請：

大學生徒，雖經歲月，而習業庸淺，猶難博達。實因家道困窮，無物資給。雖有好學者，而難遂其志。請選性識聰慧，藝業優良十人以下，五人以上，專心學問者，加以善導，賜以夏冬之服及食料。

由此可見富有的貴族子弟少，而貧寒的書生多。天平十一年八月，太政官命三位以上的子孫和五位以上之子，不拘年齡，皆入大學，一致研求學問。

大學不徵學費，但生活費由生徒自給，因是貧生就不免感到困難。富有的貴族之子，在自宅亦可研求，並可自由入學，但似頗多耽於遊惰者。五位以上的貴族之子，托親之福，雖無任何勳功，但亦有下例的叙位。父在三位以上者之子稱「蔭子」，四位五位者之子稱「位子」。所受之位，稱「蔭位」。

父	嫡子	庶子
一位	從五位下	從六位上
二位	正六位下	從六位上
三位	從六位上	從六位下
正四位	正七位下	從七位上
從四位	從七位上	從七位下
正五位	正八位下	從八位上
從五位	從八位上	從八位下

又三位以上者，其孫亦敍蔭位，惟較子下一等。

但生徒苦學數年之後，可得何位呢？學業有成而應貢舉時，其試驗有六種，即「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是。其中秀才和進士，係取「明經生」中拙於經書的義理而巧於文藻者。但文藻的修養，大學的課程中並無規定。秀才須寫關於政教根本問題的論文即「方略」

策，「進士須寫關於治國要務的論文即「時務策」並受背誦文選及爾雅的試驗。此二書亦不列於大學的課程。「明法」是關於日本律令的試問，亦係課程以外者。應貢舉之後，視其成績，而有下列的敘位：

秀才上上第	明經上上第	正八位上
秀才上中第	明經上中第	正八位下
進士甲第		從八位上
進士乙第	明法甲第	從八位下
明法乙第		大初位上
		大初位下

秀才明經如有蔭位者，於蔭位加一階敘位之；又有孝悌之評判者，於右表之位階加一階。

比較上列表格，可知五位以上者之子和六位以下者之子，在待遇上有着極大的相異。當時有

漢學者可以榮達，所以欲爲官吏，有學問者自屬方便。但因有特別任用之道，殊不必定須接受貢舉；僅六七八位者之子，則以受貢舉爲宜。大學不以收容六七八位之子爲主要目的；對於無位及初位者，在此時代，大學且不予入學。但雖非大學出身，亦可以應貢舉，所以此等人或就學私塾，或獨學，以應貢舉。由此看來，大學殊不能說是以養成官吏爲目的的學校；也有人說大學是養成官吏的學校，此語殊非事實。大學僅是登龍門之一術而已。

其後置「明法博士」二人、「文章博士」一人與「直講」三人。「直講」担任與「助教」相仿之事。此等官吏與「直講」相同，都相當於正七位下。又置「明法生」十人和「文章生」二十人。其設置年代，普通說是神龜五年（一三八八），但此等博士之名，在此以前，已屬存在。此等「文章生」又稱「進士」，「文章生」之及第於作文（指作詩）試驗者，稱「文章得業生」，亦稱「秀才」。因此，大寶令中的「秀才」和「進士」已變更其意義。但生徒的稀少，則有如前述。其後於天平寶字元年（一四一七），爲資助貧寒書生起見，特置田二十町，亦有說係三十町者。天平七年，吉備眞備自唐歸國，任「大學助」，努力學政。故奈良時代的末葉，大學極爲整飭，生徒亦見滿額。

(二)國學 「國學」屬「國司」支配，大學令學生五十人入學，上國四十人，中國三十人。下國二十人。醫生取其五分之一。年齡的限制和大學同，惟「國學」係收「郡司」的子弟。「國司」由中央派遣，「郡司」任用地方的有力者，因此「國學」對於地方教育，極有功效。郡司的子弟未滿定額時，庶人之子亦可入學。庶人之子既入「國學」，惟於此時可以轉入大學。「國學」的儒官稱「國博士」，「醫官」稱「醫師」。儒官和醫師，均由地方民中任用，但極難得到良好的候補者；而羅致儒官更見困難。養老七年（一三八三）勅令限於伊勢、遠江等按察使所轄之國十餘國設置之。自神龜五年於三四國置一人。九州方面，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等國均不置「國學」，而合併於「太宰府」，稱為「府學校」，且有在「國學」中所沒有的「算生」。這六國都是上國，所以定額應為二百四十人。天平勝寶六年（一四一四）吉備眞備任太宰太貳，銳意致力學政，府學於以興隆，當二十七年後的天應元年，生徒有二百餘人，是年為勸學之故，置田二十四町。府學的隆盛雖極有可觀，但神護景行三年「太宰府」仍奏稱府庫僅有五經而無史書，朝廷乃賜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部，由此可知其設備的貧弱。中央的大學，或許也是此種狀態。

(三)其他的學校 中央方面，有「陰陽寮」養成「陰陽生」、「曆生」、「天文生」合計三十人，有「典藥寮」養成「醫生」、「針生」、「按摩生」、「呪禁生」、「藥園生」合計八十二人，有「雅學寮」養成各種「樂人」三百六十四人。學習的規定和大學同，僅有一點相異，卽是此等學校，是許可庶人之子入學的。在「國學」方面，也設有一「醫師」以教授從事於地方官民治療的「醫生」。

第四節 學校外的教育

貴族的教養 貴族的教養，家庭教育似較上述的大學教育更受重視。檢閱萬葉集，其間雖亦有庶民之歌，但以貴族之歌爲多。貴族練習「和歌」的時候，由精通者指導初習者，並將作品予以添減。但以專門教授和歌爲職業的人，從平安時代末葉起日漸增多，奈良時代之際，縱或有之，爲數當極少。

關於漢學及其他自中國傳來的學術，在大學以外，亦有學者收容弟子而予以教育的。天平二

年三月，太政官的奏文有云：

陰陽、醫術及七曜頒曆等，爲國家之要道，不可廢闕。但諸博士年齒衰老，若不再教授，恐將絕業。仰令吉田連宜……等七人，各收弟子，其衣服膳食，悉以大學生爲準。

這是官命的家塾，在民間亦有私塾，又貴族亦招致學者，而命其子弟就學。特別是吉田家，世代兼通儒醫，門弟子很多（文德實錄卷二）藤原武智麻呂有二子，長名豐成，弟名仲麻呂，同就學於博士的門下，屢奉絹帛以勞師。二子才學，都卓絕於時。空海少年時，曾就外舅阿刀大足學漢籍，習文章，這是延曆年間的事。

「書道」（書法）也有進步。石上宅嗣長於詩文，且工草書及隸書。卽大學中亦設有書道一門，足徵書道必爲當時朝臣官吏的修養之一。當時書法之風，不依唐法，慕六朝之風，而以晉之王羲之爲最高標準。

音樂在貴族的家庭中，也極盛行，試觀「雅樂寮」中養成歌舞音樂的生徒的類別，有「歌人」三十人，「歌女」百人，「儻生」百人，「笛生」六人，「笛工」八人，「唐樂生」六十人，「高麗樂

生」二十人，「百濟樂生」二十人，「新羅樂生」二十人，由此可知外來樂普及的一斑。

當代的道德理想 此時代顯著的理想是忠君。因中央集權的成功，聖武天皇時代的帝權，充分擴張，國家的結合，亦臻鞏固，而忠君愛國的精神，由是大形發達。

但朝廷所竭力獎勵的，却是中國風的孝弟貞順。大寶令中的賦役令，記載着中國風的表彰的規定；註解大寶紀的令義解，舉出類似中國二十四孝的實例，以爲註釋。續日本令載受表彰的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數極多，例如神護景雲二年（一四二八）對馬上縣郡人高橋波自米之女，於夫死後守貞操；父死後結廬墓側，每日齋食，因受終身免租的特典。凡此，都是儒教提倡的孝行在民間已有相當普及的例子。

在各種德行中，特別尙孝。關於孝行的表彰最多。天平寶字元年（一四一七）四月的詔書如下：古者治民安國，必重孝道。百行之本，莫此爲先。天下每家宜各置孝經一本，精勤誦習，詳加講解。

民衆的學力 當時的官吏，雖屬於低階級的，對於文字，大體上都能明瞭。民間方面，想亦相當

使用文字。但大寶令的戶令規定夫婦離婚時，一丈夫與尊屬近親共同署名，若不能書，捺指印爲記，「法令如是容許可以不必自署，卽是無學者衆多的證據。因此，上述關於孝經的勅令，在實施的時候，大概是很困難的。

圖書館 被稱爲奈良朝末葉文人之首的石上宅嗣，捨其舊宅，改爲阿闍寺，在寺內的一隅，特置儒書的文庫，名爲芸亭，公諸好學者。這是日本公開圖書館之始，也是一種私學。至其遺跡，現已不明，其在奈良則無疑；延歷年間尙存在，其後恐已早就廢圮。平安朝初期的植學賀陽豐年，是宅嗣的弟子，曾遊歷芸亭。

女子教育 關於女子教育的理想及方法，並沒有特別的記錄。以男女地位言，因在此時代女帝之多，橘三千代和氣廣蟲等女流政治家之多，以及大寶令中規定園地分配男女同額，可知女子的位置並不較男子爲低。但模倣中國而設立的學校，除「典藥寮」養成女醫和「雅樂寮」養成女樂外，完全不准女子入學。以學問而言，雖亦有不弱於男子的，但多數女子，大概是在家庭中學習家政上的技術以及音樂裁縫習字，或是在不知不覺中習得了家政上的技術等項，不過如是而已。

至女兒的幫助父母處理家務，或是接受父母（尤其是母親）的訓誡等例子，在萬葉集中是數見不鮮的。

第四章 平安時代的教育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一四五四）後的數代間，皇威隆盛，政治清明。天下安泰。久爲朝廷之患的蝦夷，亦經鎮定。奈良朝之際，和外國來往頻繁，頗受刺激，至本時代亦次第減少。在本時代留學生雖時有出國，但遣唐使的派遣僅有二次。學問藝術，較諸前代，更有進步，而武勇的精神，漸次衰弱，所長足發展的，却是柔性的優美豔麗的文化。坂上田村麻呂等因征伐蝦夷，建立武功，但內地人却非常文弱。

法令和典章次第增加起來，朝政爲此等慣例所束縛，僅是做些例行公事以及定時臨時的敍任而已。起初還有藤原氏和他人的衝突，結果他人都被藤原氏壓伏，乃仰其鼻息，甘拜下風。無外交之患，又無內政之憂，四海昇平，京都繁盛。朝臣都溫文爾雅，沉浸於貴族的趣味之中，詠花歌月，度其

歲月。這時的教育，以習禮儀諳故事長詩歌能管絃爲中心，對人生毫無實益，而僅是一種表面的點綴而已。

文化愈局限於中央，而地方更被漠視。「國學」廢止，「國分寺」式微，戶籍頓度破壞，計口授田制也自延喜天曆之頃不復施行。倒是奈良時代，地方文物很有進展。平安盛期歌人所作之歌，其題材都限於平安京附近，有時縱或歌詠地方的山水，但亦是距京都不遠的地方。貴族卑視地方官，同時平民也不在貴族的眼中。貴族度着優越的生活，他們對於在痛苦中度日的民衆，並不予以救濟。伊勢物語、大和物語和枕草紙中，時常罵民衆爲「下種」。

我們研究平安時代，難以得到教育民衆化的印象。我們研究的希望，在於其他方面。平安時代貴族的華貴生活和修養，成爲後世貴族修養的基準，而同時並推及於民衆。後來歌人的範本，與其說是奈良時代的萬葉集，倒不如說是平安時代古今集。源氏物語是日文的精粹，模倣源氏物語的文學極多。後世的風俗，大抵起源於這個時代。平安時代貴族的生活，在這一點上是值得注目的。地方荒廢的結果，使惡者成爲盜賊，弱者成爲流浪之民。其後大盜且橫行於都中，而民心日趨

險惡。始於大化改革的班田收授法一經廢止，顯官私有的莊園便與日俱增，其勢一發而不可收拾，於是公家收入激減，府庫非常匱乏。京都及地方平民中之稍有錢財者，購買官位，張其威儀。官吏的任用，不問才之高下，但視價之大小，故無功績可言。這些人回到地方，藐視地方官，肆意紊亂秩序及規律，而無所顧忌。這樣一來，地方制度完全解體，而地方豪族就開始自衛，良民附之，俾策安全，這就是武士的起源。小的武士隸於大的武士，而求保護。

擔任武士的統領者，生活極為奢侈。此種生活和其他原因相湊合，就促進了文化的普及，在此以前和京都有雲泥之差的地方，到了這時候，也逐漸浸潤到文化了。例如指定為「特別保護建造物」的現存古社寺的分布，以前完全是局限於山城及大和等處，而以鳥羽天皇天仁元年（一七六八）的中尊寺經藏以及崇德天皇天治元年（一七八四）的同寺金色堂為始，嗣後在地方上就很多可以見到了。

和地方的情形相反的都城，由於藤原氏的盛極而衰，「院政」起於朝廷而朝威分化，政出多門，循致釀成天下大亂，發生父子兄弟叔姪相爭的可驚的戰事，出現了當時的人們所慨嘆為「末

「世末代」的衰亂之世。但是，所謂「末世」者，是公卿方面的說法，從武士方面看來，却正是武士興隆的時代。公卿從崇高的地位降下，相反地，從來由處於微賤地位的平民中以建樹其勢力的「武家階級」於以產生，而站上了和公卿同等的地位。這是一個文化和教養，從狹小的範圍中漸漸廣播開來的時代。又自平安時代末葉起，佛教漸漸興起，而於平民及武士間扶植其勢力。在這裏也正有着教育擴張的契機。

第二節 家庭生活與教育

在這一時代，父與母處於同等地位的例子，已是極多。雖然像「紫式部之子大貳三位」云云那樣僅稱母而不稱父的例子，依然存在，但却已成為例外。嚴密地說，這時代是感受中國文化極深的時代，所以父的地位，實較生母的地位為高。

夫婦同居的風俗，漸漸地普遍起來。且正妻不限一人。藤原兼家的正妻，生道隆、道兼、道長三人，而生三人之弟道綱者是藤原倫甯之女。此女學問優良，兼家亦極器重之。關於別居時所生孩子的

教育，全由母親一人負其責任，道綱之母肩負教養道綱的責任時的情形，在其所著的蜻蛉日記中，有着極詳盡的敘述。

在上流社會中，孕婦妊娠的第五月，須舉行「着帶」的儀式。到了臨娩之月，設產屋，產婦移居其內，並請僧侶誦經。臨盆時行「加持」（佛家語）及祈禱，用以驅邪。並預先指定切臍帶和授乳的人，在分娩時各各履行其任務。臍帶是用竹刀切的，有時由產婦自行切臍帶及授乳。嗣行「產湯」，其日期係在產後的第三日，屆時鳴弓弦，以除惡魔，並由僧侶行「護身之法」。所產如係男孩，則招「文章博士」讀孝經及史記。產後的三日、五日、七日、九日及五十日，都舉行祝典。又於九日換穿白衣，七日剃胎髮。在五歲以前，於每年歲首，以餅戴於小孩的頭上，述祝詞以賀之，如希望才學如祖父，文章如父親等語（古事談卷六）。小孩第一次食魚，稱爲「真菜始」，其日期無定，總在產後第一百二十日至第二年之間。七歲開始讀書，舉行「讀書始」的儀式，其他學習，亦於是歲開端。十二三歲時加冠，這時候舉行隆重的儀式，男戴冠而女穿裳，主持儀式者，是一族中有崇高地位的人。

關於愛子之情，有着各種歌詞傳留下來。就是上面提到過的蜻蛉日記中，也有着可歌可泣的記述：安和二年，道綱之母（蜻蛉日記著者）病劇，雖屢經祈禱，終不見效，乃留書其夫兼家，以作遺言：

我常常和你說，長生是做不到的。生命像是塵埃一樣，自不足惜，祇是對於這個孩子（指道綱）却使我無法忘懷……我死後，你如不加關愛，我將遺恨無窮。

其愛子之情，躍然紙上。

這時代小孩的玩具極多，有小弓、竹馬、陀螺、泥人等；遊戲有角力、騎馬、鞦韆、游泳等。

第三節 大寶令學制的變遷 私學

大寶令學制的變遷 自奈良遷都平安後，各項制度，略有改變，教學也次第變遷。「大學寮」在二條大路之南，朱雀大路（今之千本通）之東，三條坊門（今之御池通）之北，神泉苑之西。寮中的西北部有都堂院，一稱北堂，是文章道的學舍。其南有明經道院，稱南堂。再南有算道院，更南有

明法道院。東北有廟堂，是祭祀孔子及其弟子的所在，其南有廟倉。從延曆末年，始置「大學別當」，由和氣廣世擔任。後世的「別當」位在「大學頭」之上，大學總裁，多由親王、大臣、納言中補任，但廣世的「別當」其位並不在「大學頭」之上。

入學的規程，也有變遷。大同元年（一四六六）六月，令諸王及五位以上者的子孫，凡年在十歲以上者，全部入學。至弘仁三年（一四七二）五月，撤回此令，改為隨意入學，但又於天長元年（一四八四）八月，令五位以上的子孫，凡年在二十以下者，全部入學。爲了資助此等生徒起見，於延曆十三年（一四五四）十一月，定越前加賀郡之田一百零二町餘爲勸學田，加上前代的天平寶字元年制定的三十町，合計約一百三十町。其後勸學田次第增加，而以山城久世郡的三十餘町，和河內茨田、澀川兩郡的五十五町，爲生徒的膳費，又每日由「大炊寮」給助一石五斗（此數據自三清善行的封事）。此一石五斗即由五十人均分，每人各得三升。此外尚有各種資助。延曆十年，定教官的職田如下：

職田——全部七十三町，計：

博士人一五町 助教人二各四町 直講人三各四町 文章博士人一四町

明法博士人二各四町 音博士人二各三町 書博士人二各三町 算博士人二各三町

延曆十七年，以春秋公羊及穀梁二傳，準於小經，加入教科之內。延曆二十四年（一云大同三年），置「紀傳道」，減少「直講」一人，而置「紀傳博士」一人，其後於承和元年（一四九四）廢止，增加文章博士一人。又於延曆十八年，在「太宰府」的學校中，亦置「明法博士」一人，且置「音博士」，但後者設置的年代不明。

平安時代的初期，朝廷紀綱大張，漢學隆盛，除江戶時代以外，要以此時期為學者輩出著述最多之時，大學以是趨於隆盛，而大學出身的公卿也最多。大學的價值，在這時期中，已是充分發揮。從大寶年間以迄延久年間即平安時代中期之末，其間的臣子，載入大日本全史的列傳中的，達三四四人，茲特製成有關大學的統計如下：

奈良時代	自大寶令發布至平安遷都	年數	載入列傳者的人數	百分比	其中大學出身者的人數	百分比
		二二二	一三五	一〇〇	四	三

平安時代初期自平安遷都至派遣唐使停止	二四 五五 五四	一一二	一〇〇	三五	三〇
平安時代中期自派遣唐使停止至後三條天皇即位	二五 五五 五四 七二 九九	一〇七	一〇〇	二五	二三
		二四四	一〇〇	六三	一八

這張表格，當然是不很確實的，這是因為載入列傳中的人，僅限於極少數的一部份；同時，在並沒有註出大學出身的人們中，而實際上却是大學出身的，恐怕也不在少數，但大體上的傾向，還是可以從這張表格中觀察出來的。根據這張表格，可知大學在學問上最有貢獻的時期，是平安朝的初期。

當時的研讀詩文，其目的在求道德的實踐者少，而實以準備競賽詩文為主。因為這樣，「文章道」就受着特別重視，「文章博士」原來是助教的地位，而居於「明經博士」之下，但到了弘仁十二年（一四八一）二月，便一躍而為從五位下的官吏，位居明經博士之上。到了後來，職田也增加至六町。自平安時代中期起，所謂文章生，是對明經生施以關於史記的試驗，簡選「擬文章生」二

十人，略稱「擬生。」再經「式部省」試以詩賦，一經及第，即補爲文章生，而稱爲「文人」或「進士。」再施以作文的試驗，及第之後，成「文章得業生」亦稱「秀才。」其定額爲二人，朝廷的待遇，隨着文章得業生，文章生的次序而定，其下便爲明經、明法、算道諸生。

關於諸國的「國學」同樣予以獎勵，在平安期初期，始曾普及全國。但因「國博士」的人選不易獲得，所以「國學」未能充分發達。雖然也有像朝野鹿取那樣的碩學者被任爲「相模博士」的例子。但這僅是例外而已。山田春城也是優秀的學者，也被遙任爲「丹波權博士」，但並不向丹波赴任，僅在京都執行職務。由此可見未卒業於大學而被任用爲「非受業博士」（亦稱非業博士）者，當不乏其人。再者，關於「國學」因史料缺乏，殊欠明瞭，但證以延長五年（一五八七）出版的延喜式以及其後的史書，很少這方面的記載，大概在平安時代中葉起，趨於衰微，而在同時代的末葉，更見淪亡。

大學到了延喜年間，同樣顯示衰頹的傾向，其所以發生此種傾向者，一因漢文學的衰微，二因朝威衰弱，國用不充。三善清行在醍醐天皇延喜十四年（一五七四）奏上的封事中，關於大學部

分，有如下的一段話：

年代漸久，事皆睽違。承和年中，將加賀郡勸學田，歸還伴善男。又勅令久世郡之田分爲四分，以其三分歸與典藥，左右馬等三寮，僅留一分爲學生膳費。河內之兩郡，爲水所沒，陷爲大河。當今所遺者，僅「大炊寮」之飯米六斗與久世郡之遺田七町而已。以此區區之數，餉數百生徒。雖煮薄粥，猶感不足。於是後進者皆認大學爲坎壈之府，凍餒之鄉，父母告誡其子，令其不齒學館。南北講堂，草深沒膝，東西曹司，闌無人跡。且每至貢舉之時，僅以虛名薦士，不問才之高下，人之勞逸。鑽營由是而起，吹牛緣此而生。潤權門之餘唾者，生羽翼而入青雲；蹈闕里之遺蹤者，詠子矜而辭蠻舍。大學瓦解，興復無由；先王庠序，遂成丘墟。

延喜年間，雖然還有大學生，但早已沒有俊秀傑出的了。這是因爲朝廷對學生不予保護之故。其他尚有種種原因：當藤原氏的盛時，連教育、學問和官職，都成世襲，不出藤原氏之手，決不會受任用；賣官之風公行，使用錢財，即可買得官位；當世青年，對於學問，不予重視。因學生激減，在延喜式中，就有下列的記載：

凡願意入學者，不問其年齡大小，加以簡試，如能通一經，即准其入學。諸王及五位以上者之子孫，不須簡試。

無論何人，祇要能通一經，即可入學，如是門戶開放，從教育的理想上說起來，自是深可慶幸的事，祇是有一問題，就是畢業者不易就職。一條天皇長德元年（一六五五）七月，大外記兼博士中原致時奏狀中說：

謹案明經生徒，各積夙興之勤，懷拾芥之思，但除四人外，餘均無立身之階……

由是可知，當時的大學生，雖經苦學，但無法就職，於是大學愈見不振。

《宇津保物語》的使之卷中載稱，有才子名藤原季英者，經二十餘年的苦學，博士嫉其才，不予推舉。季英因向「別當」訴告說：

余囊螢映雪，孜孜向學，不敢稍懈，而博士不予憐憫，故雖於歷二十餘年之今日，尙無一職，堪以棲身……

此雖係小說，但亦足反映事實的一面。又平安時代末葉的《今昔物語卷二十三》中，記載着一個

無賴者（他曾經和一個名滿天下的力士打架，輕易地打贏了）進大學的事稱。當寺院成爲惡僧集合所之時，大學也多收容了不事學問的學生。

大學寮已不復有存在的意義，而且，也就在高倉大皇治承元年（一八三七）的大火災中焚去了，在鎌倉時代未經復興，歷史上的大學就不復再現。再者，大學的衰微，和大學的教科，也有關係，此層當於次節述之。

私學與曹司 平安朝之始，隨着漢學的勃興，有力的公卿或僧侶，相繼建立學舍：

	創立者	創立年代	場	所	廢滅年代
弘文院	和氣廣世	延曆之末	大學南首	延喜年間	
勸學院	藤原冬嗣	弘仁十二年	弘文院之南	鎌倉時代之末	
學館院	橘氏公	承和年間	西大宮二條	平安時代之末	
獎學院	在原行平	元慶五年	勸學院之西	平安時代之末	
綜藝種智院	空海	天長五年	東寺之東	承和年間	

其中綜藝種智院，自空海圓寂後不久，即歸消滅，其存在期間，約有十年，倒是純粹的私學。因鑑於唐的村有閭塾，縣有鄉學，以教導少年及青年，而才子藝士輩出，反觀本國（日本）祇有京都的大學而無閭塾，貧賤子弟，無法求學，於是創設該院，以便普遍地教育一般無學者。其他四院都是收容各氏的子弟的，稱爲「曹司」，一稱「別曹」。（大學內的曹司稱「直曹」。）「別曹」中最發達的，是勸學院。藤原氏繁盛原因之一也，即因該院培養出許多英才的緣故。在「直曹」中有所謂「文章院」的，是菅原清公於延曆二十三年赴唐歸國經奏請後在大舉中設立起來的，分東西二曹，東面是大江氏的學生，西面是收容菅原氏的門人。文章院經治承年間的大火災後，仍然復興起來，一直繼續到鎌倉時代之末。

第四節 貴族教育的內容與方法

男子主要的學習 當時萬事以中國爲模範，所以學問也就僅限於漢文學。對本國（日本）的歷史付諸茫然，對中國的沿革反極稔悉，當時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藤原賴長曾經後悔自己不

應專心於中國的經史，反忽視了本國的史書（註）但這已是平安時代末葉的事，而且也是難得見到的例子。所以「和漢之學」等語的普遍流行，已在鎌倉時代以後。當時的貴族，是抱着何種目的去習漢學的呢。他們並不是爲着獲得榮達的資格而學習，因爲他們的高位是隨有生以俱來的；但爲要在擔任官吏後能有所作爲，於是認爲有修養漢學的必要。源氏之主送其子夕霧入大學時，曾經這樣說（源氏物語少女之卷）：

生爲身分崇高世家之子，對於官爵權勢，得手應心，往往不願苦學。當其耽於逸樂，而官位仍得青雲直上，雖世人內心不免加以嘲笑，但仍趨炎附勢，竭力媚媚。迨一朝時移境遷，依賴之人物故，而本人權勢開始衰微，於是人皆賤之侮之矣。是以學問不可不研習，務須發揮自身之才能而後可。

註：台記康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之條。

當時既是最重視「文章學」的時代，所以首在研習詩文，或努力於探求政治上的成例。詩文之中，尤尙聯句。朗詠集便是搜羅優秀聯句的集子。村上天皇愛好學生名藤原雅材者所作的聯句，

於是立即拔擢該生任「藏人」之職。該項聯句是：

望迴翔於蓬島，霞袂未逢；思控制於茅山，霜毛徒老。

當時閱讀最多的書籍，詩文的參考書方面，是文選和白氏文集；政治的參考書方面，是左傳、史記、漢書、禮記、周禮、儀禮、尚書等。女子大抵不習漢文，已如上述（參照第一章第二節），所以男子寫漢文，女子則寫「假名」文。

漢學的知識叫做「才」或漢才；應用「才」以處理事物的能力叫做「魂」且有所謂大和魂、大和心等。上面曾經述過宇津保物語中的博士對季英不予推舉一事，博士曾加辯解，說是因為季英沒有「魂」的緣故。當時的大和魂，並不如後世的指國民精神或忠勇義烈的志操而言（參照第一章第二節）。

熟練管絃之道是僅次於漢學的要事。源氏物語、桐壺之卷中即舉出漢學和音樂二者為學習的要項。宇津保物語、俊蔭之卷中，也有

彈琴誦文

之句。當時有名的人士，都兼長此二者。其次「書道」和「和歌」也極重要。以上四者的學習中，大學僅教漢學、習字兩種，時人的不重視大學，也是當然的結果。

女子主要的學習 女子因不研究漢文，所以主要的學習僅有三種。當時的風俗，女子都深居閨中，不和男子見面，甚至和兄弟也都隔離。男子聞某女有才色，如果想迎之爲妻，就贈以歌詞，女子則以半推半就的態度，以歌詞答之。其間大多數係由女子的兩親或乳母，教寫贈答的歌詞。歌詞的巧拙，書道的良否，關係女子的命運者至巨，所以女子都熱心學習歌詞及書道。經過數度的歌詞贈答之後，就宣告結婚。

女子除習字、彈琴、學歌三者之外，還須練習機織、染色及裁縫等。

學習的方法 習字先習「假名」的逐字書寫，再習連接的寫法，然後習寫漢字，但此種順序，並不是絕對不變的。（註）

研究漢籍，在大學中先習正確的中國音，在家庭和私塾中，則僅習訓讀和解釋。研究漢籍目的在於參考詩文及政治，所以應加背誦。但因書籍很多，一一背誦，自不可能，於是摘錄要點而背誦之。

菅公的書齋記（本朝文粹卷十二）中也說：「學問之道，以摘錄爲宗。」入門書是孝經、千文、文、唐詩百詠、蒙求之類，後來和漢朗詠集也頗爲人所愛讀。在此諸書中學畢二三種，乃進一步學習上面說過的文集、文選、史記等。「和歌」的練習分古歌研究和自作兩種。自作又分兩方面，一是寫作前的學習歌詞作法，一是寫作後的接受前輩的增刪。

註：參照吉澤博士國語國文的研究中的關於王朝時代的習字。

教育的場所 在源氏物語「夕霧之卷」中，詳細闡明教育的重要。可知當時兩親對小孩的知育德育，極爲關心。小孩自六七歲起，（讀文習字，生活極爲忙碌）（源氏夕霧）關於知育，除令孩子入大學或私學外，或在家庭由父兄自行教授，或聘教席，或走讀於私塾。

私塾很多，最有名的是菅原氏所建立的。該塾累代有第一流學者的產出，所以就學者極多，塾址在西洞院五條，由該塾文庫出身的「秀才」「進士」幾達百人，故世有龍門之喻（書齋記）。當時規模宏大的文庫，藏書在萬卷以上的，爲數甚多。大江氏的千種文庫，在西洞院樋口，藏書達數萬卷（百練抄）於仁平三年（一八一三）焚燬。

在家庭延聘教席的例子，所在都是。也有由父母叔父等教授的。空海幼時自叔父處學習漢籍，圓仁幼時自兄處學習漢籍。特別是女子，因深居閨中，多由父母教授。

對男兒禁止夜遊，對女兒尤爲緊嚴，此等例子，也是數見不鮮。

第五節 武士的興起 庶民的教養

武士的發生 當都城極度繁榮享受太平之福的時候，地方政治，却很紊亂，這是在上面已經說過的。雖然因都城文化的浸潤，而促成地方的開發，並非絕無其事，但因地方官的稅政，使百姓趨於邪惡，這是很普通的。規律完全破壞，成爲無警察狀態，盜賊橫行，公然殺掠。又因無智迷信之故，對病劇者，卽近親也竟不予看護。據云鴨河原及其附近，集積髑髏達五千五百，時在平安朝初期承和九年（一五〇三）。

京都的貴族，勇氣消沉，而趨於女性化。奈良朝的人們，爲了吸收文化，冒險赴唐，而平安朝的廷臣，却有因懼怕海濤故雖經任命而逃避的。官廷的武臣，有若士偶，毫無功績。地方的靡爛，非由地方民自行挽救不可。地方民於是武人化起來，而採取了團隊的行動。一個人或是少數人所做不到的。

事，集聚了多數人，就可以輕易地做成。既成團隊，便必須有率領的首領者。團隊運動在開始時原也是一時的，但漸漸地首領和部下的關係固定起來，而形成了主從的關係。地方的望族和自都城退下來的貴族，成了武人化的農民的首領，支配很多土地，而且訓練武勇。這就是武士的起源。當「天慶之亂」之際，班田收授法完全破壞，地方上滿佈武士。小的武士屬於大的武士，在這裏有着很多的階級。

到了「前九年」之役（一七二二年平定）和「後三年」之役的時候，武士的階級，也就固定了。地方的整理，一任武士之手。天慶之亂（一六〇〇年平定）時，朝廷還賜藤原忠文以節刀，命其平亂。雖然在實際上建立平亂之功的是武士，但朝廷還感到有鎮定地方的責任。其時的武士，在地方上雖然炙手可熱，但在京都，依然聽從公卿的指揮。其後藤原氏開始衰頹，地方年復一年地經武士之手而整頓起來，而武士的勢力就大見增加。以前僅限於中央和貴族的文化，到了這時候，就成為京都和地方以及貴族和庶民的二元的相對的文化了。

武士的教育與文化 由於武士的世代主從關係的繼續，武士道就發達了起來。向上代去追

溯武士道的起源，是並不妥當的。天慶之亂的時候，武士道尙未發達。一時的主從關係，進爲世代的
主從關係，外面的柔弱的集團，進爲內面的強固的團結，這時候，武士道就告成立，其時約當「後三
年之役」之際。這時候的地方整理工作，全由武士進行。武家被稱爲「弓馬之家」，可知武士以馭
馬射弓爲第一修養。關於射弓，有着許多史料傳述下來，劍道當時還未被重視，所以殆無傳述。關於
武士道，當於下一時代，再予詳敘。

武士當亂離之際還是渴慕着貴族生活，就在其根據地模倣起貴族生活來。奧州的藤原氏，在
平泉，就以京都爲模範建設起來。在許多寺院中，像無量光院，就是模倣平等院的。還建立了許多神
社，也以京都貴族所信仰的日吉、祇園、北野、稻荷等大社爲模範。這不過是最顯著的例子而已，此外
恐怕還有許多小藤原氏、小平原吧。這樣一來，文化也就開始普及於地方。隨着文化的普及，佛教也
就廣入於民間。

庶民的教育 武士獲得了勢力，地方就次第肅清，農民安堵，交通發達。京都雖依然爲文化的
中心，但農民的風習，也有不少逆轉地反映到貴族的生活中來。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田樂」、「田

樂」原是農民的一種遊戲，因為貴族的娛樂早經儀式化而喪失其娛樂的性質，於是貴族就欣然接受了此種新的娛樂。

註：關於「田樂」的盛行，參照洛陽田樂記（大江匡房）。

關於庶民的學力，缺少積極的史料。北條時政是一個極喜歡學問的人，但據古事談的記載，其孫女年屆十二齡，還未能好好地寫出「假名」，由此可以推想出，多數武士庶民，不論男女，其程度或更在此以下。但據最澄的高足仁惠所作的叡山大師傅，最澄七歲始學，成績立即遠超同輩之上，於是頗思擔任「村邑小學」的教席。可見當時在鄉村中，有被稱為「小學」的教育機關。

第五章 鎌倉時代的教育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藤原氏由於內部的腐敗，終以喪失實力，而爲新興的武士奪去了政權。「院政」立於兩者之間，僅是將政權自一方移渡於其他一方的中間人而已。第一個掌握政權的武家是平氏，但不久覆亡而成源氏之世，更不久而成北條氏之世。

當「公家」耽於文雅風流的生活之際，文化尙未發達的地方的武士，羨慕着殿上的朝臣，雖然未蒙許其昇殿，但如果獲到了一些公卿的風雅，也就引以爲榮，後來平氏終於站入了朝臣之列，達到了向所懷抱的希望，但因沾染了藤原氏的文弱，以執弓矢的手玩管弦，以叱咤三軍的口吟歌曲，而自急遽地走上了滅亡的道路。

源賴朝住居東國，維持着質朴的生活，勵行清明政治：不使武士本來的面目喪失，且進而求其

發揚；團結向來有若一盤散沙的地方，使成一集體的勢力，力事開發；並致力於下民生活的安定。他富於敬神崇佛之心，篤於尊王之志，勤儉尚武，獎勵武士道的發展。

許多人認為鎌倉時代是教育衰落的時代。的確，當時漢學是衰落了，但這僅是教育一部分的衰落。再者大學寮是滅亡了，但這也並非表示教育全般的衰微。在著者是這樣地想：這時代的政權，雖在武士之手，但文權却仍在貴族之手。此等貴族，對於己身勢力的衰頹，極爲慨歎，對於當前的世界，深感厭煩。自平安時代末葉起以迄鎌倉時代，公卿都認爲末世末代業已到來。平家物語等書籍中，借用佛成語的「末世」「末代」等字眼，數見不鮮。但到了室町時代末葉（公卿已斷念政權的回復且文權亦已喪失的時代），這正是和鎌倉時代同樣的亂世，却並不常用末世、末代等字眼。因此，以「末世」等字眼的常用就認鎌倉時代是教化貧乏的時代，實未免過於臆斷。

即使在貴族方面因漢學衰落因而貴族方面的教育趨於衰微，但以前不爲人注意的民衆，却漸漸成爲政治的對象了，在鎌倉時代，像源賴朝、北條泰時等努力爲平民謀福祉的人很多。平安時代的宗教僅擔任朝廷和朝臣的祈禱，而新興的淨土宗、日蓮宗和禪宗，都給予了武士和平民以感

化。自此以後，民衆便從無自覺的夢中醒了過來。縱使在教育的質方面較劣於前代，但在量即人數方面却遠勝於前代。本來僅是授予僧侶以學問的寺院，自平安時代末葉起，也負起了教育士庶的責任。民衆教育的著述，自平安時代末葉起出版很多，而在鎌倉時代，凡「物語」「雜書」等，都顯著地含着教訓的意味。今昔物語、平家物語以及源平盛衰記等，都寫着很多教訓的說話，此外還有着十訓抄等以教訓爲主旨的書籍。凡此種種，都足表明鎌倉時代，較平安時代更富於積極的教育意味。

第一節 家庭生活與教育

孩子對父母的關係，在此時代，差不多已和今日相同，當時迎妻至夫家的風俗已經普遍，一妻一妻已經增多。在以前，家庭教育的責任縱由父母同負，但父親接近孩子的機會較少，則無疑義。自從一夫一妻之後，父與母完成教育孩子責任的機會，已屬相等。

莊園登達之後，一家的會計，都依賴於此，莊園是世襲的不動產，所以現在家族的生存，完全是

祖先的恩惠。就是因爲這一點，子孫常常受着祖先精神上的支配。自從平安時代末葉起，父與子的關係趨於非常緊密，所謂家的團體臻於非常強固，想來即因此種關係。特別在武士方面，此種思想，更爲發達，藉着祖先的弓矢的勞績，子孫才能安樂地度日。在此種情形之下，孝的思想感情，並不是概念的領會，而是切實的感悟。

妻妊娠的第五月，夫即以「鎮帶」束於妻的腹上，臨娩之月，改穿白色衣裝，移居「產屋」。一切臍帶、授乳、及舉行「產湯儀式」等情形，大略和前代相同。「產湯儀式」的舉行通例在產後的第三日，如在貴族，且鳴弓弦，請文章博士讀孝經。自生育後的第三夜、五夜、七夜、九夜、五十日，都有祝典。生後半年至三歲間，舉行「開始食魚」的儀式。六七歲時有「開始讀書」及「開始習字」的儀式。「開始習字」的儀式始於這一時代。舉行「開始讀書」儀式時讀御註孝經，和前代相同。將軍賴經，以「長生殿裏春秋富，不老門前日月遲」之句，爲最初的習字帖，但普通似先習「假名」。武士之家，在相同的年齡，舉行「開始着鎧」、「開始彎弓」、「開始乘馬」等儀式。實朝稍遲，於十二歲，舉行「始穿甲冑」、「開始乘馬」的儀式。

自六七歲起至十五歲，舉行「加冠禮」。武士對此特別重視，加冠者大抵請一族的長者或外戚同門中有賢名禮儀端正的人擔任，也有主將爲屬下之子加冠的。加冠的人叫做「烏帽子親」，被加冠的孩子叫做「烏帽子子」。

親子之間，漸臻親厚，但在另一方面，也有着希望沒有子孫的思想。這大概是自保元以來，戰亂不絕，今日以前雖備享榮華，明日的運命却在未定之天，厭世思想流行，隱遁之風擴張的結果。

當時兒童的遊戲，除戲水、摘草等外，以摔撲等屬於武勇方面的爲多。也有抽陀螺、打球及放紙鳶等遊戲。

第三節 道德的發達 敬神崇佛的風氣

鎌倉時代，固有悲觀厭世消極隱遁的，但也有人停止了平安時代的享樂生活，嚴肅反省，敬神崇佛之風大盛，國民精神也告勃興。在另一方面，因果報應之說極爲流行，天狗和鬼也時常表現於文學之上。

關於道德，在今昔物語等書籍中很多教訓的語言，十訓誡且是純粹的訓誡之書。當然，此等教訓，並未道出高遠的理想，主旨在於獲致一身一家的安全及榮達，其中並無任何嚴肅的人生觀。與其說是積極的勸獎，無甯說是消極的警戒。但由於此項教訓的備受重視，足徵當時道德心的充分發達。在平安時代，雖並不蔑視道德，但尋求感情的愉悅，實較重於意志的鍛練。

對於佛教，也可作同樣的觀察。當平安朝盛時，僧侶希望和貴族接近，却並不以虔誠信仰與救濟民衆爲要務。再者，在平安時代，貴族建立壯麗的佛寺，舉行莊嚴的法會，想在現實的世界實現起極樂世界來。但時過境遷，現實使貴族生「末世」之感。不論貴族、武士和平民，大多固其信仰，虔敬念佛，希求往生未來的淨土。

賴朝極端崇敬神佛。北條泰時的時候所著成的「貞永式目」開頭就有這樣的規定：

- 一、修理神社，誠心祭祀；
- 一、修造寺塔，勤行佛事。

此種規定，也就是承襲賴朝的遺策。在此種情形之下，佛教隆盛同時也尊敬神祇，崇敬神祇同

時因以繁榮佛寺。源平盛衰記（卷九）載稱：「治承之變」之際，俊寬、藤原成經、平康賴三人被流放到鬼界島，三人祈求歸京，俊寬僅祈佛而不祈神，其他二人則祈求佛神，結果成經、康賴的祈請奏效，僅僅他們二人如願歸京。

日本是神國的思想，當時已普遍發達。尊王的思想，也充分增進。平家物語和源平盛衰記的字裏行間，充滿着勤王愛國的精神，而以太平記尤為顯著。太平記因南北朝對立的刺激之故，尊王心的顯著，自是當然，至於在鎌倉時代尊王愛國心的強旺，即僅閱平家物語和源平盛衰記已可充分明瞭。日蓮的立正安國論和守護國家論，是將此種精神表現於佛教上的例子。

第四節 武士道的發達

關於武士道的發達，普通有着這樣的觀察：古代日本人的忠勇尚武的精神，遺留於地方的遠國特別是東國，此種精神，隨着武士的興起，同時復活。在都城早已失去了的東西，尚有若干殘存於地方，這是可能的事，同時，這種遺留下來的精神，對於武士道的發達有所裨益，這也是可能的事。但

是，此種說法如果成立，對下列兩種事項必須確切證實：一是古代道德很多地保存於地方；二是古代道德和武士道德的內容有着非常的類似。列舉出忠君、孝親、尚武、質朴、信義的名目，說古代道德和武士道係一物兩面的人固多，但這僅是形式或是名目上的比較，而並不是深究內容的說法。如果僅作形式上的比較，那末可以說在全不相關的外國，也有着和此等道德相似的道德。據我們的觀察，例如古代道德獎勵對於天皇的臣下的忠君，武士道獎勵對於武將的家臣的忠；忠雖相似，但武士容易忘掉對天皇的忠；只服從主人的命令，所以不論在承久之亂的時候，或是南北朝戰亂的時候，很多的武士，爲賊軍服役。至於孝，古代以對母爲主，平安時代以後，則又偏於對父。同樣地，這兩種道德，在其他點上，也都不同其內容。

再者，古代道德是否很多地遺留於遠地，也是難於斷言。根據種種例證，從奈良時代末葉以迄平安時代初期，東國人是極爲柔弱的。例如弘仁十一年（一四八〇），居於遠江和駿河的新羅歸化人七百人叛變，雖發二國之兵而未克鎮平，其間賊趨伊豆，大肆劫掠，發相模、武藏等七國之兵，才告救平。東國武士的強盛，是在武士發生以後，這是因爲他們練習武技的緣故。古代的道德，對於武

士的發達，雖或有幾分幫助，但武士發達的主要原因，却在於武士的主從的經濟的恩誼，世世相承襲。所以如果名君輩出，那末武士道就在其家臣之間發達起來。在東國武士道所以發達者，也因為東國自源賴信以降，累代屬於源氏的幕下，源氏的恩威極爲隆盛的緣故。特別是自從賴朝開設幕府於鎌倉以後，竭力獎勵武士道，提倡武藝，戒除卑怯，勵行廉潔質朴，於是麾下的士氣大張，鎌倉武士之名，歷久光耀不衰；而主君的恩誼極隆，爲主君拚死効力，這便是武士的忠義。從發達的最後看起來，是優美的道德，但發達的開始，却是經濟上的利益問題。武士也是人，他們爲衣食而勞動，立功勳而增俸祿，恩愛愈隆，武士便愈爲主君効力。因此，所謂武士道者，是狹隘的主從間的情誼。

武士道發達於源賴朝之時，完成於北條泰時、時賴之時。北條泰時和時賴二人，承襲賴朝的道策，以質朴勤儉率衆，獎勵尙武，施行仁政，於是天下靡然風從。

武士都尙武勇，習武技，發揚祖先聲名，戒除卑怯，視生命輕於鴻毛，大義重於泰山，自幼修養不畏死的精神。女子也都勇武貞烈。武士又酷嗜禪風，對於生死，能夠大澈大悟。於是奮勇作戰，誓立功名。因爲出入於生死之境，所以極重然諾，同情心極發達，對敵亦表哀恤。

這雖是武士道的精華，但亦僅是向來存在於武士的主從之間的情誼或習俗而已。武士所以爲主君捨身，實是希望將恩賞遺給子孫的緣故。

對於武士的忠君尙武，可以認爲家庭教育的相當成功，但武士道的精華，如果僅藉家庭教育之力，是無法獲致的。主君的仁政，對於武士道的發達，實有着重要的功效。

第五節 古典的教育

平安時代的模倣 鎌倉時代的學問藝能，幾乎全是承襲着平安朝的學藝。此種傾向，一直繼續到南北朝的時候。在室町時代，平安式的教育，雖也存在，但是已經很衰微了。自「院政」時代以後，朝臣都追慕着藤原氏的盛時，羨望着昔日朝臣的榮華生活。祇是失去了政權的公卿，已經沒有造成超過昔時盛況的景狀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僅是對昔日盛況的一種模倣而已。在平安時代發行不久即歸消失的住吉物語，在鎌倉時代，有與此同名的書籍的著作；奈良朝和平安朝的古典書籍，到了鎌倉時代，很多予以整理，且加古典的註釋。凡此種種，都是由尊重古典的風氣中產生出來

的事象。

大學寮與勸學院 凡事重視先例的風氣，極爲流行，雖然在實際上毫無意義的事，也是視作慣例，履行不餘遺力。朝廷的大學和藤原氏的勸學院，自前代起即已絲毫無補於人材的養成，依然舉行「貢舉」和「釋奠」，有若告朔的餼羊。但大學寮和勸學院終於次第廢滅：大學燬於治承年間的大火災，未經再建，即僅存的廟倉，其後亦歸消失，在南北朝之頃，孔子的像也遷到了花園上皇的持佛堂（園大曆康永三年八月十八年之條）。足利氏的末年，大學原址成爲一片草原。勸學院也於鎌倉時代末葉傾圮（康富記寶德三年九月七日之條，花園院宸記元應元年正月二十一日）。雖然這樣，但翻閱桂林遺芳抄和拾芥記等書，可以發見在室町時代，還有着大學寮以及「秀才」、「文章生」、「擬文章生」、「學生」等名詞，而且也有「試問」，恐怕都屬僅具形式而已。再者，根據上列兩書（桂林遺芳抄和拾芥記），文章院於治承以後亦未經再建，而以大學寮的廟倉充作文章院。至於獎學院和學館院，在平安時代末葉，恐怕也已經完全廢滅了。

和漢之學 前代如言學問，僅指漢學。「明法家」雖研究日本的律令格式，但此外的人，差不

多僅僅研究漢籍。對於日本的歷史，未有深切的研究，就是朝廷方面的國史研究，較諸漢學，也是微乎其微，不過有時讀讀日本書紀而已。但因和中國間的交通斷絕，對於中國的憧憬於以減少；另一方面，朝廷的慣例和古典漸漸增多，對於此等慣例和古典有明白的必要（參照本書第四章第四節）遣唐使停止派遣（一五五四）後約六十年即天歷六年（一六一二），大江朝綱爲歷博士賀茂保憲所作的上奏中文有云：

親父忠行（保憲之父）心究古今，學兼倭唐。

這是一「和學」一語之始，於是研究日本的風氣次第形成。雖然這樣說，但在平安時代，研究日本之風，尙未大興。及至鎌倉時代，在宇治拾遺物語、愚管抄、續古事談等書籍中，「和漢之才」及「和此相類的名詞，已是常見。在這種情形下，學問的外延，已是擴展了開來。但有如次項所述，學問程度的低下，却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家學的興起與學藝的衰運 藤原氏自奈良時代起，屢屢排斥他氏，集權力於一族。此種傾向，自平安朝初期起，更趨明顯，但當時還從貴族以外拔擢人材，官職也須世襲。自平安朝中期藤原氏

達於全盛的時候起，一切官職，都成世襲，如爲該氏出身，雖然無能也任要職，如非該氏出身，雖有長才也不被任用。大江朝綱於延喜八年（一五六八）在送渤海使節的詩序中，有着這樣的話：

前途程遠，馳思於雁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霑纓於鴻臚之曉淚。

其後該國的人聞悉朝綱還做不到三公，就說日本是不用賢才之國，而深表驚異。（註）在這種情形下，學問就漸漸地離開了廟堂。但在藤原氏的全盛期，因爲一切權勢集中於藤原氏之故，朝廷方面還是濟濟多士。自後三條天皇以後，藤原氏喪失權勢，「院政」起於朝廷，政令二分，於是天下的大政失其統一，文化日衰。在以前雖沒有不學無術的公卿的，到了院政時代，據古事談卷二的記載，却有着無學的公卿。

註：見於本朝文粹卷九及古今著聞集卷四等書籍中。

朝官成爲世襲，而各「道」的博士也世襲起來。自平安朝初期起，菅原和大江兩氏，代代產生學者，顯示出了世襲的傾向，終於文章、明經、陰陽、算醫等各道，都成世襲：

文章道

菅原

大江

藤原

明經道	清原	中原
明法道	中原	坂上
算道	三善	小槻
醫道	和氣	丹波
陰陽道	賀茂	安倍

這樣一來，不僅學問固定於氏，而且在技藝方面，這種風氣也瀰漫起來，而演成了流派。

當時的人們，認為在過去的歷史中有着黃金時代的存在，於是想在過去的鑄型之中，把文化伸展開來。偏偏是形式固定了的文化，是難以有顯著的發展的。但形式一經固定之後，如何才可以不越出此種形式的規定，就成了一種專門的研究。「和歌」也成一種學問，還有着專門的師傅。據袋草子中說，和歌的教學，以能因法師師事藤原長能爲始；此說雖不能無條件地予以信賴，但從能因之頃即平安末期起，和歌的流派已經固定，則是事實。此外，在書通、繪畫和彫刻方面，也產生了流派。因着流派的關係，各種學說，就成了一種秘密。即以「和歌」而論，自平安朝中葉起，構成了種種

繁瑣的拘束，指出歌詞的病點。據說凡爲古歌中所沒有的思想以及字眼，都是不可使用的。此種愚拙的規定，束縛了自由研究，妨害了教育的普及；但在另一面，因爲要令人遵守規則，於是寫成了許多教訓以及法則的書籍。師承祕傳的弊風，構成了此等書籍大量產生的淵源，這在文化史上並不是全無意義的事，而且是可以注意的事實。

平安時代貴族的學習，以漢學、音樂、和歌、習字四者爲主，前二者漸見衰落，鎌倉時代以後，習字和和歌，成了主要的學習內容。

第六節

武士與平民的教養

武士的學力 學問雖衰落，而教育却很普及。以前不爲人注意的地方，文化程度逐漸提高，武士本屬文盲粗野，其後逐漸學習文字，庶民也能相當識字。原來自武士獲得勢力地方政治進步之後，武士自不必說，卽以下層民衆而論，如果目不識丁，也是無法生活。當然，說是該時代的武士都有學問，自是不可能的事。惟對學問原無素養的當時的武士，雖然研究學問，也難望其精湛。但在戰爭

的場合，僅有武技，已可應付，若說對付平日的政務，如果全無學問，困難定所難免，尤以鎌倉爲賴朝以後文化的中心，一切以京都爲模倣，而將公卿的風俗移殖過來。迨鎌倉時代中期以後，武士都以兼習文武爲理想。其他地方，雖未能像鎌倉那樣熱烈模倣京都的風俗，但在鎌倉時代的末期，大多數的武士，都在其邸內，建設起「學問所」（書齋）及文章來。

武士的學習 武士的學習，大體上是習字和歌，聯句及武藝等。有身分的少年，從家臣中的精練者或父兄學習武藝。

平安朝的公卿，以學習漢學、音樂、習字和歌爲主，鎌倉時代，前二者（漢學及音樂）已告衰落；朝臣尙且如此，而武士程度更見低落，對前二者的學習，自益感覺困難。吾妻鏡仁治二年（一九〇一）十二月八日之條及同文應元年（一九二〇）正月二十日之條均記載着：以善於書寫、弓馬、踢球、管絃、歌道者服侍將軍，更足顯示當時優秀武士的重要學習內容，因此在知德方面，當時的武士，也有着長足的進步。

庶民的學力 當時庶民的學力，具有何等程度，雖乏積極的材料，但也可以察知大概。在平安

時代，佈告的揭示很少，到了鎌倉時代，佈告之揭示於市場及其他處所者，却是不一而足，這雖不足以證明下民全部都能閱讀佈告，但也是表明讀書能力已有進步的一個寒暑表。

教育的場所與學科 武士的研究學問，大多人寺院爲「兒」和將來豫備做僧侶的「兒」一同請僧侶教導。朝臣之子在寺院學習的也很多，平民之子爲「兒」的亦復不小。「兒」也叫「童子」、「少人」、「童體」或「垂髮」。凡不入佛道的，當加冠之時，便回至家庭。自從平安時代末葉起，此種風習，逐漸推廣，由於缺乏適當的教育機關，朝臣、武士甚至平民，往往遣其孩子到寺院去，使受知德的修養。在鎌倉時代的文獻中，時常可以見到「兒立」一語，這就是少年之時曾經做過「兒」的意思。

少年入寺院，叫做「登山」、「住山」、「入室」或「師仕」。大概十歲以前登山，十三四歲時，爲僧者落髮，非然者下山。在住院期間，普通都不歸省。

寺院之「兒」不論豫備爲僧與否，都於學習佛典之前，先讀簡易的書籍，並習書法。後來的「寺子屋」（學房）大概是以此爲始的。

習字與「往來」——平民和武士，無法作高深的學習，僅求熟識在實用上最必需的文字。文章中最實用的，當推信札。以信札爲習字帖，既可練習信札寫法，又可使書法純熟。因此，在鎌倉時代，最初步的學習，便是習字，而習字帖大多是信札。此種習字帖，叫做「往來」。

所謂「往來」，是信札往復的意思。這兩字的字義和用法，都和「消息」兩字相同。「往來本」的最古者，是平安朝中期藤原道長時代文章博士藤原明衡的明衡往來，明衡是出雲守，所以也叫雲州往來或雲州消息。稍後的是大學頭藤原季綱的季綱往來，但已非全璧。再後，在川堀天皇時代，有清水寺之僧定深所著的東山往來，在平安時代之末鎌倉時代之始，有內大臣中山忠親所著的貴嶺問答，御室的守覺法親王所著的釋氏往來。貴嶺是忠親的唐名。以上各書，本是僅以提供作文的模範文集爲目的，所以都是採錄信札而成。

然而要將上列各書兼用之爲習字帖，便非字跡較大不可，而信札自有減少的必要。所以從平安時代的末葉起，便僅採錄了二十四通，即十二往復的信札，分配於十二個月份，而成爲一種「往來本」。此種書籍現在還保存着全形的，且是最古的，是「十二月往來」。所謂「十二月往來」也有

兩種，其一大概是菅公所作，也叫做菅丞相往來，當係「院政時代」之物。其二則時代稍後，大概是平氏時的作品。至鎌倉時代之始藤原良經所著的新十二月往來，實是後者的模倣。

此等信札，徒尙形式，於實用方面，殊多缺點，所以在鎌倉時代的中葉，參議官菅原爲長，將信札中的短文語句，集成一冊，題名消息詞，這也是一種「往來本」。

南北朝時期的入道尊圓親王，在所著入木抄中，對世人多以「往來」爲習字帖，予以非難。於此可以察知「往來本」在當時如何流行的一斑。

大約在鎌倉時代，尙有不以「往來」爲名而實係「往來本」者，其較有名的如童子教和實語教，兩書都是偈文類。實語教據傳是空海所作，但內容平凡，且有不合於眞言宗的教義之點，似非空海所作，當係平安時代末葉或鎌倉時代初期的作品。童子教據說是叡山五大院的安然所作，安然是宇多天皇時人，但據種種考證，該書的著作時期大概是鎌倉時代或其後，現姑假定其爲鎌倉末期。

第七節 足利學校與金澤文庫

本節擬一述有名的足利學校和金澤文庫的起源。足利學校現尚存於下野的足利市。但該校在鎌倉時代的歷史，頗難明瞭。關於該校的起源，有着種種的說素：一說是大寶合的國學的遺制，一說是平安時代之初小野篁所建，但均無確證。第三種說素，說是足利義兼所創設。義兼是源義家的曾孫。其父義康，以領有的足利莊，獻於朝廷，自爲領主，支配該莊。因爲此種關係，所以時時上京都，仕於朝廷，父子均被任爲「藏人」。因感受京都的文化極深之故，於是在其第宅內，建造「學問所」，以供一族子弟的向學。其後該第宅成爲鑿阿寺。鑿阿是義兼的法名。在該寺內，根據義兼的素願，舉行講學。足利氏累世好學之士相繼輩出，而特別以尊氏和歌書畫，均極擅長，確非偶然之事。但因該寺和足利學校的關係，無從明瞭，所以義兼創立說，亦非確實。關於此事，當於下一時代（即本書第六章）再行敘述。

金澤文庫，在武藏金澤稱名士境內。北條氏自時政以後，亦累代好學。政子託菅原爲長將貞觀政要，譯成國字（樵談治要）。時政的曾孫實時，從明經的大家清原教隆學，早在邸內設立文庫。至文永七年（一九三〇）燬於鎌倉的大火，就在領邑金澤的別墅中設立文庫。實時歿於建治二年（

一九三六）所以該文庫的設立，當在建治二年之前。子顯時，孫貞顯的藏書，也經收入該文庫中。實時在別墅的一部設稱名寺，到了子顯時時，改別墅全部為稱名寺。該文庫在開始時當然是一族的私有，自北條氏滅亡後，移交稱名寺管理，因此非但最初並不公開，即在其後似亦迄未公開。但在鎌倉時代，此等私有文庫，為數實也不少。

註：本節參考下列各書者很多：八代博士的國史叢說中的足利莊的文化與皇室御領、金澤文庫、平泉博士的中世的精神生活、和大森學士的論考（中央史壇第十一卷第三期）。

第八節 女子教育

鎌倉時代的女子，不遜於江戶時代的女子。北條政子之外，女子之活躍於政治上者，頗不乏人。女子的修養，在技能方面，如習字、和歌及琴等，略與前代相同；新的科目有日本史的研究。而在德育方面，隨着時代的趨向，對於女子的貞操，極為重視。在庭訓中警戒女子，不可隨意與人來往信札；態度須肅靜；心須鎮定，女子的此等修養，都在家庭中習得。鎌倉時代的女子，也並不學習漢學的

知識，所以在普通的場合，都沒有在家庭以外從師的必要。

第六章 室町時代的教育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鎌倉幕府自「弘安之役」後，因財政發生破綻，民心離叛，後醍醐天皇乃一舉推倒之，把王政復古起來（一九九三）。但當時的公卿，毫無參與天下大政的實力。又因武家雖屬官軍，而起義兵，但大多數，原為滿足其領土慾，所以王政雖經復古，仍未悉數服從朝政。時勢要求足利尊氏的出場。如果武家的棟梁不任將軍，以號令天下，天下就無從承平。南北朝五十餘年的抗爭，實際上，不過是延長承久之亂而已。

在此種情形下，朝廷的無能和武家的實力，已極顯然，公卿為武士所壓迫，而愈失其權威。尊氏將皇室的統轄地，以及朝臣和社寺和領地等的稅收的二分之一，作為軍事費的財源，收入幕府，於是皇室在經濟上受到重大打擊，而貴族也在經濟上大受影響。

尊氏爲收攬武士之心起見，極力優待武士，而給與許多領地。於是諸將逞其勢力，對幕府並不傾心服從。原來從鎌倉時代末葉起，武士已有利己的風氣，到了這時，更重利而輕義。三代將軍義滿，整頓幕府的組織，恣其權威，但義滿薨後，局面再起動搖，幕府權勢於不知不覺中移於「管領」，更移於「管領」的部下。武士因生活奢侈，便向庶民徵取重稅，他們對於庶民的窮乏，毫不顧及，一意誅求。庶民不堪其擾，於是或逃亡四方，或流爲盜賊，正直者餓死，貪得無厭的武士，向「領家」奪取支配下的土地，不納收益，並由爭戰以蠶食四方，這時代不斷的發生戰爭，除却滿足他們的慾望以外，殆無其他目的。

處此可怕的實力競爭的世界，當公卿墨守形式和因襲的時候，武士仗其一己的實力，以求滿足其慾望。皇室威光因以浸衰，公家窮乏，庶民貧困，社會秩序紊亂，名分破壞。但武士本身並無文化，於是權勢雖由武士掌握，文化却仍向公卿及僧侶學習。

因爲是實力競爭的時代，倘有主君愚昧，其部下便取而代之。以前賣油道旁的齋藤道三，也一躍而爲美濃一圓的諸侯。將軍的權威移於「管領」，「管領」中最有勢力的是細川氏，但細川氏的

權勢不久就移歸於其「家臣」三好氏，三好氏更將其勢力移於部將松永氏。晚輩將長輩的地位取而代之，當時稱爲「下剋上」。鎌倉時代以來的舊家，到了室町時代的末葉，已是多數覆亡。在這期間，皇位的尊嚴，依然光耀有如昔日，皇室在經濟上雖略感困難，但在國民的心中，一天萬乘之君的威光，並未爲之稍殺。

在這時代，平民感受壓迫，也並不全是默爾而息，他們有時流爲暴民，反抗「地頭」或襲擊富豪。而商人階級的勃興，尤爲顯著，在商業上擁有特權的「組合」，雖在前代已有，但此時代更爲發達。再者，在這時代的末葉，兵庫和堺等都市，已經發達起來。戰爭繼續不斷，諸侯對武士的補充，發生困難，而以暴發的諸侯爲尤甚，他們就雇用「足輕」。一條兼良的樵談治要中，對於「足輕」的爲害，至表憤慨。原來無道德無訓練目的僅在衣食的「足輕」，在強敵之前，固然祇有逃的一法；但在防備薄弱的所在，就破壞狼藉，無所不至，滅社寺，闖入貴族富豪的邸宅，而且耽於淫酒賭博。「足輕」的弊害，却也促成了庶民的興起，和歌和聯句在庶民之間流布起來，「寺子屋」（學房）已經開始，熟識文字的人漸多，在此情形之下，文化已非公卿和武士的獨占物。在向來尊貴的諸侯以及僧侶中，其

修養有較劣於平民中的某一個人者，平民就拍手嘲笑，這種例子，在狂言記中記載得很多。在種種傳說中，當時平民的興起而構成新的勢力，是不難察知的。

第一節 家庭生活與教育

從太古以迄鎌倉時代之間，男子往女子家完婚的風習，逐漸發生變遷，到了室町時代，女子都嫁往夫家，嫁娶的儀式已經確定，一夫一妻的習慣，也已完全普及。至鎌倉時代以前，所生孩子對於母親，較今日尤為親切，而對父親則較疏遠，這是在上面各章已經說過的，但到了室町時代，恰相反，的成爲父親。於母親子之愛，在鎌倉時代較在平安朝以前已大有進步，在室町時代進步尤多。親的慈愛和子的孝養之所以超於顯著，其最大理由，即是自鎌倉時代以降，家族的經濟，都仰賴於父祖之功勞，而親子關係的趨於密切，也不失爲其理由之一。

妊娠的第五月，舉行「着帶」這是前代（鎌倉時代）傳下的風俗。臨娩之月，移居「產屋」。呱呱隨地後，以竹篋切臍帶，然後請「經產婦」授乳，又於「產屋」之前置白邊的席子，以鳴箭射

之，所產孩子爲女射二箭，男射三箭。「產湯」之前，舉行「湯始」的儀式，並擇吉日（普通是在第七日之夜）着「產衣」，稱爲「着衣之慶」，又於第七日剃胎髮，稱爲「髮垂」。初夜、三夜、五夜、七夜，都舉行祝賀儀式，並於七夜命名。九夜以前都穿白色衣，第九日之夜更換，叫做「改衣」。過了五十日或百日，母子同往參拜產土神。

男女孩的「魚味始」（第一次食魚）早則百二十日，遲至三四歲。三歲時選吉日舉行「留髮之慶」，其後舉行「着袴之慶」。有遲至五歲時的。再後，在適當的年齡，舉行「甲冑始」、「弓始」、「乘馬始」等儀式。戰國時代的武士，有於十一歲時出陣的，所以在十一歲以前，大概就要學習騎乘以及其他武藝。將軍義勝，自幼好騎，墜馬夭折，時爲十歲。此外，「讀書始」和「習字始」的儀式，在七八歲時舉行。其後，在適當的年齡，舉行加冠的儀式。在加冠之前是童形，加冠之後，進入成人之列，可以敘位任官。在身分高的家庭，幼少時即可敘位任官，所以有提前加冠的必要，因此在十歲以前加冠的，亦非鮮見。義勝於九歲時即行加冠。至民間的加冠，則遲至十五歲。

關於兒童的遊戲，在異制庭訓往來和遊學往來中，列舉頗詳。主要者有毬技、打鼓、竹馬等。其他

角力等武勇遊戲，也極爲流行。

第二節 道德心信仰心與教育

道德心與教育 室町時代是學問和道德衰落的時代，普通以該時代比之於歐洲的中世紀，而稱爲黑暗時代。這種比較，在本質上是否有相同之點，現在姑置不論；但稱之爲黑暗時代，在某種程度之內，也許是正確的。因爲是「下剋上」的實力競爭的時代，所以大家只管利己，對於他人，毫不顧及。個人福利第一，將公共利益置於腦後。正直廉潔的人，對於政治，表示絕望，於是不爲社會努力，崇尚個人主義和獨善主義，在樂天自在中，如夢幻一般地將短短的一生渡過。

這時代的教育，很顯著地以出身榮達爲標的。以學問修養爲榮達的階梯，雖在任何時代均所不免，但像室町時代的露骨表現，當爲其他時代之所罕見。

宗教心與教育 室町時代或許是日本史上佛教最占優勢的時代。佛教滲入於上中下一切階級，信仰佛教成爲一種習慣。各種社會現象，都和佛教相結合。而且此種信仰早經形成石化或

形式化了，所以充滿着迷信。在平安時代和鎌倉時代，迷信雖也盛行，但這僅是關於己身及和自己有着最深關係的人們的吉凶的迷信。到了室町時代，迷信的範圍，大見推廣。

因爲迷信的關係，在學問方面，就沒有任何自由的獨創的研究。在鎌倉時代，除掉尊尙古典加以註釋並從事模倣外，平家物語和源平盛衰記等大文學，爲數極多，但在室町時代，僅有太平記和增鏡等數書，此外別無鴻篇大著。循致學問陷於非常貧乏，又因社會秩序的解體，學術的研究，更見式微。

第四節 朝臣及武家的教育

朝臣的教育 太平記卷二中說：

詩歌係朝廷的所翫，弓馬乃武家之所嗜。

同樣的話，也見之於義貞記和北條五代記卷八。這就是說：朝臣以習文爲主，武士以習武爲宗。公卿武士分習文武，以効忠君國，原是各時代所皆然，但此種現象，似以室町時代爲尤著。

當時朝臣的教育理想顯未脫却平安朝的範疇。又因「和歌」和聯句較爲容易，於是競相學習；對於漢籍，則很少研讀。

在「和歌」和聯句兩者中，前者是古典的，且不適於娛樂，於是自鎌倉時代開始擡頭的聯句，在室町時代，大爲流行，且訂出詳細的規則來。

在「和歌」和聯句之外，對於漢籍及掌故，亦非全不研究。當時也有二條良基、一條兼良及其子一條冬良等學者。又菅原氏的子孫，分爲高辻、五條、東坊、城、唐搆等諸氏，清原氏也分爲伏原氏、船橋氏，各各繼承家學。特別是自室町中期以後，清原氏曾產出不少學者，其中尤以船橋氏最爲有力。但上述諸氏的研究，僅及古典的糟粕，而並不是獨創的新的研究。

武家的教育 鎌倉在起先原以兼習文武兩道爲理想，直至室町時代，但因戰爭屢起，雖仍學文，終不免重武而輕文，於是武藝大爲發達。在鎌倉時代以前，注意弓射及馬術，自鎌倉時代末葉起，戰法發生變化，劍術次第發達，至南北朝，槍也開始使用，於是在戰場上，劍和槍尤較弓矢爲必要。自室町時代末葉起，逐漸形成流派，以教授武藝。塚原卜傳等，便是有名的劍客。天文十二年（二二〇

三、洋鎗開始傳入，當時恰當國戰爭亂之世，所以此項新式武器，極爲各諸侯所歡迎，於是立即推廣到諸國，天正三年（二二三五）「長篠之戰」中，織田、德川二氏的所以能摧毀武田氏的精銳者，也就是因爲使用洋鎗的緣故。

武士道鎌倉自時代末葉開始衰落，陷忠良逞私慾者漸次增加，於是釀成戰國時代，引起天下大亂，但自戰國中葉起以迄江戶時代的開始，武士道在名將的指導之下，放射了萬丈光輝，其中德川氏的「一家臣」尤爲聞名。

武士雖喜愛文學，但因缺乏素養，未能從事高深的研究。據伊勢貞親教訓所載，武士除武藝外，並學習淺易的「和歌」及聯句。又在相傳係南北朝時期的斯波義將所著的竹馬抄中，曾經列舉出武士的各種藝能，是歌、詩、管絃、音曲、聯句、弓箭及圍碁、象棋等。竹馬抄的此項記載，除圍碁及象棋等遊藝外，較諸吾妻鏡中所載的武士學習的內容，多出詩和聯句兩項。詩的增加係受「五山文學」的影響，但在普通的一般武士，深恐難於企及。

教育的場所 朝臣和武士研究古典以及其他學問時，多數是在寺院（將軍義尚却師事一

條兼良）關於此層，當於下節加以詳細研究。

當時京都和鎌倉的「五山」（註）是漢學的中心。程朱學就是在這裏興起和育成的。當京都學問衰頹之際，在薩摩提倡朱子學，而爲江戶時代儒學的勃興着。一先鞭的桂菴，就是曾經在「五山」學習的人。在「五山」且曾有人以「口語」註釋史記及三體詩，其不拘舊習，彌足珍貴。關於桂菴的言行，擬於次章第二節中加以敘述。

足利學校和金澤文庫，經上杉憲實之手得告復興。但金澤文庫却似始終未經開放。且在戰國時代，又陷於荒廢之境。足利學校於永享十一年（二一〇九九）經憲實再興，寄贈圖書，並規定圖書的保存和閱覽的規程，其後又於文安三年（二二一〇六）訂定學規，惟限制僅講儒學，其後於應仁元年，長尾景久將該校自「政所」（即以前上杉氏的衙署）遷至今日的地點。據渡邊博士之說，謂「政所」在足利之東約一里的毛野村（史學雜誌三十五卷二號）從此看來，該校原不在足利，其與鑊阿寺的直接關係，也無從明瞭。總之，關於可以說明足利學校的起源的材料，今日尙付缺如（參照第五章第七節）。

足利學校自經憲實復興之後，累世校主均爲禪僧。特別是像戰國時代的第七世校主九華和尚，在校任職前後歷三十年，受教的弟子達三千人。在任中舉行周易講解「百日會」一有十六次之多，聽講者達百人。這時候是該校的最盛時期，在東國的海隅僻陬尙有如此盛況，所以室町時代也不能說是文荒學廢之世。但當時的生徒，據說大部分是僧侶（寒松稿）校內並有藥師如來佛的奉祀。

註：京都的「五山」是指以南禪寺爲首的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等六寺而言；鎌倉的「五山」是指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妙寺等五寺而言。

第五節 「寺子屋」的發生庶民的教養

庶民的教養 當貴族浸潤於舊思想中的時候，情勢漸轉，庶民的勢力日增。庶民也和以前武士學習貴族的文化同樣，學習起貴族的文化來。環境於國民所尊崇的宮廷周圍的貴族的生活和文化，不僅是武士，而且爲一般平民之所憧憬，偶承朝臣訂正「和歌」或贈與詠稿，這在平民是無上

的光榮，

室町時代是平民擡頭的時代。雖然大部份平民，還是文盲，但勤於讀書和習字的，當已逐漸增加。伽草子和狂言中，很多記載着平民遇到了知識或是技能上的難題，立刻到書籍中去尋求解決。平民詠歌的例證，不一而足。狂言中的「竹子爭」，便是以詠歌決勝負的遊戲。在伽草子中，漁夫的浦島，販魚的猿源氏，和度着流浪生活的物臭太郎，都能歌詠。此外並仍學習聯句。

平民習字的例子，也數見不鮮。至於平民的其他藝能，據狂言的記述，尚有弓、碁、角力等項，關於此等藝能，在鼻取相撲和今參中，也有着相同的記載。

「寺子屋」（學房）的發生，並不希望做僧侶的「兒」即俗弟子到寺院去受教育，這在鎌倉時代，已非罕見（參照第五章第六節）。到了室町時代，更激增了起來。著名的武士，以俗弟子的身分入寺的例子，在前代雖不多觀，但自南北朝之際起，已逐漸增多。伊賀國關岡家的祖氏清，在正平元年（一一〇〇）六歲時，赴東福寺的海藏院研讀（關岡家始末）。桃井直詮於應永九年（一一〇六年），上叡山習學問。太田道灌自嘉吉元年（一一一〇）一九歲時起的三年間，在鎌倉的「五山」攻讀

（永享記）上杉謙信自天文六年（一一九六）七歲時起，在越後的春日山林泉寺學習。織田信長在天文十五年十三歲時，登名古屋的天王坊學習。

在文學上記述使兒童入寺求學的例子，較諸前代，也有顯著的增加，如柿本之系圖、花密、嵯峨物語、鳥部山物語、松帆浦物語、謠曲仲光、同丹後物狂等都是。遍覽此等書籍，可知入寺的人，遍及朝臣、武士、平民等一切階級。入寺求學的人既多，教育也就成爲有系統和有組織，其中且已有和江戶時代的「寺子屋」相同的組織。腹不立（是狂言的一種，其寫作年代不明，大概和其他狂言相同，是室町初期的作品）曾述其內容，說是迎接住僧到鄉間的草堂，託其教授村童習字。當然，「寺子屋」的名稱，是到了江戶中期才有的，且江戶時代的「寺子屋」雖也有由寺院經營的，而以寺院以外所經營的爲多；但如果以腹不立中所述的情形，和江戶時代的寺院所經營的「寺子屋」相比較，可知兩者實屬完全相同。因爲這樣，著者認爲在室町時代，已經有「寺子屋」的存在。

在「五山」學僧的詩集中，有以實現兒童教育的寺院，視作學校，而稱之爲「村校」的。例如幻雲詩藁卷二中有題爲村校新涼的絕句如下：

去歲入京初學書，炎塵撲面掃難除；
秋來憶見鄉村好，麻骨燒殘涼雨餘。

這是詠別離鄉里入京都某寺研讀的情景，題中所說「村校」大概並不是指「五山」等大寺，而是指某一小寺院。腹不立中所述，生徒是每日走讀的，和後來的「寺子屋」相同；但上引村校新涼一詩，却說明是寄宿於寺院之內，這一點是和後來的「寺子屋」不同的。織田信長的每天登天主坊習字，這也是走讀的一個例子。在室町時代，已經稱入學爲「入寺」。入學年齡和在學期間，和上面說過的鎌倉時代的寺院的「俗弟子」教育相同，在十歲以前入學，住山約三四年間。

「後三年」合戰繪詞一書，成於貞和三年（二〇〇七），有玄慧的序文。該書係直觀的以表示源義家的軍功，遂請畫者繪製，以便教授之用。即無法以實物示教的，亦利用繪畫來而出之，此種教學上的周詳整備，見於距今約五百八十年之前，實是日本教育史上的光榮。

「俗弟子」入寺的目的，第一是德育。至於知育，因爲漢學和音樂已經衰微，乃以習字爲主。尤其以武士和平民，自前代以來，本以從事習字爲主，所以在寺院中的知育，也是側重於習字。享德四

年（二一一一五）戰死的千葉胤宣，幼時曾在下總國金剛授寺的中納言坊學習書法，德川家康之臣榑原康政，幼時曾在能見的松應寺學習書法。

描述寺院中「俗弟子」生活的書籍，可以舉出毛利家之臣玉木吉保的自敘傳身自鏡。玉木吉保於永祿七年（二二二四）十三歲時，到一個叫做勝樂寺的小寺院去，修學三年，在該時期中所獲得的知識，有如下述：

十三歲 習字 「假名」文 漢字

讀書 心經 觀音經 庭訓往來及其他「往來本」 貞永式目 童子教

實語教

十四歲 習字 繼續去年

讀書 論語 朗詠集 四書 五經 六韜 三略等

十五歲 習字 學畢漢字的草書行書，改習楷書。

讀書 古今集 萬葉集 伊勢物語 八代集等和歌、聯句、「能樂」（日本古

代的戲)

他不單修養知育，還每天洗手結髮，禮佛拜祖。師道極嚴，毫不假借，專心學習時予以褒獎，懈怠時以杖擊之。但師生感情極厚，下山後仍不絕音問，恩師圓寂後，感恩之情仍不稍衰。這樣博學之僧，不易找到，普通的僧侶，學殖往往有欠湛深，其在寺院中之以習字為主者，和這一點想也很有關係。

「往來本」和「節用集類」——節用集的著者，有人說是林宗二，但據對古本節用集有極深研究的橋本文學士說，該書是室町中期的作品，而為建仁寺僧人之著作。

文安元年（二一〇四）有下學集的出版。除節用集和下學集外，還有着種種辭典。節用集是簡易的辭典，便於庶民的使用；下學集據其序文所說，是初學者所用的簡便的字典。

以前的「往來本」一方面是信扎的模範，同時又是習字帖（參照第五章第六節）但自南北朝之際起，想藉信扎的形式，以教授常識，其最古的，是應安六年（二〇三三）叡山的實嚴僧正所著的山密往來（著者是叡山的三密的學者，故名）該書載有二十八封信扎。其後，於南北朝末葉，又有和山密往來同其形式的異制庭訓往來和庭訓往來。異制庭訓往來，雖然似乎較庭訓往來

爲後出，實際上却是前出，其名稱是後人加上的。庭訓往來係從異制本中化出，而較爲通俗化。有人說異制本是虎關師練所作，庭訓往來是玄慧所作，但兩書的出版實在該二人的時代以後。該書都有武家的色彩，更後又有和該兩書同其形式的而同時又含有朝臣色彩的遊學往來。極端表現以教授常識爲本位的，是室町中期的新撰類聚往來，該書於每月的信扎之後，都附有官位、氏姓、魚鳥、國郡等表格，是夢想國師第四代法孫丹峯和尚所撰。

和鎌倉時代的消息詞（參照第五章第六節）同其形式而又列舉各種常識的，始於京都四條金蓮寺的素眼阿彌陀佛在康曆二年（二〇四〇）所著的新扎往來。足利氏開始時的雜筆往來，和室町中期的一條兼良所著的尺素往來，亦屬此類。

但列舉各種常識的「往來」的文字，雖然採取信扎的形式，但因過於呆板，所以不適用於實用模範文之用。又因在一冊的「往來本」中，無法收集所有的常識，於是信扎讀本的「往來」和常識讀本的「往來」就分化起來；但後者總是墨守着從前的形式，而以信扎體裁的文字寫成。至專供信扎參考的「往來」係採集舊時信扎而成的，在應永十年（二〇六三）的有採集鎌倉末期的信扎而成的

十二月消息；新的著作，則有文明十八年（二一四六）的消息往來。消息往來一書，也是依着十二個月的次序，而以排列信扎。常識讀本的「往來」第一是歷史類，以建久四年源賴朝在富士打獵的情形爲題材，而寫成信扎的富士野往來，爲室町前期的作品；「應仁之亂」而後，不久就有應仁亂消息的產生。歷史類的「往來」並不依月份的次序排列。關於茶道，有室町前期的喫茶往來。到了室町末期，則於捕鷹有蒙求臂鷹往來（松田宗岑作）習字有手習學往來，而於聯句，則有會席往來。

在尺素往來和蒙求臂鷹往來以外，除却著者不詳的以外，凡屬「往來本」都是僧侶所作，這是教育操於僧侶的一個證據。又下學集一書，是將當時通常所讀的書籍的語句加以註釋的，其註釋的範圍，包括下列各書，即：童子教、實語教、庭訓往來、雜筆往來、琵琶引、長恨歌、樂府、和漢朗詠集。貞永式目一書，當時很多採爲教科之用。

註：本節參考平泉博士的中世的寺院與社會的關係和石川謙氏的日本近世教育史（倫理教育講座所載）者頗多。

第六節 童話的發達

「童話」一語，殆始於江戶時代末期山東京傳所著的童話考。南北朝時代的異制庭訓往來的「正月之消息」載有所謂「老翁老婆之物語」者，即是指童話而言。由此可知，當南北朝之際，民族童話已爲兒童所愛好。所以稱爲「老翁和老婆」者，大概是因爲童話的開端，多說「從前的時候，在某地方，有一個老翁和一個老婆」的緣故。

日本可說是童話較爲豐富的國家，現在果要找尋日本童話發達的蹤跡，而爲今日兒童之所喜者，以自室町時代至江戶時代初期，材料最爲豐富。原來自室町時代以迄江戶初期，是一個熱心蒐集童話的時代。童話的內容，有屬於史實方面的，有屬於創作方面的，也有屬於傳說方面的。

第七節 女子教育

在日本，婦人的地位，決不是從古代起就低下的，婦人地位的低落，實始於室町時代。嚴密說起

來，在室町時代中期以前婦人還是很有地位的。

女子地位的形成低下，與儒教的「三從」「七出」以及佛家的「五障」等思想，固不無關係，但這僅是細小的原因。如果此等思想是根本的原因，那末在此等思想輸入以前，也就不會有男高女卑的現象了。所以真正的原因，當是女子的嫁往男家。此種女子嫁往男家的風俗，是在室町時代完成的。自此以後，女子便完全受男子的支配和束縛。此外再加上了儒佛的思想，特別是儒家的「三從」思想，女子所遭受的束縛，便更爲深刻。

據說是一條兼良所著的身形見中，詳叙當時女子對容姿起居藝能等各方面修養：學習歌詞、書法、琵琶等，略和平安時代相同；至在上流社會中，對裁縫等婦功的修養，雖並不重視，但對於德言，却極爲注意；武士之妻亦然。在小說秋道中，讚美一個名叫秋道的武士之妻，能夠服從夫命，品性貞淑，且善於彈琴、琵琶、繪畫、習字和歌。大概當時中流以下的女子，想必沒有相當的教育。此點雖經史料證明，而當時平民之妻，也有能讀朗詠集的，所以也就不能說是全無教育，但因女子不能像男子一樣，到遠方去求學，而祇能在近處的寺院或直接向父母受教，女子在此情形之下，自然難期得

到深湛的學問了。

第七章 江戶時代的教育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在戰國時代的破壞過程中，自然地發生了統一的機運，織田信長首先着手統一運動，但中道逝世，其部下豐臣秀吉完成統一大業，揚威海外。秀吉薨後，其嗣秀賴年尚幼少，海內頓現不安，其時德川家康開江戶幕府，運用巧妙的政策，滅亡豐臣氏，開始了三百年太平之基，如果以信長以後爲近世，平安時代之末以後爲中世，那末在近世和中世兩者之間，實有顯著的差異。

當自平安時代移向鎌倉時代之際，政權也移向武家。自是以後，政權就跟着源氏、北條氏、足利氏的順序推移，一直延續到織田、豐臣和德川氏。自源氏的時候起，政權的中心離開朝廷，但天下的大勢，依然以朝廷爲中心而推動。源賴朝是生長於京都的人，他的嗣子也會受公卿式的教養。其後藤原氏任將軍，接着由親王繼任。足利氏因住居京都，所以公卿化的程度很深。模倣貴族的生活，是

武士的理想的一面。北條氏和足利氏，雖然專橫，但尊崇皇室，不遺餘力。織田氏和豐臣氏亦然。德川氏却運用巧妙的政策，完成了足利氏時代所產生的封建制度，而且樹立了堅固的中央集權制。未具實權的朝廷，更以喪失其實權，而僅成一詠歌之府。「元和元年（二二七五）的公家法度十七條，表面上雖像沒有什麼，實際上却是有力地束縛了朝廷。朝廷成爲政治的中心在公卿躍起之時，便是幕府崩潰之時，也即是武士階級滅亡之時。」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平民力量的表現。在江戶時代，近代的色彩顯著地趨於濃厚，平民都睜開眼睛擡起了頭來。以前，英雄指揮民衆，貴族站在前頭，這種傾向，隨着時代的傳遞而趨於澹薄。在室町時代，平民雖已勃興，但平民本身的文化尙未十分發達。到了江戶時代，階級之制極嚴，所謂士農工商，武士實位於三民之上。而爲支配階級，但這僅是政治上的情形。其他如產業固不必說，就是在學問、藝術和風俗等方面，平民（特別是商人）也已經成爲指導者了。盡瘁於民政的賢侯之所以輩出，雖有着種種理由，但根本原因，當在於民衆對於惡政，已不復忍氣吞聲地唯命是從。佐倉宗五郎等所謂義民之名聲震遐邇，拮抗將軍麾下親兵的俠客則被嘖嘖稱譽爲英雄，都足以表示民衆勢

力的增大。和武士階級的崩壞恰成反比例，而平民勢力繼長增高，以迄於現代。

如果以近世江戶時代的文化和以前的文化相比較，便可以發見兩者之間顯著的差異。室町時代以前的一切文化，都以佛教爲其背景，就是講漢學、作漢詩文的「明經」、「文章」博士，也不忘念佛。但到了江戶時代，知識階級便輕視佛教，而倡言惟有儒教才是真正的道。從前說佛教的「五戒」——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見毘尼藏經——和儒教的「五常」是相同的，但到了江戶時代，儒者便攻擊佛教爲異端。而且在太平之世，武士要支配農工商，倘依然像從前的那樣欠缺學問自是無法做到。在昔戰亂頻仍，文化停滯，武士縱屬缺乏學問，尚可應付，但有遠見者依然提倡文武兼修。到了江戶時代太平之世，武士不僅應具民政上的修養，還應在道德上堪做三民的模範。在這種情形下，出世的佛教，便失其效用，便不得不採取以治國平天下爲理想而以修身齊家爲主眼的儒學。在江戶時代，佛教所以失其勢力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這裏。以教育而言，也因這個緣故，而變成了儒教本位。

平安時代以來的舊文化，漸次衰微，以迄於室町時代的末葉。至平安時代末葉以後的人們，追

幕並模倣着平安盛時代古典文化，因此故步自封，墨守陳法，而且各立學說門戶，喜守祕密。在這種情形之下，文化就停滯起來。直至江戶時代的人們，却解脫了這種束縛，自由地從事研究，打開了新的方向。「祕密」全被拋棄，以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平安鎌倉時代的儒學，一切根據「古註」，「室町時代」雖然部分地依從「新註」，但仍以古註為主。到了江戶時代，就差不多完全根據新註，從事研究，僅有一部分學者是依然根據古註的。至於國學方面，以前在大體上是以平安朝為中心研究對象的，但江戶的學者更進一步，而以奈良朝以前為研究的主题。

再者，像江戶時代那樣久遠地持續太平，在日本歷史上並無前例，就是在外國也可說是絕無僅有。其所以久遠地持續太平者，一般地說起來，是幕府政策的巧妙運用，嚴格地說起來，是鎖國的實施。德川氏之初，因疑懼天主教的異圖，想有以滅絕之，於是嚴禁曾經盛極一時的海外通航，國外貿易僅許萃集在長崎一區，而且只許荷蘭人和中國人在該地貿易，對貿易數量也予以限制。在此種禁限之下，自有相當的損失，但因當時的國外貿易，都須支付金銀，於是貴金屬大量流出，國內現金減少，所以在鎖國以前，國外貿易本已漸趨衰微。而在他方面，却因鎖國關係，發生了極可喜的現

象即是國內極臻靜穩，歲歲太平，干戈絕迹，學問藝術的昌盛，得未曾有，日本固有的文化，獲得充分的發達，也實因此之故。當幕末之世，雖有西洋各國的壓力，但絲毫不能損及日本的國運，且竭力學習西洋的文物，成就了可驚的發達，三百年太平的歲月，築就了維新後的發達的基礎。如果不實施鎖國政策，那末反對德川氏的諸侯，或許會利用天主教以抵抗德川氏，幕府基礎歸於破壞，因此不免造成了像室町幕府那樣的叛亂不絕的時代。

第二節 文運的復活

武士道的獎勵 秩序紊亂的戰國時代，及至織田信長上京，也次第成熟了統一的氣運，從黑暗之中，透露出太平的曙光來。弱小的諸侯為強大的諸侯所併合，強大的諸侯為涵養民力及改良民政振作士氣起見，於是竭力獎勵武士道，此種獎勵，獲效殊多，像「關原之戰」之際，堅守伏見城的家康之臣鳥居元忠，就是視死如歸地作了壯烈的犧牲。在女子方面，崇尚貞烈的也很多，在這裏不再一一予以贅述。

武家學問的獎勵 有力的諸侯，於獎勵武士道及武藝之外，還獎勵文道，不遺餘力。

在「五山」（參照第六章第四節）發達起來的朱子學，到了桂菴玄樹，獲得了巨大的進步。

桂菴於應仁元年（二一二七）被選使明，歸國後便在各地講學，文明九年（二一三七）應菊池重朝之聘，到他的食邑去說教。詩僧橫川景三曾作詩盛讚當時菊池氏食邑文化之盛，詩云：

方外論交行化餘，參寥玉局不曾如；

西州風俗聽人說，戶戶民村夜誦詩。

翌年，桂菴赴薩摩，仕於島津忠昌，終生居其地，提倡朱子學。他的弟子月渚英乘，月渚的孫弟子南浦文之等俊彥，相繼起於薩摩，所以在九州的南隅，朱子學派早已隆盛起來了。藤原惺窩的研究，得力於南浦的影響不少。長門的大內氏從足利氏開始時候起，即以富強聞名，到了戰國時代，山口地方的繁榮，已經超過京都，成爲和朝鮮及中國間交通的大中心，衰落的公卿來居的極多，桂菴就是該地出生的人。大內義隆尤爲好學，自京都招學者前來講學，並在山口出版書籍，義隆因耽於驕奢，終於亡家，而由毛利元就領有他的故地。其子小早川隆景，領有肥前二筑，模倣足利學校（參照

第五章第七節及第六章第四節，設學校於糟屋郡名島，准許士庶入學（日本教育史資料卷八，好事做事卷八十四）。又山口的南村梅軒，於天文年間，赴土佐教授朱子學，其弟子如淵及忍性，在長曾我部元親所建的學校中，每月舉行講解六次，同窗天室之門有谷時中，時中之門有山崎闇齋。此外獎勵文道的諸侯尚多，在他們之中，當有創辦講學機關者，但不能詳悉究竟。且豐臣秀吉曾在伏見城設立「學門所」（太閤記卷二十二）便可推想與此相同的事，諒不在少數。

德川家康的獎學 德川家康開三百年昇平之基的時候，文物燦然，教育也一新面目。家康本以馬上得天下，但不能以馬上治天下，所以很想提倡文教，又爲幕府起見而建立極巧妙的政策並且頒佈制度，因此極想稔悉歷史和古代法制。加之他自己對於學問甚感興趣，所以屢次招致各方面的學者，採集各方面的知識，並刊行古書，以期有裨於世。文祿二年（二二五三）招藤原惺窩，聆其學說，慶長十年（二二六五）召惺窩的高足弟子林羅山，以備顧問。又曾於慶長六年，在山城的伏見建立學舍，命足利學校的校主三要元信任教授。三要在伏見建圓光寺，就住在其內。這時候，在朝廷方面，後陽成天皇注意學術，於文祿二年令以活字出版孝經。其後又令刊行綿繡段、勸學文、日

本書紀、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等，家康悉心模倣，以活字賜與三要，命其於慶長四年出版孔子家語，翌年出版貞觀政要，其後更在靜岡出版吾妻鏡，又命「五山」抄寫古書。至於「金澤文庫」(參看第五章第七節)在戰國時代，已是大見荒廢，到了慶長年間，更形毀壞，家康將其藏書的一部，予以整理，而於慶長七年移入江戶城內的富士見亭文庫。該文庫又於寬永十六年(二二九九)移至同城內的紅葉山，所以又叫紅葉山文庫或楓山文庫。其後復於慶長十八年，企圖在京師建立學校，以惺窩爲祭酒，從事教育英才，但因發生「大坂之役」，不久家康薨去，終致未克實現。

家康曾發布武家法度，其開端有如下的規定：

文武弓馬之道，應悉心學習。文左武右，係屬古法。弓馬爲武家根本，惟兵凶戰危，應於不得已時用之，所謂有備無患是也。

第二節

天主教與教育事業

天文十八年(二二〇九)葡萄牙耶穌會的法蘭西斯科沙維爾(Francisco Xavier)來

鹿兒島，傳布天主教，因得大友氏等熱心信仰，於是立即遍及全國。天主教傳來後約三十年間，即當信長的晚年之際，寺院已有二百，信徒達十五萬人。

天正七年（一二三九）自印度來日本的亞歷山特勞，凡立乃宜（Alessandro Valignani）負責管理日本的耶穌教徒，竭力發展教育，先在肥前開神父會議，決定將來的教育方針，繼又請在肥前的有馬晴信的城下建置學林（*Collegio*）和修業所（*Seminario*），翌年復請於豐後的大友義統及豐後府內建學林，並於豐後臼杵建修練所（*Provigate*）。天正九年，凡立乃宜來京謁信長，請准於近江的安土建修業所。修業所為授予上流少年以天主教教育的機關；修練所是訓練耶穌教徒的機關；學林則係教授日本人和歐洲人的宣教師以語學及其他必要的高等教育的機關。安土的修業所，收容二十五名身分優良的少年，其初步的宗旨，是授以拉丁語、葡萄牙語和日本語的閱讀和作文，信長曾往參觀，當時日向的飢肥城主的次子適在奏洋樂，信長大為嘉獎。惜該所不幸焚毀於天正十年「明智之亂」，嗣後乃移至攝津的高槻，更再度遷至京都。府內和臼杵的學校，則在天正十四年島津氏侵入時，大部份遭受焚毀。

此等學校，在天正十五年秀吉禁教之前，已經獲得相當成績。翌年，京都的南蠻寺被破壞，京都修業所的生徒，遁往有馬。其後學林和修業所等教育機關，在有馬、天草及長崎等地，旋毀旋建，以至於元和之末。此等學校的對於文化的貢獻，或許因禁教而遭毀滅者極多，所以殘留很少。惟用羅馬字寫成的宗教書、文學書以及語學書等，實是研究當時日本語法的極好資料。

第四節 中國儒學的變遷

因要明瞭江戶時代儒學的變遷，先將中國儒學的變遷，略述如下：

先秦儒學 孔子的倡導儒教，據他自己說是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所以他一意祖述堯舜文武的理想，而集其大成。孔子之道，尚一「仁」字以一貫之。孔子所謂「仁」的意義，極為廣汎，當他自己教授門弟子時，注重因材施教，就是適應門人各自的器量，而給與種種不同的解釋。這便是孔子個性主義的教育，其所謂仁，是包含着下列各種德行的，即是：對於他人的忠恕，對於社會的恩澤，並以行道的勇氣克服私慾，以及充實遠近通徹內外的慈愛等。至言達仁的方法，必須博以學文，實踐

禮節，統一人格。孔子自身好學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又常教導學生努力於適應個性，而不喜歡注入式的教育。當學者心思義而未能自得，發現憤然之際，始啓示其義；在心有所得而未能出諸口，表現悱然之際，開始發明其辭。這也就是說，學者如果不自行苦心努力，孔子是不與以說明的（論語述而篇）。孔子是天生的聖人，他以過人的熱心和希世的人格，教導門人，其感化的深遠，到現在還支配了東洋文化的一面。他的高足弟子顏淵，曾有如下的讚嘆道：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論語子罕篇）

其孫子思的門人孟子，恐怕將「仁」的意義，解釋為平等無差別的愛，容易和墨子的「兼愛」相混，於是加一「義」字，而以此二字為儒學的根本。所謂「義」是「正義」、「公正」等的意思。孟子還提倡性善說，認為無論任何人，都有成就「仁義之德」的要素。他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實是因為凡人都具有惻隱之心，亦即是「不忍人之心」的緣故。這便是「仁之端」，「擴充此」

端，「便是完成仁之德。同樣地，無論何人都有着「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而各各稱之爲「義之端」、「禮之端」和「智之端」。這四者，稱爲「四端」。沒有「四端」的人，孟子便斷定「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但孟子的說明，可說是比喻而非科學。其中所說「……孺子將入於井……非惡其聲也」一節，就恐怕不一定人人會如此。但是，孟子的論述，使後世的學者確信凡是人類，都是先天便具備着完成道德的要素的，在這一點上，孟子實有着大功勞。他還更進一步，認爲凡是人，都是先天具備着判別善惡的知力和行善避惡的能力，而稱之爲「良知」及「良能」（盡心上）。

孟子說明了性善，但未能說明惡的起源。荀子承其後，提倡性惡說，他主張：人性生而好利，順之則爭奪生，辭讓亡；生而憎惡，順之則殘賊生，忠信亡；生而有耳目之欲，順之則淫亂生，禮儀文物亡。根據人性，順從人情，必至爭奪出，犯分亂理之事生，而歸於暴。因爲這樣，所以必須有「師法之化，禮儀之道」，由此產生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總之，人之善者，非由天性，而是人爲（荀子性惡）。因爲荀子有着上述的信念，所以他特別以禮爲學問修養的根本，而且認聖人是禮的制定者。但是，僅有

惡而沒有善性的人，爲什麼也有從善的意願？又爲什麼會努力去從善？這一點，實在是荀子的性惡說所不能解答的謎。仔細研究起來，孟子和荀子的見解初看似是正相反對，但實因二人對於「性」的觀察，各不相同：荀子的觀察以人類動物的本能爲主，孟子也僅僅觀察到了人的道德的要素，因此，二人的學說，並不互相矛盾。荀子在提倡性善說時，也隱約地承認了可能從善的要素，因爲惟有承認此種要素的存在，而後他所述說的「師法之化，禮儀之功，一才可以建立起來。

其後，在秦代和漢初，學術衰頹，從前漢的中期起，才漸漸復興起來，但這時候的儒學，盡力於先秦儒學的訓詁，所以在哲學上並無多大發展；魏晉、南北朝、隋唐的儒學，在大體上也繼承着此種學風。

宋學 到了宋代，許多學者，受了佛教尤其以禪宗的影響，對於古代經書，予以新的解釋，以前專重訓詁，現在却注力於哲學的祖述。此種學風，經過元代，一直迄於明代。宋初，經周濂溪的研究，蔚爲新學風，其後經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的闡揚，到了南宋的朱晦庵更將諸先輩的學說，予以發展並集其大成，而完成了哲學上的一個體系，朱子對程伊川的學說，繼承最多，所以朱子學也稱程朱

學。

朱子的年代相當於日本平安時代之末至鎌倉初期。名熹字元晦，晦庵其號。他繼承伊川的「理氣二元論」，以爲萬物成自「天理」和「氣質」。兩原理。天理也叫做「天道」。『氣』是造成萬物的「質料的原理」；『理』是造成萬物的「形相的原理」。周子名宇宙的根本爲「太極」。朱子認爲「理」和「太極」係屬相同。「理」通萬物而同一；但「氣」則有精粗正偏之別，因此有人和物之分，卽在同一的人和物之間，也有着無數的差別。至於各備有「太極」便是各各具備有「理」，所以萬物相同。賦與人的「天理」叫做「性」；「天理」常無差別；所以人的「性」不論聖、賢、愚都屬相同。「天理」是善的，所以人的「性」亦是善的。此種「性」分析起來，就是仁、義、禮、智、信等「五常」。漢、唐學者的「五常」是指「德」；宋學的「五常」是指「性」。且孟子的性善，是指對惡而言，程朱的性善，其絕對的一元的善。但是，「天理」爲什麼是善的呢？對於這一點，宋學祇是獨斷地而且習慣地如是相信着，却未能提出完全的證明來。

宋學又以爲人所實踐的善惡，是隨「氣」而來。朱子認爲：在隨「天理」而來的「性」之外，

還有着隨「氣質」而來的「性」，而稱之爲「氣質的性」；對於「天理」的性，稱之爲「本性之性」。他相信「氣質」有清濁之別，所以「氣質的性」就有善惡之分。爲偏斜的「氣質」所支配時，就會陷入「物欲」，這就是惡。如果完全能洗刷去私欲，那末「天理」就流行起來，「氣質」的偏斜就糾正過來，而回復至於「本然的性」。在孟子，認爲擴充「四端」（都是完成「德」的可能性）就可以達於仁、義、禮、智（孟子不說「五常」）在朱子，却認爲天所賦與的完全的「性」是人人所具有，但常人往往被蔽於偏斜的「氣質」，未能發揮「本然之善」，所以，如果能使「氣質之性」歸於端正和清明，而使「氣質」成爲善良，那末「本性之善」就可以發揚起來，這也就是說：朱子並不認爲係達仁、義、禮、智、信之「德」，而是主張應該回復仁、義、禮、智、信之「性」。這叫做「復初之說」。

朱子以「窮理」和「居敬」爲修養的兩個方法，前者爲知育，後者爲德育。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朱子認爲即是「窮理」；在物都有「理」，如果盡其「理」，那末吾人的知識就可日進，衆物的表裏精粗就可完全辨知；於是吾人的意志自然會誠實，心地自然會端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道，也自然會開豁起來。伊川將自「窮理」進至實踐的順序，根據中庸，分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五段」，並且說：「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對於此種「階段說」，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者，都予信奉。

怎樣去實行「篤行」呢？程朱認爲應盡量集中精神，戒除放心，這就叫做「敬」。「居敬」的最好方法，是靜坐。勵行「窮理」和「居敬」二者，不稍怠忽，必可達到聖域。至於兩者的先後，以「窮理」爲先。言其輕重，以「篤行」爲主。朱子雖亦重視「篤行」，但以「窮理」爲先，於是後學者就有許多人專去學習死知識，而忽略了品性的修養。

陽明學 朱子學派雖然久遠地支配了中國的學界，但厭其繁瑣而尋求直截簡明之學的人，也不在少數。和朱子同時期的有陸象山，他避開研究萬物之「理」的繁瑣，而主張直接探求一己的「心中之「理」，集此說的大成的，是明代的王陽明。陽明的時代，相當於日本室町中期，而與桂庵同時，名守仁，字伯安，嘗築室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陽明提倡「理」的一元論，他認爲吾人的心的本體是「良知」，和宇宙本體的「理」是同一之物。這叫做「心即理」。孟子認「良知」是一種「精神

能力，「而陽明却從哲學的見地去考察「良知」。陽明又認爲「良知」在常人方面，爲「人欲」所蔽，所以不能回復到「天理」；吾人應力事修養，以發揮「良知」的光輝，這叫做「致良知」。所謂「致」，是推究的意思，吾人推究「良知」至於十分明白的時候，對於善惡的判別，就決不會有所迷惑了。

陽明對於「知」「行」二者，予以一元的解釋，而提倡「知行合一」。他以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對於道德上的善不予實踐，便不是真知。他又認爲在「窮理」之後，才開始「行」，是迂遠的方法，所以提倡應在事物上探求修養之法，在事上致良知，即在事上磨練行爲。陽明和朱子不同，關於大學中的一致知格物，「他將「知」解釋爲「良知」；將「致知」解釋爲「致良知」；將「格」解釋爲「正義」；而將「格物」解釋爲去惡行善，以糾正日常事務的不正，使歸於正。

第五節 幕府的獎勵與學術的大勢

次節以下。擬述江戶時代的教育學說，現在先將該時代的學術變遷的大要（以儒學及國學

爲中心，記述如下：

江戶初期 江戶時代的太平景象。正如旭日初昇，先由京阪等起點地，學者輩出。除僧侶以外的學者，應首推藤原惺窩。惺窩之學本宗朱子，而對陸子之學，也有修養，他雖曾爲家康講書，但迄未入仕，至其高足林羅山仕於家康，參與行政。羅山和惺窩不同之處，即在純粹研究朱子學。惺窩尙有松永尺五，那波活所，堀杏庵等高足弟子。朱子學已如說過，是在「五山」（參看第六章第四節）中發達起來的，但當時尙未十分成熟，自惺窩時起，乃迅速地趨於隆盛。林家自羅山之後，累世任幕府的儒官，朱子學遂成爲幕府的御用學。其子春齋、春德、孫鳳岡，位置和勢力，可以和平安朝以後的菅原大江兩氏相埒。但鳳岡以後，就沒有出色的學者。

當時公卿的博士家中，「文章道」方面，有菅原氏的子孫高辻、五條、唐橋諸氏，「明經道」方面，有清原氏的子孫船橋、伏原諸氏，繼承家業，但在儒學勃興的機運中，完全未露頭角。對於大學、中庸，當時都用新註，但論語和孟子，尙用古註。後光明天皇避佛教而喜儒學，以古註粗淺，而程朱的新說較爲正確之故，於是博士家也採取宋儒之說，以講解朱子學。

除京都和江戶的宋學外，在土佐，朱子學也很發達。南村梅軒曾在土佐講朱子學，其孫弟子有谷時中，時中的門下如野中兼山、山崎闇齋等，都是一時俊彥。闇齋是熱心的朱子學者，他所以號闇齋，就是做照朱晦庵之名而來。晚年篤信神道，其門下優良弟子極多。淺見綱齋、佐藤直方、三宅尙齋信朱子學；玉木葦齋祖述神道。其流派還有勤王論的竹內式部、山縣大貳等。實也頗注意之事。

同時在松永尺五的弟子中，有木下順庵。順庵也同屬朱子學者，德行極篤，學問雖未見十分深湛，但以教育家的德望却甚隆。門下優秀弟子極多，有所謂「木門五先生」和「十哲」「五先生」是指新井白石、室鳩巢、雨森芳洲、祇園南海、柳原篁洲等五人而言。

這時候，中江藤樹獨不喜朱子學而提倡陽明學，這是日本提倡陽明學之始。藤樹事母至孝，且勤於學問，品行極篤，感化廣被鄉黨，世稱近江先生。弟子中有熊澤蕃山、淵岡山等，聲望也高。岡山闡揚師說，蕃山則入仕於岡山侯，而以發揮政治上的材能。

元祿前後，江戶歷代的將軍中，綱吉特喜學問，延寶八年（一二三四〇）任將軍職後，即召林鳳岡講大學，而及於四書五經。綱吉並且自己向其諸侯諸臣等講授論語以及其他。又林羅山曾將

加有訓詁的經書出版，叫做道春點本，道春是羅山之字。先是於寬永七年（一二二九〇）將軍家光將江戶的上野忍高地，賜與道春，使設書院，尾張家德川義直，於其地設孔子廟，綱吉因其地狹隘，於元祿三年（一二三五〇）乃移設於湯島，而命鳳岡爲其祭酒。綱吉於鳳岡之外，還徵召木下順庵，並任用神道家吉川惟足、曆算家保井算哲、國學家北村季吟等。

元祿年間，一因天下昇平，二因將軍獎勵學問，於是各種學問，蓬勃興起。朱子學方面，在木門（木下順庵之門）的雨森芬洲、新井白白、室鳩巢之外，尚有並無直接師承而從事獨立研究中村惕齋、貝原益軒等名家。

這時候，陽明學衰落，優秀學者雖多，但祇有三輪執齋一人著名。執齋始從佐藤直方習宋字，其後歸於陽明學。稍後有中根東里。

慨嘆宋明之學受了佛教的影響有失古意而直接探原於孔孟之真意的，有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三人，他們研究的方法和對象雖略有差別，但在提倡古學的一點上，却是一致的。元祿前後，是復古運動興盛的時代，有吉川惟足的神道研究，有研究奈良朝以前的古語古文的下河邊

長流及僧契仲等。在醫學方面則有古醫方的復活。其他益軒在晚年時，也懷疑朱子學而有着復古的傾向。

幕府命林家編纂寬永諸家系圖傳及本朝通鑑等大史籍，於是史學亦告發達。水戶家德川光圀（二二八八——二三六〇年）雖是將軍家的支族，滿懷勤王之志，早有修史之心，師事明末朱舜水，其後並聘安積澹泊及闇齋派的栗山潛鋒、三宅觀瀾等學者，編纂大日本史。大日本史完成於明治年間，在此悠久歲月中，參加修史的許多學者，一致努力於闡明國體的精華，鼓吹尊王的大義，和闇齋派，同為幕末勤王論的思想上的中心。

元祿時代，不僅儒學發達，其他學藝，都有進步。契沖的古學，獲得了江戶時期國學上的最大成績，數學方面，關孝和的獨創的研究，和同時西洋的發明微分學，有其同等的功績。他若稻生若水著庶物類纂一千卷，使博物學成爲獨立；宮崎安貞集農學之大成；保井算哲改良中國曆的缺點，從事新曆的研究，確立了日本天文學的優越權。佛教因德川氏的保護政策而確定其教權，任何宗派都致力於教學，教義研究極爲發達。天海、鐵眼刊行大藏經，白隱、鳳潭、慈雲等，均有學僧之名。

享保寶曆前後 享保元年（二三七六）德川氏的宗家中斷，紀伊家的吉宗入繼而爲八代將軍。吉宗不喜經史，轉視儒學，從事於武藝及實用學之獎勵。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青木昆陽的登用，於是蘭（荷蘭）學開始發達起來（昆陽是日本蘭學的鼻祖）。吉宗對儒學雖云輕視，却極熱心於「寺子屋」（學房）等的教育，起用室鳩巢，命其編纂六諭衍義大意五倫五常名義等兒童教科書。幕末「寺子屋」及私塾的普及，吉宗的獎勵，實與有力。石田梅巖的提倡心學，向平民鼓吹通義，也是這時候的事。但儒學受到元祿盛時的反動以及將軍主義的影響，却漸消沉，而朱子學爲尤甚，僅在關西方面保存一線命脈而已。

九代將軍家重及其下一代將軍家治的時期，是田沼父子的專橫時代，紀綱紊亂，學術不振，較諸綱吉時代，實有天淵之別。

但在此期間，民間有爲的學者，努力從事各種新的研究。杉田玄白、前野良澤等研究蘭學，平資源內等研究自然，麻田剛立獨創足與當時歐洲媲美天文學，志築忠次郎（初名中野柳圃）研習牛頓的力學，其發表星學上的星雲說，實較拉帕拉斯爲先。國學者荷田春滿及其門人賀茂真淵，也

是這時代的人。春滿注力於古道的闡明，真淵繼之，排斥儒教，闡明古道，終生努力不懈。儒學方面，元祿年間，仁齋學派最盛；享保年間，徂徠學派趨於發達。在各方努力之下，學術界頓呈百花爛漫之觀，但各種新學說，雖紛紛提倡，而彼此批評，互相爭論，於是就有折衷學派和考證學派的發生。細井平洲、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等都是著名的折衷學者，太山錦城則是有數的考證學者。

三宅觀瀾之兄石庵，於享保十一年設懷德堂於大阪，以研究朱子學為主，兼習陽明學。該堂歷時頗久，中井竹山、履軒兄弟等多數學者，均曾任教於斯。學風向來宗於朱子，而折衷於其他學說。

這時候，三浦梅園在豐後的山中，悉心研究，深湛的學術，給與鄉黨的感化極深。

文化文政時代 田沼意次恣意妄爲，終於經將軍家齊予以斥退，任松平定信爲老中。定信喜習學問，以儒學修養人格，學識亦甚優良。他曾說：「學風惡劣，貽害政治；學風優良，國家安治。」（夜鶴筆叢）其注意教育如此。因江戶的朱子學衰微，關西民間的朱子學尙盛，於是自讚歧招致柴野栗山，任爲儒官，復興「聖堂」的日講。而江戶的學界，於以再盛，但因學派林立，黨同伐異，遂於寬政二年（二四五〇）斷然禁止在「聖堂」中講朱子以外的異學。其後又自關西登召尾藤二洲、古

賀精里等，任爲儒官，又於林家斷絕後嗣時，使述齋爲其養子。定信退職後，幕府便於寬政九年將湯島的「聖堂」改爲純粹的直隸學校，定名爲「昌平坂學問所」。諸藩的學校，也相率做行，多以提倡朱子學爲務。

定信退職後，家齊視政，歷半世紀之久，海內昇平，內外無憂，江戶以及地方的文化，極度發達，學術因以勃興。在朱子學方面，有林述齋及被稱爲「寬政三博士」的柴野栗山、尾藤二洲、古賀精里，其後繼之者又有安積良齋、松崎慊堂、安井息軒等。至於陽明學，因担任昌平校儒官的佐藤一齋的提倡，也極爲發達。一齋因和林述齋的交誼甚篤，得任昌平校的儒官，他雖不能公開教授自己信奉的陽明學，但在他的私邸中所養成的門人，頗多出色的陽明學者。同時，在大阪的大鹽中齋，是有數的陽明學大家，他當天保年間的大飢饉時，憤於幕吏的坐視窮民疾苦，不予救援，發亂而死。

國學在此時代，也藉本居宣長之力，而告大成。宣長以後的後繼者，不過將他的研究略事補充而已。其門人平田篤胤，攻擊儒教、佛道及俗神道，鼓吹古神道，並致力於遵王論的普及。

文化年間，學者輩出。農學方面，有佐藤信淵，本草學方面，有小野蘭山，儒學方面，有考證學和折

史學、國學方面，有宣長的古事記研究。

天保以後，伊能忠敬以從前發達起來的星學和數學爲基礎，從事精確詳密的測量，頗能獲得成功；二宮尊德倡導「報德主義」，也有偉大的成就。至儒學中則以注意實踐的陽明學獨見昌隆；國學中也以崇尚實行的篤胤學派占勢力。其他水戶學派，也有前期的純學究立場，進展至於尊王攘夷運動。凡此種種現象的發生，恐怕和當時幕府實力衰微、社會組織頹廢、以及世間多事等等，不無深刻的關係。

這時候最有名的教育家，是吉田松陰。松陰繼承素行的學統，在佐久間象山受陽明學。他並建立松下村塾以從事教育，始終僅及二載，而給與了長州藩的青年以極深刻的薰陶，使該藩成爲維新史上活動的原動力，這是人所熟知的事。

第六節 朱子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藤原惺窩

藤原惺窩（二二二一——二二七九年）名肅，字歛夫，是藤原定家第十二世的後裔。永祿四年，生於藤原氏的領地播州三木郡細河村。自幼有神童之稱。曾剃髮入京都的相國寺，後歸儒。文祿四年三十五歲時，擬赴明，自筑前啓旋，遇暴風，漂流到薩摩的鬼界島，於是前往藏摩的山川港（一說坊之津）獲得四書，得益不少。自是以後，悉力研究朱子學，遂成大儒，開所謂「京學」的始基。元和五年卒，年五十九歲。主要著作有惺窩文集和千代草。

惺窩的門人松永尺五，名遐年，字昌三，京都人，是有名的松永貞德之子。板倉重宗甚器重之，賜地使設塾，名曰「講習堂」。雖非最優秀的學者，但門人極多，有廣育人材的氣量。門人中最傑出的，是木下順庵。

順庵（二二八一——二三五八年）名貞幹，字直夫，小字平之丞，又號錦里，京都人。事親至孝，兄弟友愛，德行極佳。元祿十一年卒，年七十八。雖無足以介紹的學說，但以教育家而言，是極為成功的，養成了衆多的學者。其中著名的，有雨森芳洲、新井白石、室鳩巢三氏。

第二

雨森芳洲

芳洲（二二八一——二三六八年）名東，字伯陽，小字東五郎，近江伊香郡雨森村人。十七八歲時，赴江戶，師事順庵，藉師的推薦，仕於對馬的宗氏，屢和朝鮮人接觸，於通朝鮮語後，更研究中國語，可以直接會話。寶永五年卒，享年八十八。在八十一歲時，立志作和歌，據傳二年間讀古今集千遍，三年間作歌竟達一萬首之多。主要的著作，有橘窗茶話和戲草。

他是純粹的朱子學者。且以爲均在程、朱學範圍之內而以朱子爲中心，陸象山和王陽明的學說，兼收並蓄，其包容性甚大。因此提倡佛教和儒學的一致說，曾經說：「三聖人之言形而上也，不謀而同；蓋天唯一道，理無二致故也。」（茶話上）

芳洲的學習法，以正確閱讀古書爲根本。主張讀書不貪多，應注意精讀；像十三經註疏等書，是儒者應當精讀的。他曾經說：「夫聖賢之道存乎書，書之意在言，言之義在字，字學不可以不明」（茶話中）他還以爲不僅應明白字意，就是發音方面，也應和中國人一樣，才可以明白漢文的真義。又主張教小孩讀書時，應先將重要的漢字逐一教授；然後每日教其讀大學或小學二三行或五六行，以爲將來研究的根底，就是暫時不能澈底明瞭也好。爲使小孩不生厭倦起見，可以附帶地

教其讀詩。關於讀書，在成人雖有「速讀」的必要，但在學習期中，則不可不「慢讀」。

他還認為學應才德兼備，達才即所以達德。讀書至忠義壯烈之文，如果僅在研究詞藻，便非真正讀書。作詩爲文，雖是學習文字的良好方法，但非爲學的目的，所以學者不應以作詩爲文自限。

第三 新井白石

白石（二三一七——二三八五）名君美，字在中，通稱勘解由。其先據云出自新田氏。明曆三年，生於江戶。自幼聰穎，三歲寫上野物語，四歲偕父聽人講太平記，即席提出質問，六歲講詩，七歲與父母觀劇，即能背誦臺詞。父仕於久留里的土屋侯，才德兼備，母亦長於學術，稱賢母。故自幼獲得父母優良的薰陶。其後從木下順庵學，因順庵的推薦，仕於甲府的德川家宣。及家宣任將軍，參劃政務，卓著功績，稱筑後守。迨家宣薨後，仍仕於其子家繼，家繼早逝，乃退而從事著作。享保十年卒，年六十九。

白石以詩人言，是有數的大家，以學者言，則應用中國的知識，以研究日本的言語、歷史及制度，也有着優異的成績。他的研究歷史和制度等，目的在於作爲政治上的參考。他可以說是一個實用

主義者。勸人博學，曾經說：僅讀書本，無異是閉目探物。

因爲是一個在政治上活動的人，所以他沒有養成門人的暇晷。他仕於家宣進講詩經的時候，託狩野春湖搜集詩經中所述及的鳥獸草木器物（或採自日本所有的，或轉託居於長崎的中國人搜集），呈於家宣，然後進講，由此可知他是採取直觀教授法的。

以上各事，散見於他的自傳折焚柴記及白石先生手簡、白石先生紳書、退私錄、白石先生學訓等書。

第四 室鳩巢

鳩巢（二三一八——二三九四年）名直清，字師禮，又字汝玉，通稱新助。萬治元年，生於武州谷中村。年十五，仕於加賀侯，侯嘉其才，使師事木下順庵。他是芳洲白石的後輩，晚年適當徂徠學風靡天下的時候。朱子學在關東已瀕垂亡，予以維持而使之不墜的，全是鳩巢的功績。鳩巢爲將軍吉宗所登用，撰六諭衍義大意及五倫五常名義。六諭，是清康熙帝曉諭人民的六項訓諭，內容是：一孝順父母；二尊敬長上；三和睦鄉里；四教訓子孫；五各安生理；六毋作非爲。會稽的范鏞將六諭予以解

釋，就是六諭衍義，宗吉得到了六諭衍義，深以為喜，命鳩巢再加註釋，這就是六諭衍義大意。鳩巢歿於享保十九年，行年七十有七。主要的著作，有駿臺雜話、不亡鈔、獻可錄等。

鳩巢是純粹於朱子學者，另一方面，又以尊重道教維持名教自任。當赤穗義士復讎之際，世間輿論，褒貶靡定，而鳩巢早就撰述赤穗義人錄，加以頌揚，「義士」之稱，就是根據義人錄而來。

鳩巢為欲闡明其本人的學說，有時也附帶述及老莊的無為，他曾經說：「老莊之書可學，老莊之德不可學」（不亡鈔卷一）。他認為人是生於「道」之中，成長於「道」之中，而不可須臾離，猶魚之不可離水。魚為餌所釣，離水而死；人為欲所誘，就離開「道」。「道」是什麼，是陰陽的流行。陰陽不相離，相交而充塞乎天下，育養乎萬物。天地亦自「道」而生。人和天地成一體時，就不和「道」分離。聖人常合於「道」，從「道」就是「公道」。以「人為」而反於「道」，就是所謂「私慾」。

他又以為「道」是時刻流動的，而不稍凝滯。因為不凝滯，所以不間斷。為人慾所引，就要一方凝滯，他方間斷，好儒憎老佛，和尊貴惡賤，就是這個道理。強行其「道」，就是由於沽名釣譽而起的弊害。善是在自然中得來，求善須出於自然而不可強求。真心求「道」，決不是玩弄小智。孟子曾說不

失赤子之心的是大人（離婁下）赤子「無爲」自然會合於一道。」所以聖人和赤子相似。聖人知「道」而合「道」，赤子不知「道」而合「道」。所以學問的本義，是回復間斷的心和凝滯的心。這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求其放心」。換一句話說，就是「無欲」。

講到「學」，人們就立即會僅僅想到讀書，而實則不然。致知是學，力行也是學。但是不可拚命「有爲」。聖人「無爲」而治。常人因「思慮」「有爲」，心爲外物所誘，所以常雜念橫生犯過失。

學的主要內容，是推究「道」中的最顯著者，這就是「禮」和「樂」。但對於禮樂，並不限定所謂「行儀作法」和「音樂」。所謂禮樂，就是「道」的作用。關於「道」的修養，不應拘泥於一隅，而有先後緩急之別。恭敬揖遜的行儀作法，和詩章聲音的音樂，是一切禮學的中心，所以應當由此學起。但是想以中國古代的禮樂實行於今日，也就犯了上面說過的「凝滯」之弊，所以應當依據目下的風俗，而進修禮樂。

上面已經說過，「學」並不限於讀書，但因「窮理」之故，也不能廢止讀書。書籍之中，應當特別重視的，是四書和詩、易、二經。「道」顯現於萬物之上，而最清晰地映入吾人目中的，便是易。至於詩，是

寫出人的天性的。五經之中，其他三經，都駁雜不純，所以朱子也僅註四書及詩易，而不及其他三經。讀書的目的在求獲知吾人的根源，並求其「放心」。假使僅以字句的解釋自限，那末縱使終生讀書，也是無益。

關於小孩的教育，鳩巢認為，赤子是最有真實心的，所以應很自然地予以養育，決不可揠苗助長以求其急速成長。這種主張，很和盧梭相似。在自然的生活之中，父母有良好的示範，小孩定能習得正道。自七八歲起，授以習字及文字之學，十一二歲起，使習書禮、弓馬及角力，十三四歲起，授以勇士的故事以及詩歌文章，十五歲起，使悉心從事家業，如有餘力，則從有「道」之人，對以上各種學習，作進一步的研究。對於少年，禁其恣肆。體育方面，尚鍛鍊主義，畏寒暑及受有微傷即驚惶失措，都在嚴禁之列。以詐騙慰小孩，或以錦繡衣小孩而縱其驕奢，亦所深戒。德育以克己爲宗旨。

關於女子的教育，雖和男子並非絕然相異，但亦有不同之點。男兒的教育，父母同負責任，但以父爲法，女兒的教育，父母同負責任，但以母爲法。女兒自幼應專心於紡織裁縫，安於閑寂，克苦耐勞。總之，對於婦德的養成最應注意。

鳩巢的自然主義的教育，也有其優點，但使孩兒缺乏積極進取之心以及陷於固陋等缺點，或所難免。

第五 山崎闇齋

闇齋（二二七八——二三四二年）名嘉，字敬義，通稱嘉右衛門。元和四年，生於京都。輩份稍長於順庵。在京都妙心寺得度後，遊歷四方，在土佐聽到了谷時中的演講儒學，乃還俗歸儒，而集朱子學派的大成。極受會津侯保科正之的知遇。晚年歸於神道，深信寶基本紀中的一「神垂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一語，自號垂加。

闇齋篤信朱子學，少有對朱子發惡評者，就血脈奮興，嚴詞詰責，必使對方屈服而後止，所以他的學問，陷於固陋，較諸朱子本身，未見進步。

他對於弟子的態度，有如君之對臣。平日主張尊嚴師道，以師弟關係比諸君臣關係，加之他生性鋒芒大露而乏溫和之態，所以弟子雖有小過，亦不予寬恕，厲聲叱罵。弟子中最有地位的佐藤直方，也曾經說：「師事闇齋，每入戶，心惴惴焉，如入獄然。及退出戶，則洋洋焉，似脫虎口。」（角田簡撰

閻齋傳。雖然這樣，門人還是有五六千人之多，由此可見他的感化力之深。

他的弟子，都竭力鍛鍊學問和德行，絲毫不敢怠忽。他對於文藝的興趣甚少，認作詩等事爲「玩物喪志」。凡史書子類，都無實益，不准弟子閱讀。他講授的，以小學、四書、近思錄、易經爲主，擷英拔萃，條理井然。所以閻齋派的學說，劃一整齊，毫無分歧情狀。

閻齋歿於天和二年，年六十有五。主要的著作，有垂加文集、文會筆錄、大和小學等。

第六 中村惕齋

惕齋（二二八九——二三六二年）名之欽，字敬甫，通稱仲二郎，京都人，其時代與順庵略同。家庭本爲吳服商，因好學，移居幽靜之地，不與人交，獨學自修，成一代大儒。他是純粹的朱子學者，講授經書，著作極多。元祿十五年歿，年七十有四。主要的著作，有比賣鑑和講學筆記。

惕齋的教育說，在比賣鑑中有詳盡的敘述。大意是說：像孔子所說「子者親之後，奚敢不敬」一樣，對於子不僅要慈愛，還應當「敬」。對子不予教育，一意放任，便算侮子，也就是蔑視祖先，惕齋以之爲一種大罪。又子在胎內時，便應開始教育，因爲母親的精神，可以影響胎兒的本性。小孩呱呱

墮地後，即須實施教育。因幼小兒童，受母親的感化，實十倍於父親。而尤其是對於女子，倘不給予相當教育，那末出嫁後生子時，其子將有如其母，在此種情形之下，歷代子孫都將無法改良。且惕齋以乳母對小孩的感化，關係極大，所以認為對於乳母的選擇，應當特別注意。

小孩於開始自己進膳時，應令使用右手。六歲起教以算法，並使習字。七歲起，男女分席，並使其開始習文。八歲起，男兒入「小學」，習禮樂弓馬，及字義算術。出入就座進膳，必讓長者在前面，己則在後。九歲起，使習干支。十歲起，出外事師，習三綱五常之道。十五歲入大學，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二十而冠，三十而結婚。

女兒自七歲起和男兒隔離，八歲起不出閨門。母及乳母，應在女兒之旁教授，不可怠忽。教科書是小學、大學、論語、孝經、列女傳、女誡等。十歲起，習紡織、裁縫，教以應接祭神之禮，以及習字等。二十而嫁。女子的修養，最注意於婦德、婦言、婦功、婦容等四德（又稱四行）。

小孩的爲惡，大抵是父母、侍女、乳母妨害小孩本性的緣故。要想阻止小孩的哭泣，於是對小孩說，將給與什麼東西，但當小孩停止哭泣時，却不將所許之物給與，這是教小孩以欺詐了，對於此種

方法，惕齋極爲反對。

惕齋的教育說，切實而得要領，但像各年齡的教材的配列，並不依據日本當時的事實，而是對於中國古代的制度的複述，這是一種缺點。

註：禮記內則篇，對各年齡的教材配列，說述甚詳。教材配列論，除惕齋之外，尙有多數學者，予以說述，但都以內則爲根據，所以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

第七 貝原益軒

益軒（二二九〇——二三七四年）名篤信，字子誠，通稱久兵衛。寬永七年，生於福岡。年代較闇齋、順庵稍遲，較白石、鳩巢則早。父是黑田侯的醫官。與兄同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益軒並無常師，差不多全出自學，是一個篤學重厚的君子。先學陸王，其後專學程朱，但晚年又懷疑程朱之學，發生了和宋儒多少有些相異的意見。益軒和中江藤樹、山崎闇齋、木下順庵、伊藤仁齋等立塾以授徒者不同，而是大量地著述通俗的教訓書，盡力於社會的教育。最著名的教訓書有十種，即是家訓、君子訓、大和俗訓、樂訓、和俗童子訓、五常訓、家道訓、養生訓、文武訓、初學訓、世稱一益軒十訓。

他除儒教之外，也研究佛教，並通歷史、地理、語言、本草、精醫學，簡直是位百科大家，對於教育，也有着詳細的論述。他的教育學說，除見於和俗童子訓、大和俗訓、文武訓之外，在慎思錄中，也說述極詳。如此詳述教育的人，在維新以前，恐怕沒有第二人。但他並不是一位獨創的學者，雖然也有若干獨創的意見，而係由於他的博覽和長壽，將以前的各種意見和學說，加以整理，嚴密地筆錄下來，這是他的長處。

目的論 爲學以立志爲本。無志而讀書，雖稱廣博，於身無益，却反有害。學者應爲「道」而學。人皆受天地之德，自然而然的由心中發現仁義禮智信等五性，所以隨性之所之，便無損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等五倫。但人縱具有優秀之性，如無人倫之教，仍不知人之道，而近於禽獸，雖生而爲人，仍不能謂爲萬物之靈。所以士農工商卽四民，都有修學問受教育的必要。明言教育同爲四民所必需，在益軒以前雖也有過，但仍是益軒的一個特色。爲學之法，在於讀書考古，問人思己，聽取人的諫戒，時常反求諸其身，遷善改惡。大靈上說起來，他的教育的目的，是建築在道德之上的。

實際論 「道」的範圍廣大，但其粗淺之處，雖愚夫愚婦，亦可明悉。教人應先自日用平易之道

教起，徒然講述高遠之道者，未必便爲聖人之道。要須適應學者器量，逐漸導其進至高深境界。這就叫做下學上達。學分知行二部。先知而後能行。知是行之端。但這並不是說完全知道一切之後，然後去行，而是說知道了一事，就立刻去實行。知行並進最爲重要。所以徒知固屬無有用，不行亦非真知。由「知」而進於「行」的順序，有如中庸所說，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五段」。

教育在幼時易於成功，又以這時候最爲必要。爲人之親者，欲使自己之子不走入邪道，於幼時起，卽應不絕予以教育。從開始食飯及開始語言時起，就應利用其感情及本能，予以教育。教育的開始，愈早愈好。過遲則易沾染惡習，難於改除。小孩歡喜遊戲，大體上可以任其所好，但成長之後，應予制止。天性縱惡，如果使之學習，必能趨於良善。天資雖佳，如果養育不佳，終成惡劣，這是因成爲習慣之後，就像是隨有生以俱來的一樣，古語所說的：「幼成如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就是這個意思。「子之賢不肖，係於父母之影響」（和俗童子訓卷二）。「訓子應以義方，不可有姑息之愛，勿使之怠惰，勿長其私欲」（家訓：幼兒須教）作偽驕奢恣肆等習氣，應力予戒除，爲要使小孩停止哭泣，允許給與小孩以物件，但無給與的真義，這是教小孩以虛偽。以恐怖威嚇小孩，便會養成他的畏怯。

任意過獎小孩的才能藝能，便會養成他的驕慢。任意斥責小孩，便會使他不易進步。褒獎或斥責，應有一番衡量。總之，父母或其他長輩，應以溫恭敬愛的態度，予小孩以指導。關於此層，益軒曾經用易的豫二二二來說明（慎思錄卷一）所謂「豫」據易經的解釋，是在上者以正義推動，在下者順應，上下相互悅豫的意思。這是教育方法的精髓。所謂長輩以正理推動，就是嚴格主義或是鍛鍊主義之謂。關於訓育的具體的以及詳細的方法，益軒在大和俗訓以及和俗童子訓中，有着極詳盡的說明。

關於知育，或許因為益軒本身是一個博學多識的人，所以是注意博識的。但是，對於一己無所裨益的藝能，他認為是應當嚴戒的。就是有益的藝能，也不應當過於喜愛，致所學不能普遍。讀書在求知理明道，且能實踐，所以對於在德行上有必要的學問，應盡力之所及，對於非必要者，應當完全予以放棄。經史文之中，經最根本。讀經之後，應讀史籍，以古為今之鑑。但讀史也應以經為標準，不然便會弄錯罪惡的判斷，而不足為德行之助。從身分職業上看起來，農工商僅以家職為務就可了事，所以祇要有一點讀寫算的知識就好了。至於士，因為工作的範圍廣大而複雜，所以僅有一藝一才

之長，是不足以致用的，實有依着順序從事博學的必要。文藝方面，是禮式、書法、文字之學、算數等。所謂「禮式」之中，也包含着詩箋、書簡等「書禮」及「茶湯之禮」。日本以前不重視算數，對大家之子不教算數，這是一種錯誤。實際上，算數是一種必須學習的知識。此外，如果有餘力的話，也可以兼習和歌之道、本朝的典故、音樂和醫藥養生之術。「文」亦有學的必要，但不可耽於此道。武藝方面，有劍術、槍術、騎馬、弓射、洋鎗、拳法等。至於將士等，還應視器量的大小，以學習兵法。

學習上述各種學藝，選擇明師和良友當然是極重要的。教師如果不明良，學術便無從正確。益軒也認為師道應當尊嚴，教育才可以收效。

學問的根本，不論文武，都不在藝而在德。換一句話說，就是要做善人。文之德是忠孝義理之道，武之德是忠孝義理之勇。所謂「君子務本，本立道生」，應當以本之德為主，末之藝為副。如果不能兼備，那末捨藝而勵德可也。縱使不知武藝，有了忠孝義理，還是可以立戰功，揚武名；反過來說，縱使武藝精通，如果是沒有忠義的畏怯者，還是不能建立武功的。在文道方面，也是同樣。學習文藝，目的在於學習根本的義理。如果不學義理，那末縱使熟讀四書五經，通其文藝，也僅是俗學而已，並不是

真的學問。

如果承認教育是任何人所必要的，那末國家便一日不可無學校。但關於學校的設施，益軒並未予以詳述。

一切教育，應與年齡適合。由易而難，由簡而繁，循序教導。在此種見解下，就有「隨年教法」之說的建立。「隨年教法」的名目，或許就是益軒的創說，但該說淵源，實在於禮記的內則。類似之說，藤樹（翁問題上卷本）山鹿素行（語類卷十六）中村惕齋（比賣鐵述言卷之一）等，都曾有過敘述，所以其構思並非益軒所獨創，但以益軒之說為最詳。

關於教授法：讀書法和習字法詳見於他的童子訓中，作文和武藝（及讀書和習字）詳見於他的文武訓中。現在將他的讀書法和習字法的大要述之如左：

讀書應由易及難，且分節予以教授（此種方法當然不限於讀書）。在念熟經書後，再予以講釋，是不行的；在念的時候，還應限簡明的以解釋文義。和小孩的程度不相稱的高遠的說明，不應予以嚙嚙的講解；特別是孝經和論語的學而篇，更有先使其明白大意的必要。讀書時必須句讀分明，

聲調清晰。且不可求急就，而應字字明瞭，縱一字不誤，仍不可怠於複習，四書尤有背誦的必要。對於五經的重要部分，並應予以背誦。如果一日背誦百字，那末以一年半的時間，就可將四書全部背誦出來。此種努力主義和硬性教育，在江戶時代，極爲流行，而益軒便是最好的代表。爲便於作文起見，應當熟誦孟子、禮記的檀弓及周禮的考工記，其後還須能夠默寫唐宋八大家之文約三十篇。

關於習字，對握筆磨墨和蘸墨等方法，都應留心學習。字帖的選擇，極爲重要。應擇上代書法家的手蹟，作爲字帖；如果以劣本爲字帖，沾染了不正規的寫法，寫字就終生不易寫好。所謂上代範圍極大，而以唐代筆法爲佳，漢字是出自中國的，學習唐代的筆法，自是當然。至於「假名」也去依據唐法書寫，是不合理的。當開始習字時，可以僅學一派，但若終生寫着同一的書體，就成爲「書奴」，是可恥的事，所以在學習一派有相當成績之後，就應當同時學習上派。習字的順序，先習大楷書，次習行書。如果不習楷書，習書就容易錯誤，而且往往會寫成簡體書。且在初學的時候，如果僅寫楷書，草書的小字，而不寫大字，那末字體將萎縮而無法舒展，所以開始時習大字，其次習小字，才是正軌。

益軒的體育說，見於他的養生訓中。他對於體育和對於訓育、知育同樣，也是主張鍛鍊主義的。

養生訓卷八中說：「古人說過：養育小孩，要常帶三分飢和寒。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小孩是要稍稍飢餓和寒冷的。不僅僅是小孩，就是大人，也應當如此。幼時豐衣足食，身體反易致衰弱。」又說：「小孩不能過暖，過暖筋骨易弱。天晴時，應出外晒太陽，受風吹，如此身體可以堅強而無病。」益軒養生法的根本，在於寡欲平氣，恬靜而不妄動，悠閑而不躁急。

女子教育論 益軒將他的和俗童子訓的卷五的全部，以敘述他的女子教育論。

男子出外，從師而學，交朋友而習禮法，所以男子所受的教育，不僅限於親教。至於女子，常居家內，除接受親教外，別無其他教育的方法。教育女子的主義和方針，在幼小時原和男子一樣，但因女兒將來是要出嫁的，所以更應注意道德的訓練。義方之教應嚴，不良之習須戒。

在女子的四行（又稱四德）中，最應重視的是婦德，其次是婦功。女子應有和順愛敬堅守節義的修養。學習的功課，除讀書習字外，還應注意算數，和男子相同。

益軒的特長 益軒的特長，在於網羅教育上的各種問題，予以詳細的說明。此種特長，在江戶時代，最爲出色。他的鍛鍊主義的教育特別是體育論，和同時代的英國的陸克，頗多相似之點。

第八 香月牛山

牛山（二三一六——二四〇〇年），名則真，字啓益。成長於豐前的中津，學醫，仕於小倉侯。他是小兒科的專家。他的主要的著作小兒必用養育草，集漢醫小兒科的大成。他曾學漢學於益軒。

養育草一書，是從醫學的見地敘述小孩的養育法的，但關於教育方面，也時有述及，因為他是科學者，所以較其他儒者之說，頗多切實之點。他認為若要小兒安，要帶三分飢餓一分（或三分）寒。天氣晴朗之日，使小孩去受風吹，並在日光下遊玩。鄉村貧窮者的子弟所以康健者，就是因為風吹日晒的緣故。勿使不稔悉的人抱嬰兒，因為嬰兒往往會因此發生驚風的疾病。勿領小孩到古塚或古廟的旁邊去。凡使觀看異形之物、可怖之狀、殘廢者、及乞丐，或抱之登高，或使之窺深，以及使當牛馬的氣息，或使觸犬貓之身等，這些都是小孩疾病的來源。至十個月生齒之後，逐漸給與食物，而使斷乳。知育和德育的促進，都應當利用內發的性能。快要會立的時候，乳母們應當向小孩說「立呀，立呀，」教他立起來。開始揮動手的時候，教他拍手。拍手是日本人的古禮，到現在還是用於拜神之禮，所以這是信仰及禮儀的教育之始。尤其是當人類最大本能的飲食之際，應當利用這個本能，

教以行儀作法。啓益更就各種遊戲法的訓育上體育上的價值，一一予以敘述，此種都爲普通儒者所未曾述及。

適應各年齡的教授法的內容，和益軒並無大異。祇是益軒雖曾說過教育對於士農工商都有必要，但他的學說，却偏於武士。即在說及庶民時，也未嘗道出和庶民的教育卽「寺子屋」（學房）的關係來；所以對於社會的實際情形，殊有未能完全切合之處。至於啓益的說明，就常常和「寺子屋」發生關聯。啓益認爲小孩的爲善爲惡，完全決定於親教的如何，這種思想，是完全和益軒相同的。

第七節 陽明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中江藤樹

當時的日本，除却朱子學派占有勢力的，要算陽明學派。日本對陽明開始有深切研究的人，是中江藤樹。

藤樹（二二六八——二三〇八年）當慶長十三年生於近江高島郡小川村。名原，字惟命。通稱與右衛門。幼年由祖父撫養，及長，仕於伊豫的大洲侯；生母獨居鄉里。祖父歿後，辭任返里，事母至孝，且勤於研習。品行極篤，感化廣被鄉黨，世稱近江聖人。以四十一歲的壯齡而卒。學說極多創見。翁問答和鑑草是他的名著。常以書簡教訓弟子，所以書簡集中，也留着不少教育上的意見。他和益軒相同，也是通醫學的，但因早世之故，對於體育論，未能充分發揮；但像對於色欲的應當戒除等項，不僅作道德上的說明，而是從醫學及道德兩方面，加以解釋，見解極爲透澈。他是德行極高的人，教授弟子，諄諄不倦。有一個弟子名爲大野了佐者，當藤樹居大洲時，和了佐之父相友善，了佐之父因了佐愚拙，想使之從事卑業，了佐認爲羞恥，懇求藤樹授以醫道。藤樹深加憐憫，就把醫書大成論教他，日間教二三句，反覆講解約二百遍，但在夜間復習時，却已完全忘掉了，於是又教其讀百餘遍，才算記得了。這樣經過了幾年，依然沒有顯著的進步。後來藤樹歸近江，了佐跟隨同往，藤樹爲他撰了一本捷徑醫筌，教授數年之久，卒告學成。藤樹曾告誡其他門人說：「予爲了佐竭盡精力，彼極熱心，予亦深受感動。諸君天資，遠在了佐之上，如能立志，定有成就，所慮者，僅爲缺乏勉力一字耳。」

目的論 貫通天地萬物的永久不變的正確的道理，叫做「天道」或「天理」。對於此種天道或天理，藤樹也稱之爲「上帝」或「太乙神」。後來，他的學說，就和佛教發生聯系。在他所著的鑑草（女子教訓書）中，就是充滿着因果之說的。他勸人對神信仰。他的教育論，披上了宗教的色彩。這是一個特色。他認爲宇宙間的萬物，都是「天道」的枝葉，人類也是「天道」的分支，所以人之生也，便具有「天道」。這叫做「明德」，又名爲「良知」。吾人上自聖人，下迄無學文盲，都有着實行仁義之道的根底，換一句話說，人們都是具備着道德的本質的。所以人有孝行，也有仁義。

「天道」是絕對的善，所以人們自「天」接受過來的「良知」也是絕對的善。「天道」之善，觀察宇宙而可知。宇宙間的一切，都是善的，決無惡的。當然，宇宙間有天災，有惡人，也有罪惡，但不能稱之爲惡。藤樹斷言「上帝」決不爲人們製造不幸和災難。藤樹用「精粗之別」來說明此等不幸和災難。他以為，世間本無「惡」而僅有「善」，但「善」之中，有「精」「粗」之別，而且「精」少而「粗多」，鳥之中，鳳凰少而鳶鳥多；人之中，聖賢少而愚人多；但都是善的。這正像金、銀、銅、鐵，雖同屬金屬，但金、銀是金中的「精」的，而銅、鐵是「粗」的。

怎樣知道「明德」是人們都具備的呢？藤樹徵引孟子的話：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盡心上）

藤樹認為，這個「知」字，極關重要。幼兒爲親所抱，愉快地吸乳，愉快地入睡。這幼兒雖然沒有明白地意識，但安心無疑的是充分享受着親的慈愛，以自身的全生命委之於親而安心。如果被他人所抱，普通的小孩，就要哭泣，就要厭惡。由此看來，小孩雖無自覺，但在內心，却是「知」親愛，而且「知」愛親。這是「明德」的端緒，也是良心的表現。孟子又說：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離婁下）

此等不失幼小時的心而能發揚「明德」的，是「大人」，是「君子」。由此看來，孝行是「明德」中最具體而且是最初的表現。在這一點上，藤樹以「良知」爲孝，且汎稱「人道」爲孝。

「良知」的不能發揚光輝，是因蔽於「意欲」之故。洗滌此心上的污點，使行爲歸於端正，是學問的本質。洗清心頭污濁並使行爲端正之後，「明德」就立即顯示其本來的光輝。這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明明德」，而藤樹以獨特的見解，稱之爲孝行。

明人之「明德」係孝行之本意也。（翁問答上卷本。）

人是接受「天理」的，而天地之主是「天理」；所以天地是大的，而人是小的，天地從「形氣」方面說起來，雖然有着非常的差異，但從「理」的方面說起來，都是相互融通，毫無隔閡。我心在天地四海之中，同時天地四海在我心之內。所以積修養而磨練良知，便可以登聖人之域；同時可以合一於天地造化之道，而參與所謂天地的化育。

以上是教育的一理想論，也是「可能論」。藤樹一方面提倡「明明德」和「致良知」等抽象的理想，一方面又以孝爲此等理想的別名，而以孝行爲教育的標的。孝是廣大的，可以通之於天地神明，但同時，對於人們，却又是極直接的卑近的，而且是易於實行的。以此種廣大而卑近的高遠而平易的孝行，爲教育的目標，在「實踐道德」上，定可收到偉大的良果。藤樹的感化所以有力而深遠，當有着種種的理由，而他的「孝養論」的完美，定是其理由之一。

實際論 世無不愛子之親，但其愛法有良惡之別。倘予小孩以姑息之愛，這是惡的愛法，其結果，必將使孩子無才無德，等於禽獸。所以這種愛法，就是憎惡小孩，而導其入於惡道。而且，我身受之

於親，所以就是親之身；分受之於親的此身而生子，所以子的身體，根本上也是親的身體；不善教育孩子而使之陷於惡道，也就是使親之身陷於惡道。所以，不好好地教育孩子，是不孝中的最大的不孝（翁問答上卷本）。藤樹從孝行上以闡明教育的責任，是如此的透澈。

教育小孩，在幼小時，當是最好的時期。而根本的教育便是德育。關於德育，為親者及為師長者，示以良好的模範，小孩便自然而然的學善。這種感化，以幼小的時期為最好，這是因為在這時候，模倣的本能最強。而且，這時候的教育，是將來一切教育的基礎，所以為親者應當格外注意才好。

小孩生出後，有濫於管束的親，有過於放任的親。這兩個各走極端的傾向，是應當調和起來的。關於小孩的遊戲，可以讓其自由，但是父母應當隨時予以良好的感化。在鑑草卷四中，對於小孩的教育的方法，敘述得極為詳盡。小孩在八九歲時，生而為賢者，應命其讀孝經，使知大意，以為喻道的基礎，並將六藝中的急要者，逐漸予以教授。生而魯鈍者，難有深造之望，仍應向其講述孝經的意義，使之成為善人。自十五歲起，應注意選擇師友；求明「明德」的君子，聘為師匠，向其學習儒道。同時，職業上的知能也是必要的，所以須適應器量，考慮前途，在士農工商中擇定一種，從事學習。由此可知，

藤樹不僅重視德育，還注意職業的陶冶，這實在是值得推崇的。

關於知育和德育，藤樹抱着這樣的見解：往古沒有文字的時代，是沒有所謂書籍的，所以僅以聖人的言行爲模範，而從事學問的研習。自文字作成之後，就可以利用書籍，以爲研究學問之具。其後書籍漸多，孔子之時，已六經皆備。孔子以文行忠信四字教弟子，所謂文，當然是六經之文。孔子之時尚且如此，所以當沒有聖賢的今日，更有研究經書的必要。但經書也不過是明「明德」的階梯而已。

那末應當讀些什麼書呢？絕對不可不讀的書，是十三經和七書（註）歷史的書，可於閒暇時閱讀，以爲勸善懲惡之鑑。其他書籍，可以不讀。徒然多讀，必致心日交疲，且亦無益。不能讀十三經全部的人，可以精讀易經，如果僅此還不能做到的庸劣者，那末致力於閱讀孝經、大學、中庸，也可以理會得「道」的大體。

藤樹於十三經之外，還舉出七書者，是出於文武並行的意思。但藤樹的所謂文武，意義非常廣泛，而是仁義的異名。「天地之造化，雖一氣而有陰陽之差；人性之感通，雖一德而有文武之別。是故

無武之文，非真實之文；無文之武，非真實之武。陰爲陽之根，陽爲陰之根；文爲武之根，武爲文之根。以天爲經，以地爲緯，治天下國家，正五倫之道，是謂文。當惡逆無道者起而妨礙文道時，或用刑懲戒，或起軍征伐，以求天下一統之治，是謂武。是故合止戈兩字而成一武字。欲行文道之武，武道之根爲文；用武道之威以致治之文，文道之根爲武。文武二者，蓋不可分離者也（中略）。文係仁道之異名，武係義道之異名」（翁問答上卷末）。且文武各有「德」與「藝」：文之德爲仁，其藝爲文學禮樂書數；武之德爲義，其藝爲軍法射御兵法。吾人第一應努力學取根本之「德」，其次習枝葉之「藝」，而以本末兼備爲標的，這叫做真實的文武。此等人叫做真實的儒者。如果不能兼備，可以僅取其本。除掉山鹿素行之外，是他一般學者，都沒有像藤樹這樣地詳盡闡述武道的。藤樹對於武勇闡述如是周詳，一是由於他的勇敢的個性，二是由於他所生的時代（江戶時代的初期）還是崇尚武勇的時代。

對於女子教育，他悉力倡導修心。在他所著的春風中，曾經說：讀歌作詩，並不適合於女子，而心的修養，最爲重要。

最後，在他的書簡集中，記述着對於色慾的訓誡，這種訓誡，絕無壓迫的意味，而完全是基於對青年同情的合理的勸導，由這一點上，也可以知道藤樹是一個如何有着深厚道德的教育者。藤樹是日本最早闡說性教育的一人。

藤樹的特長，是道德感化的深遠。至其學說，亦有種種特色，如以孝為教育的標的，將容易流於高遠空虛的教育，變為淺近使其易於實行；宗教色彩的顯著；重視幼時的家庭教育；對文武二道，闡述的周詳；注意女子教育；以及對於性教育論之闡述等。

註：十三經是孝經、論語、孟子、周易、尚書、周禮、儀禮、詩經、禮記、左傳、穀梁傳、公羊傳、爾雅。七書是兵家的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三略、李衛公問對。

第二 熊澤蕃山

藤樹的門人中，最優秀的，是蕃山和淵岡山。前者是政治家，他的學說，並不完全承繼藤樹，有時還將藤樹的缺點，指摘出來，而後，則是忠實祖述者。

蕃山（一二二七九——二三五一年），名伯繼，字了介，俗名治郎八，後稱助右衛門。和闡齋、順庵

是同時的人。自幼聰慧，十六歲時，仕於岡山侯池田光政，其後因故辭仕，退居近江的桐原。該處是外祖母伊庭氏的鄉里，他就在該處，從其父學兵書，並讀經傳。二十四歲時，赴近江的高島，入藤樹之門，未及一年，因家貧，歸桐原獨學。二十九歲時，再仕光政，參與藩政，治績大舉，英名遍天下，入門請教的很多，適逢慶安四年（二三一一）由井正雪之亂，幕府不喜蕃山，加以壓迫，乃離開備前，住京師，再隱於播州。後來明石侯移住下總的古河，蕃山也就遷往該地。貞亨四年（二三四七）上表於將軍綱吉，獲罪，被幽禁古河。集義和書，集義外書，大學或問，是他的名著。

蕃山和藤樹同樣，以孝爲他的世界觀的根本原理；以爲人所應爲的一切之道，便是孝。但對於藤樹那樣的偏於陽明學，認爲不妥，且不憚指摘藤樹的短處，並謂以藤樹之非爲非，足以使學術純化，同時也就是尊敬師恩之道。蕃山研究的範圍，較藤樹爲廣。對藤樹所不研究的音樂，也有深湛的造詣，還深切地研究日本。他很早地在江戶時代的開端，就暗示出王政復古來（集義和書卷八）

蕃山也曾作源氏物語的評論，這是普通的儒者所不易做到的事。

蕃山的教育說，是養成武士的教育，這一點較藤樹爲狹。關於小孩的養育法，他以爲父母心中

雖懷仁慈，而態度應常莊嚴，一味柔和是足以導小孩於不良的，但過嚴亦屬不可。慈父應與小孩同遊，於無意間予以開導。「所謂養育幼童，非吾有求於童蒙，實童蒙有求於吾（中略）」應啓發小孩之長處，使習大人之道」（集義和書卷五）由此可知，他的教授法，完全是兒童本位的。

他認爲教育不可求速效，應待小孩「神智」的自然開展。小孩於三四歲時，發現「義之端」，因此有羞恥之心；發現「知之端」，因此有分別是非之心，但對於義不義，是非和善惡，究竟還不能清晰辨別。到了六七八歲時，發生辭讓之心，這是一「禮之端」，所以聖人定八歲爲入學的始期。他極重視學校，認開設學校是一「爲政之第一要事」（大學或問）。教育應從小孩易做的事着手。習字應於一日間將一字反復練習，爲使小孩不感疲勞起見，應於習字同時，教以父母及長者出門時的陪膳，迎送等禮節。極力避免小孩疲勞的這一點，實是江戶時代極珍貴的意見。自十一二歲起，使讀經傳，例如大學的首章「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四日讀畢，準此循序進行。如果多讀，就容易忘記。十三四歲時起，應重視禮節的訓練，並每日課以音樂（藤樹對於禮節和音樂，未曾明白地予以敘述）。十五歲時起，應注意弓馬兵法的訓練，並擇有志於「道」者，授以四書五

經，將以前誦讀過而未予講解者，加以解釋，自二十歲時起，使之自行研究經書，有不解的地方，訊問師友。他認為祇顧講解的教授法，是注入式的，雖然一時的進步極速，數年後必然忘却，所以應自求解釋，並明白言外之理。此外，還須悉心練習禮學弓馬，養成兼備文武二道的武士。數學在自宅學習，對於希望作進一步學習者，由學校予以教授。武士亦應學習數學，因為不知數學，便難授以兵略。他雖然不能想像今日的學級制度，但他認為同時教授百餘學生時，不應僅以一二個優秀者為本位，而應注意諸生的平均發展。

蕃山認源氏物語的描寫人情，極為精細，所以富有教育上的價值。這種意見，在室町時代以前，本相當普遍，但江戶時代的儒者，却是很少提及的。他著有女子訓一書，足徵其對女子教育亦極注意，但無特別的創見。

蕃山天才橫溢，是一個政治家，他於教育方面，根據自由主義以提倡兒童本位的教育，並設計方法，以求避免小孩學習時的疲勞，這些都是新的研究。後來益軒研究禮法、音樂、數學、和歌的教授，而蕃山實為他的倡導者。

第三 中根東里

蕃山以後，有着許多的陽明學者，在教育學說方面放射異彩的，便是東里。東里（二三五四—二四二五年）名若思，俗名貞右衛門，幼而出家，後讀孟子有感，乃師事荻生徂徠，不久入室鳩巢之門，研究朱子學，其後改習陽明學。在下野安蘇郡天明鄉設塾，德化廣被鄉民。

寬保三年（二四〇三）東里五十歲時，居相模其弟妻生芳子後不多時而逝世。家貧，不能雇乳母，就託他人之妻哺乳，因其人亦有哺乳自己小孩的必要，所以不久就辭却。再託給另一人，情形也是一樣。東里之弟是不得不出外經商的，不得已，就給錢與西隣的老太太，託其養育。這老太太完全看在錢的面上，所以照料並不周到，芳子本來很肥胖，不久就患皮膚病和下痢。東里之弟乃訪東里於下野，託其養育芳子，因為東里雖同樣貧困，但因居於塾中，便於照拂之故。後來東里漸見衰老，恐怕在芳子成長之前，自己或不能久留人世，就將芳子之父的苦心，以及自身對於教育的懺悔，記述出來，且加入女子之教訓，題為新瓦，給與芳子。該書前端繪有鳥獸之類，施以彩色，芳子極爲愛讀。東里自述對教育的懺悔如下：

汝父未嘗怒汝，汝有過，僅厲其聲正其色以警戒而已，故雖叱汝，汝不感懼。雖笞汝，汝不感痛……但予如叱汝，汝必懼，如笞汝，汝必痛。予甚媿之。

又說：

凡愛嬰兒者，常對嬰兒重複發言。如稱手曰「手手」，稱睡曰「啾啾」，及如稱鼓曰「鞀鞀」，此是述鼓聲；稱食曰「甘甘」，此是述食味；稱小便曰「尿尿」，此是述溺狀。凡此種種，皆審察事物之實況以資教誨者也。

由此可知，東里對於「審察事物（小孩學習的對象）實況」的一點，極為注意，所以他的教授法，可以說是一種深切的直觀教授。

註：小西博士的現今教育的研究第四章，對東里的直觀主義，闡述極詳。

第八節 古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伊藤仁齋

仁齋（二二八七——二三六五年）名維楨，字源佐，生於京都堀河，終生居其地。其始潛心於朱子學，後來發生懷疑，乃提倡古學。他是一個極溫厚篤實的人，所以其慕高風趨前領教者，達三千人。他的時代，較順庵、蕃山稍後，較益軒稍前。他的長子東涯，極有孝道，繼承父學，因此堀川學更見發達，一時天下學生，十之七八，皆歸其流。仁齋的名著，有語孟字義、童子問、論語古義、孟子古義。東里的主要著作，是闡述語孟字義的訓幼字義。仁齋雖不博識，但他以極緻密正確的方法治學，所以他的學說，在江戶時代的儒者中，最稱整然有序。

目的論 古學和宋學的差別，由於對孟子「四端」的解釋的差別而起。所謂「四端」，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四端是人人先天所具備的，「擴充」四端，可以完成仁、義、禮、智的「四德」。宋儒將四端作着這樣的解釋：吾人的「性」，受諸「天理」，「性」是善的，且萬人所賦有的「性」的定量，完全相同。此種「本然之性」，在庸愚者，往往為「物欲」所掩蔽。但「性」的光輝的一部，有時因「情」的發動，突破「物欲」的掩蔽而顯現出來，這就是「四端」。此種「端」，是回復「本然之性」的端緒。因此，所謂「四端」，是指恢復初有的即是失去了的端緒，而

所謂「擴充」也就是指將初有的一定量的「性」予以恢復而言。這就是「復初之說」。

仁齋對於「復初之說」予以排斥。依據仁齋的意見所謂「性」是可以完成「四德」的萌芽亦即是可能性。萌芽中有善也有惡，在道德修養上，惡是沒有考慮的必要的，所以叫做「性善」。這萌芽有種種，而主要的有四，所以叫做「四端」。所謂「擴充」一是將「端」放大的意思。經「擴充」而成的，是仁、義、禮、智，所以就是「德」。宋儒說仁義禮智是「性」這種見解，仁齋認為是錯誤的。

修德的標準，宋儒認為在於聖人，仁齋則認為在於君子。宋儒的意見是這樣的：凡是人，先天都有同量的「性」，所以做到修養上的極致的聖人，都是相同的而無優劣。但是，孟子雖然稱孔子、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是聖人，同時又認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都有所偏廢，他說：「隘（指伯夷）與不恭（指柳下惠）君子不由也（公孫丑上）」。程子認為稱伯夷、柳下惠等為聖人，是傳者之誤，但縱使是傳者之誤，宋儒和孟子總是有矛盾的。仁齋的意見是說：聖人是有着至極之德的，縱使僅在一種德行上做到了至極，那末雖對其他方面有着些許的偏廢，也可稱為聖人；至於君子，則是指對事

物得到中庸之道的人。所以君子的至極者，可稱聖人，而聖人就未必就是君子。而且，學問和修養，是沒有涯際的，無論什麼時候，都無法自己感覺到已經達到了至極的程度。以學做君子爲目的，不論從那一方面說起來，較諸以學做聖人爲目的，要來得妥善。所以孔子時常說到君子，而不常說聖人。原來在高遠的境界去求「道」，是錯誤的。「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孟子離婁上，）因此以做到君子爲學道的標的，是正當的方法。

以學做君子爲標準，其所應當履行的途徑，便是仁義。孔子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言，）由此可見，孔子所說的學問，是以道德爲主的。但是，知識如果不充分，雖有自信，也難免沒有判斷上的錯誤。孔子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論語爲政篇，）如果不多見多聞，對於自己的行爲的善惡，有難以判別之苦，所以增長見聞，謹慎言行，是修養的本則。仁齋在語孟字義卷下學的一章中說：「以道德爲本，以見聞爲用（中略。）先儒云：學兼知行，得之矣。」

學問的中心，是對於道德的實踐，而到達學問的中心的手段，是知識也就是見聞。見聞可以由

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得來。道德和知識的內容，是文、行、忠、信。所謂文，是古聖賢的遺文，足以表現古人的言行，而為今日的法則的；所謂行，是孝悌禮讓的行為；所謂忠，是盡己之心；所謂信，是言行的真實。所以文、行、忠、信的「四教」，是孔門學問的定法。

「行」之中的最重要的，是仁義禮智中的前三者。智是文之達德；文是達到道德的手段，所以仁齋認為仁義禮和忠信較智為重要，合成「五德」而以之為教育的法則。

實際論 仁齋是反對濫求多識多聞的。他認為：讀書先應辨別有用或無用，對於學問、政治、修身等沒有關係的，並無勉強研究的必要。在古人之書中有議論很好而不切於實用的，有在古時適宜而在今日不適宜的，有適用中國而不適用於日本的。對於此等問題一一加以體察，那末讀了每一卷書，就可悉成己用。如果沒有識見，雖一味貪多，涉獵數千卷書籍，亦屬無益。仁齋和益軒及素行一樣，是提倡讀史的。至於詩，認為是諸藝中的雅翫，是怡情悅性的，所以作詩亦可，不作亦屬無害，但酷嗜之必有害。文是所以明道的，所以非作不可。

人皆具有進修善道的「性」，但在此「性」中，有賢愚之差。仁齋對於此項差別，頗為重視，所

以竭力避免「劃一主義」之弊，東涯所撰其父的行狀中，也說：「其教導生徒，未嘗設科條，嚴督察，」由此可知仁齋所實施的教育，是寬大的自由的個性教育。在仁齋的塾中，設有「同志會」俾使生徒有切磋琢磨的機會。他在講解論語，孟子時，也避免注入式，用「會業」的方法，與門人共同討論研究。「會業」也叫「會讀」，其法是聚集衆人，讀同一的書，相互討論，而闡明意義。

仁齋的「性說」較諸其他諸儒，特別來得重視經驗，所以他的教育論，也是極切於實際的。他的個性教育論，就是從他的「性說」中引伸出來的。但是，如果相信宋儒的「性說」，其修養的結果，是確有把握的；而古學所認為「發達要素」的「性」，是否能完成「四德」，則須視修養的結果如何而定。這就是說：教育的可能的信念，宋儒強而古學弱，這是最大的缺點。

第二 荻生徂徠

徂徠（二三二六——二三八八年）江戶人，其時代較仁齋、益軒爲後，和白石、鳩巢、東涯相同。名雙松，字茂卿，通稱惣石衛門，別號護園。本姓是物部氏，所以叫物徂徠。自幼苦學，倣仁齋研究古文辭，主張要了解古文的真意，必先了解先秦的古文。他是博學多藝的人，養成了太宰春臺、服部南郭、

安藤東野、山縣周南、宇佐美濤等多數學者，當享保年間，一時有海內儒學皆歸徂徠之概。他的主要著作，有辨道、辨名、論語徵等。享保十三年卒。

宋明的儒者不必說，就是仁齋，也是深切研究孟子，而以理解孔子，但徂徠則以研究荀子爲基礎，而以理解孔子的。

目的論 徂徠認爲「道」並不是天然的「道」，而是先王之所作。「道」的作者，叫做聖人。聖人爲欲安天下，所以作「道」。「道」是治民的要具。聖人以聰明叡知之德，接受天命，爲天下之王，常汲汲於安天下的工作。因此，盡其心力，極其知巧，作爲「道」，以便天下後世聖人有所遵循。此種「道」也不是由於某一聖王所完成，而是由於伏羲、神農以下歷代聖人逐漸完成起來，經數千年始燦然大備。此種說素，是根據荀子所說的：「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中略）起禮儀，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以導之也」（性惡篇）。

聖人的制作，是並不違反人性的，這就是中庸上所說的「率性之爲道」（疏：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徂徠認爲區別性的善惡，於學無益。苟有志於道，聞性善可以格外努力學問，聞

性惡也可從事矯正。如無志於學，聞性惡將自暴自棄，聞性善亦將廢學。要之，學的成否，和性的善惡無關，一視進修努力的如何而已。因為「性」是於「道」無益的，所以孔子也很少提及「性」的問題（論語公冶長篇）。

「道」既不是天地間一切事物所當行的理，那末究竟是什麼呢？原來所謂「道」是先王所作的禮樂刑政等一切的總稱。孔安國在論語陽貨篇武城弦歌之章中註釋：「道者，禮學之謂也。」這是很符合於古意的（論語篇）。

徂徠的意見，認為「道」的主要者，是詩書禮樂四者，這叫做「四教」，又叫做「四術」。

其次便是對於「德」的研究。先王之道既是安天下之道，那末便須以「仁」為「德」之最大者。但是，所謂「仁」，並不是個人的「德」，而是安衆民以遂其生的「德」。根據此種見解，徂徠對「仁」下一定義，說是一長人安民之德。「我人所以學聖人之一道」為的是求仁。禮樂刑政之道，皆在求仁。人性雖有千差萬別，但無論智愚賢不肖，都有相愛相輔相成的心。農工商賈都相資以遂生。任何人都不能離羣獨居。荀子說：「君者善羣也」（王制篇）。

要做到「善羣」，除「仁」之

外無他法。學習「德」的形式，雖然因人而異，但所學的中心，一定是「仁」。這是徂徠的社會觀，也就是一種「社會的教育說」。自藤樹以下，很多人都注意個人的修養，但徂徠却注意整個的社會，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對照。因為他不十分重視個人的操行，所以在他的門人中，就有着不少的放蕩浮薄者。

實際論 所謂學，是學習先王之道。先王之道，極為複雜，同時要作全部的研究，殆無可能，所以先應學其大者。於學得大者後，小者就可迎刃而解。學習而僅及一隅，必無成就，於學畢主要的「四術」（詩書禮樂）後，尚有向多方面廣求知識的必要。徂徠認為「道」的目的是安天下，如果不通曉「道」的全部，就難於安天下，所以他重視博學。博學之後，自可立德，這種積知以立德的思想，和其他儒者的見解，初無二致。

先王之道非常複雜，而人的性也極為分歧。孔門的弟子均承孔子之教，以各習得其性之所近，而成就則大小不一。猶如天的降雨雖同，而長自地中的植物，却大小不一。這是天所賦與的命不同的緣故。也就是說：徂徠的所謂「性」，是指具有「遺傳質素」的個性而言。君子知命，所以不事強

求。宋儒的意見，認爲改變「氣質之性」而不爲「物欲」所惱，人都可以成爲聖人。但他認爲「性」是先天的，不變的，對於宋儒的「氣質變化說」極爲反對。他以爲人都可以成爲聖人的論斷，是錯誤的，天命是無論怎樣無法更變的。因此，進修學問，不必定是僅僅學習經學，能夠成爲「諸子百家曲藝之士」也就好了。他在徂徠先生學則的末了說：

講到爲學，寧可成爲諸子百家曲藝之士，而不願成爲道學先生。這句話，粗看起來，似乎是置道德於不顧，但實際上並不是這種意思。實在的意思是說：個性適宜於經學方面的人，就去學習經學，不適宜於經學的人，向其他方面去發揮個性，亦無不可。

因此，世無可棄的人，亦無可棄之物。世間當然有才高德茂的人，但即以聖人而論，也難免有所錯誤。宋儒認聖人毫無人欲之私，其所見實在並非真實。反過來說，芻蕘之言，也有足多之處。所以君子不拒人於千里之外，而助其前所成就。斤斤於善惡的分別，決不是教育人才之道。總之即所謂人各盡其才能之意。

聖人在古昔雖有，其後未嘗產生，所以學問應求之於古人之書。聖人之書，是先秦的文學，用後

世的思想去解釋是不行的，非熟習古文不可，賦詩和作古文，作為讀書的一種方法，是必要的。根據着這樣的理由，徂徠就從事獎勵詩文的教育。

他曾親自從岡島冠山習中國音，並提倡以中國音讀漢籍。今日的外國語教授者，主張在教授時，盡量不用日本語，務使學生澈底學習並理解外國語。這種主張，和徂徠的主張，完全相同。

徂徠還反對抽象的教授法，主張直觀的教學。他曾經說：「物是衆理之所聚，必須實地研究，始可心領神會，空口解說，僅能察知理的一端而已。」（辨道）這種理論，實是今日勞作教育的先聲。

徂徠的教育論，見於他的所著的政談中，大體上可以說是幕府學校的改革方案：第一、尊崇師道；第二、學校規模縱小，但設備宜周；第三、為維持學校久遠起見，經費來源，應須確定；第四、畢業生之選任官吏；第五、獎勵作詩；第六、設立詩學、文章、歷史、律學、和學、兵學、數學、及書學等八科。

徂徠提倡個性教育，認為對學者不必干涉，使之自由研習；這雖然不是他的創見，但可以說是在他的教育說的一個顯著特色。此種主張容易流行極端，在他的門人中，蔑視道義而偏於文藝的人，不在少數，這是可惜的事。

第九節 武士道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山鹿素行

素行（二二八二——二三四五年）名高祐，字子敬，通稱甚五左衛門。早歲隨父居江戶，涉躐儒學，兵學等各種知識，以兵學者之名聞於世，諸侯等聆其教益者很多，於是和蕃山同樣，為幕府所忌，寬文六年（二三二六）著聖教要錄，提倡古學，斥宋明的儒學，遭家綱將軍的輔佐保科正之之怒，被謫於播州赤穗。素行以獎勵武士道提倡名節為己任，厥功極偉，德州義士，便是受了他的感化而興起的。除聖教要錄之外，尚有山鹿語錄、配所殘筆等名著。

目的論 他的教育學說，是以古學為根據的，他和其他大儒一樣，也提倡道德主義的教育。但是，因為他的「性說」具有特色，所以他的教育學說也有着與眾不同的特色。他認為：「性」是天地間的一理一和一氣，微妙地配合而成的。天地因理氣交成而生，生生不息，沒有底止。人和物，也因一切天地的「妙用」而生。根據妙用而生的人和物，又各各分有此種妙用。理和氣微妙地配合起

來，肉體和精神都產生出來了；這種生生不息的情形，就叫做「性」。除掉理和氣的微妙配合之外，便沒有一性。「性」的作用，生生而無止息。但「性」之爲物，並無善惡之別。到了事後回顧時，才有善惡之別的存在。（山鹿語類卷四十一論孟子性善之說）孟子所說的性善，大概是因鑑於使人進修道德的必要，才如是云云的。且說因理氣的交感而生人物時，有過和不及之差，所以「性」也有種種差別：人厚於「理」而物厚於「氣」，動植物因薄於「理」，所以不能知「大道」；人厚於「理」，所以能感知天地的「大道」。由教以修道，使其「性」和天地相配合，這便是聖人，便是君子。

聖人具有最純粹的「性」，得天地的正氣，感知力最強，天地間無不通之物，且得「理」之中，所以他的行爲，誠篤而有條理；他的應接，從容而中禮；治國能使事事物物得其所。聖人法乎天地自然，定五倫之序，示五常之教。所以人能順從聖人之教，使「性」合乎天理，就可以變化「氣質」，這便是「真學」。不過在這時候，立志應正確而堅定，使學習之功充分集積起來。

實際論 人無生而知「道」者。如果不知「道」，其害在禽獸以上。要知「道」，除掉從師受

業以外，沒有其他方法。所謂「受業」，是模倣師的行爲，以進修德行。人所應學的標準，是聖人，所以爲人師者，應以聖人之教教人；但今日沒有此等聖學的師匠，今日的師匠，僅能予人以文字上的解說而已。但聖人所教的人之「道」，本來是天地自然之間所行的「道」；而我人先天天地具備的「性」，是有着感應的能力的，所以我人祇要做行「自然之道」就可以了。天地是師，事物也可爲師。素行認爲做行「自然之道」，較下面所述的讀書爲尤要，他曾經說過：應接多數事物，便可以獲得「格致」之功。

另外一個方法，是讀書。書是記載古今的事蹟的，所以讀書便可以知道古今之事。讀古聖人的書，可以知道聖人的言行。但讀書的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正心修身的方法。自誇多讀博覽，實有害而無益，即在孔門，也認讀書是有餘力者所爲的事，如果將出入起居事物應接等急務，擱置一邊，而以讀書爲先務，爲主體，實是誤解了爲學的意義。素行的如是重視作業，實在是一種勞作教育。此種事物應接的教育法，雖也見之於中國，而素行似已更進一步。他又認爲應讀的書，僅是聖人的書。聖人的書是天地自然之道，所以極易了解。時常闢讀而尋繹其理之所在，便自然地可以了解，這是因

爲一切都合於實理之故。聖賢的書，應背誦其重要部分。聖人的書以外的書，因難有不正確的記載，不能全部付之實行；但也可以增長才能，不必完全予以拋棄。讀書的方法，先習小學，詳記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等，庶不到誤解文義。詩文不可廢，但如耽於此道，不免玩物喪志，所以應該極力避免捨本而逐末之弊。

師是修身的指導者，所以弟子應尊師而重師道。

化民成俗，設學校實爲上策。所以教育不僅士所必要，而爲萬民之所必需。古代中國，學校普及，所以國家之平治可期。日本因求學校設立的普及，最好先在各村改寺社爲學校，以僧侶神官爲教師，教化其子弟，正肅冠婚葬祭等大禮，而以完成五倫之教（山鹿語類卷七：設學校立道學。）

家庭教育的中心在父母。母雖亦有教子之責，但父之責較重於母，此因父爲子綱、夫爲婦綱的緣故。

普通的教育方法，分爲知育和德育兩者，在家庭教育方面亦然。換一句話說，就是德和才。素行所說的「性」和「知」相近，所以他就比較地重視知育。

素行認爲所謂學問，有的是由「才」以進「德」，也有由「德」以養「才」。這種意見，較諸許多儒者，僅說明「由才以進德」的一方面，實在是一種獨特的意見。他又認爲：幼兒天性淳厚，早具仁義禮智信之德，但因知聞狹隘，知識不免缺乏，所以應內修五常之德，外習六藝之才，而使知德兼備。

教育有一定的順序，關於此點，素行於語類卷十六教戒有節一章中，有詳細的意見發揮。小孩生齒時教以飲食之禮，手會握物時教以使用右手。三歲時正其視聽，勿使應用卑劣之言，即在遊戲之中亦應具有禮容。七歲時女子血氣開始發動，因此注意男女之別。八歲時男女氣力均見充分，所以應嚴其警戒，使習出入起居等禮容。九歲以上，以心身的狀態爲依據，而施以教育。此等學說，較諸益軒的「隨年教育法」爲簡單，但益軒並不說明理由，而素行則逐一說明其理由的所在，這是他的學說的優點。他對於小孩的知育，認爲讀書習字自屬必要，同時並應注意日常事物的應用。如果是與世事無關的知識，縱屬博學，亦無裨益。

教育女子和教育男子雖無不同之處，但應以柔和隨順爲本。特別是子孫的教育，係於母親的

優良與否者至鉅，所以女子也應充分學習聖賢的規範，治理家政，堅守貞節，善導其子女及僕婢。

素行所提倡的古學，雖未十分精湛，但他根據獨特的「性說」，重視日常的知識，提倡勞作的教育，注意「才」「德」的修養，都為教育界放一異彩。此外，多數學者，因為並非儒官，所以對於學校制度，並未予以詳述，但同樣並非學官的素行，對於有實施可能的學校制度，很早就予以考慮了。

第二 吉田松陰

松陰（二四九〇——二五一九年）是長州藩士，承繼素行的學統，所以稱素行為先師。名矩方，字義卿，通稱寅次郎。當時外國船艦赴日者甚為頻繁，邊境多事，因想出遊海外，藉以視察宇內形勢。安政元年，美國軍艦泊下田，擬搭乘是艦，未果，被捕入獄。後釋出，自安政三年起，在其叔父所設的萩城下松本村的松下村塾，從事教育英才。安政五年，擬刺老中間部詮勝，被捕，翌年處死。在他的武教講錄中，有着他對於女學校的意見。

江戶時代的儒者，都根據儒學，主張女子自十歲以下，不可外出，所以女子教育，其範圍僅限在家庭之內。松陰主張建設女子學校，選有節義學問長於女工的女子數名，任為教師，使士大夫的女

兒八歲至十歲者入學。

第十節 折衷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細井平洲

平洲（二三八八——二四六一年）名德民，字德馨，通稱甚三郎，尾張人。自幼好書，就折衷學者中西淡淵學，後赴江戶，教授諸生。事父母至孝，待人極友善。得米澤的上杉鷹山侯的信任，參與該藩學政，促成興讓館的發達。其後，受尾張侯的知遇，將衰落了的名古屋的蕃學明倫館，復興起來。主要的著作，有嚶鳴館遺草，又在他的關於米澤蕃學所建白的米澤學校商討書中，很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意見來。

凡是一種折衷的學說，雖屬穩當，但總容易缺乏一貫的主張。日本的折衷學派，也不能外此。平洲和藤樹及仁齋不同，他對於政治饒有興味，而且也參與政治。因此，他的教育學說，也有着政治的色彩。以爲教育者無諸上自人君下至下民皆屬當務之急，正和「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論語陽貨篇)的說法一樣，仁政的第一要着便從教育開始。國內和平的基礎也惟教育是賴。對上層者給與政治之才，對庶民則使其依從上層的政治。給與庶民的教育，平洲並不認爲其目的在於使庶民賢德。教育上的四民平等和機會均等，平洲始終迄未有想及。

孔子也曾經說過：「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篇)。人是萬物之靈，天性好善惡，利用這一優點，可以導其所好的善，防止其所惡的惡。因世間沒有不可教的人，所以教育者的任務極爲重大。正和立曲木不能求直的影一樣，在不良的教誨之下，也沒有產生善人的道理，要立直の木以求正的影，日月之光是不可或缺的，這也就是說：尊師長，嚴師道，是一個先決問題。師道之嚴雖是師長本身的事，但同時又必須尊敬請教者並順從師長方可。師長的人選，以具有仁厚長者之德並博學多才之人爲最佳，但學德兼備的人，實際上並不甚多。所以有着下列諸點的人，便可以成爲優秀的師匠，即是爲人溫和正直，不嫉人之賢，喜聞人的善言，喜稱人的美行，敬信古今經籍的記載，且擬引用之於今日。

教育的方法，應當適應年齡的差別。但對於小孩，須爲早教其有善心和善行：當懷妊之初，母親

就應當謹慎視聽言動，希望所生之子能夠吉祥；生產以後，父母便應以身作則，在自然中養成小孩的良好習慣。孔子也曾說過：習慣成自然。總之，當兒童於能辨別是非時起，固應嚴正地教導其言行，幼小之時，教導時應以慈愛為主。

平洲和徂徠同樣，也是尊重個性的，但有一點不同，就是徂徠認個性是無可更變的，平洲却認為可以予以更變。至於對於為學的方法的主張，和徂徠完全相反，他認為為學不應樹立流派，所以仁齋、徂徠等對於漢宋諸儒，多所指摘，對於此種指摘，平洲極表反對。

其他儒者，多數都主張注重一己的修養，對於外來的賞罰，却未言及，但平洲對於賞罰，有詳細的闡述，他認為如不勵行揚善斥惡，風俗就不易改良。且賞應多於罰，褒譽有善行者，使他人知所做效。古時經典中所載的許多善事，要完全實行，這在賢人和君子才能做到，而為普通人之所難於企及，祇要能夠習得一二，以躋於君子之列，漸次由易及難，使之進修起來，斯可矣。

詩文是可以辨知人情厚薄的，所以亦可學習，但不必強求成績的完善，完善和粗淺，均屬無妨。祇要盡其力之所及即可。詩文成績的完善與否，在平洲看起來，對國政是沒有深切的利害關係的。

平洲，與其說是一個學者，還不如說是一個道德家。他重視道德，甚於學問。因為他是參與政務的，所以他的教育學說，少空論而切於實際。

第十一節 國學派的教育說

第一 國學的發達

日本國學，是根據日本的古籍，特別是日本最古的古籍的奈良時代的書籍，從事於日本古代即儒佛傳入以前的思想、信仰、道德、法制、國語、歷史的研究。在元祿時代以前，雖然研究古籍，但是以儒佛的思想為中心去觀察古籍，所以未能說到真正研究日本固有的思想等項。

到了江戶時代的中葉，文教大開，學術昌盛，於是捨棄了感受儒佛影響的後世的有色眼鏡，對日本的古道古俗，予以真切的觀察。元祿時代的下河邊長流和契沖，是其先驅。特別是契沖，在萬葉集的研究上，有着劃時代的功績；但因為他是一個僧侶，還未能完全脫儒佛以從事研究。到了享保年間，京都稻荷神社的神官荷田春滿，開始着手闡明純粹的古道，並向幕府作設立國學學校的建

議。他的弟子賀茂真淵（二三五七——二四二九年）是遠州濱松人，曾在江戶倡導古學，並曾做照契冲，研究萬葉集，且研究祝詞等，著有國意考一書，對古代思想及古代道德，敘述極詳。真淵的弟子中最優秀的，是本居宣長。宣長（二三九〇——二四六一年）生於伊勢的松坂，向朱子學者堀景山習儒學，其後習醫，以為本業。再後讀契冲、真淵的著述，有志於國學，三十二歲時，入真淵之門。其學廣及各方面，而集注其一生之力，於古事記的研究。古事記傳四十八卷，實為江戶時代國學的最大收獲。

宣長的弟子中，最有聲名的是平田篤胤（二四三六——二五〇三年）和伴信友（二四三三——二五〇六年）。篤胤猛烈排擊儒佛，而注力於古神道的提倡。

第二 本居宣長

宣長受徂徠之說，認儒者所說的道，是聖人所作的道；但他又認為：所謂聖人者，是要掩飾其奪取天子之位的惡行（如舜奪堯位，禹篡舜位）而造起道來的。為欲遂行惡事，於是盡其心，苦其身，行善以欺人，所以聖人看是善人，實際上却是惡人。因為「道」是以污濁的心作成的，初看似屬真

誠，實則欺人利己，所以世人表面上似乎順「道」而行，但實際上連一個人都不予置信。由此看來，「道」並無所裨益於為國家，僅是歷代儒者的口頭禪而已。日本的古道，並不是人為之道，也不是天地自然之道，而是依據高御產巢日神的御靈，由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所創始的神道。神道廣大無邊，凡春秋的變遷、風雨、晝夜、國土、人事、吉凶禍福，無所不包。不幸和災難，也是神道。善人也會遭逢不幸，惡人也會繁榮，凡此種種，都是人智所不能測知，而為神道的高深的所在。人所應為的，是崇拜道之根源的神，因而尊奉神之天孫的天皇。關於渡世的重要的知識，並不是與有生俱來的，所以教育原屬必要。再者，古道是用漢文寫成的，所以要闡明古道，漢文的知識也是必要的。我們可以說，極力闡揚崇神忠君之道，便是宣長的大功。

第三 鈴木朗

鈴木朗（二四二四——二四九七年）字叔清，通稱與助，號離屋，尾張人。因出自書香之家，所以對儒學極有素養，任名古屋明倫堂的教官，更就宣長研究和學，用和學的精神說明漢學的內容。他的離屋學訓，是教育上的名著。

對於學問，他依照論語的見解，分爲文學、德行、政事、言語四科，他認爲此種分法，雖是儒家學說，但也是和漢相同的。但此處的文學，並不是今日所說的文學，而是包括制度、禮典等項；至於言語，却包括着今日的文學在內。實際上，言語和文學，都是表現德行和政事的，所以這四科，也可以大別爲知和行二部分。

文學中有「道」「藝」二種。所謂「道」並不像宋儒所說的一元論。而且並非原理及實在之意，乃爲徂徠式的多元的說法，而是人生一切的所必需者。換句話說，就是達到人生理想的方法的內容。文學是記述「道」的，所以學文學，卽是學道。「道」中有「事實」和「道理」，「道理」是包蘊在「事實」中的，所以知道「事實」道理也就明白了。重「理」的人往往輕視「事實」，所以他們所想得到的「道理」，是不免有錯誤的。「事實」的稔悉實所必要；因此，對於記述「事實」的言語文字，是必須通達的。至於所謂「藝」是「道」的方法，也是「道」的細目，大別之，可以分做文武兩種，也可分做禮樂書數射藝等六藝。此外，如茶道、插花、圍碁等藝，也可以供情緒上的慰安，所以亦應學習，醫、占二道，仍然不應放棄。

學習「道」「藝」須具備五個條件，叫做「五具」，就是：師、友、書籍、以及本身的精力與志等。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志」，有了「志」，其他四者，便可迎刃而解。這就是說，有了「志」，不一定要明師良友，常人皆可為師友；且在普通書籍中，也可以獲得很大的裨益。志愈大愈好，但在人的資質中，已先天地有着大小的差別。文學廣及「道」「藝」兩方面，而研究的方法，應以讀書為主。世俗以習字為先，讀書為後，這是錯誤的，至遲於七歲時開始讀書，至早於十歲時開始習字。習字先習筆劃簡單的，讀書先讀文句簡短的。初學的讀本，在漢文方面，以千字文、蒙求、及益軒和漢名數為適當；同時，應讀數部「假名」書，如神代正語（本居宣長著）、小倉百首、玉梓百首（宣長）等。為準備讀此等「假名」書起見，有教以「片假名」「平假名」「濁音」「拗音」「音使」等的必要。要了解「雅語」，便有通達「俗語」的必要。在和語方面，古今集遠鏡（宣長）是適當的參考書；在漢文方面，譯文筌蹄（荻生徂徠著）是適當的參考書。至抄書的方法，對讀書是極為有益的。其他對於政事和德行，似無特別的意見。

第四 佐藤信淵

信淵（二四二九—二五二〇年）字元海，出羽雄勝郡人。以農學爲傳家之本，信淵於繼承並推佈家學之外，更學習蘭學、經濟、天文、測量、醫術等，又遊說海內，闡述貿易的利益，講解海防政策。更向平田篤胤習國學，盡力於古道的發揮。嘉永三年歿，年八十有二。

他在農政本論一書中，論述農民教育的必要；又混同祕策一書中，述說一般教育的制度論，茲將混同祕策一書的大意，紹介於下：該書因世界各國國民苦於惡政，所以主張日本應將世界混合統一起來，從事救濟。先將京城遷於江戶，定爲東京，在皇居之西設皇廟，其東設大學，其北設教化臺，其南設神化臺，再南設太政臺，更於周圍設其他各種官署。大學校中祀造化的三神（日之神、天兒屋根神、天太玉神），其前設法座，日日請教化大師講法教。大師說產靈神的大道，所以出入奏音樂，法座飾以珠玉金碧。中師、小師和亞師，不昇法座，而在其他講座說法。諸官人的選舉及政事的會議，均在大學中舉行。會議的結果，小事即付施行，大事於祭告宗廟後施行。

教化臺支配所有學校的生徒。職員有大師、中師、小師、亞師、上官、中官、下官之別。大師的法宮，應極盡金碧的精巧。學生分誠明、神祇、儀禮、音樂、法律、武備、醫術、天數、地理、通譯等十科學習，以畢業生

補任官吏。

神事臺也有大師以下的官，但其生徒，則使其在教化臺中學習。

信淵更在垂統祕錄一書中，詳述地方的學制。鄉村之有二萬石土地的，必須設立小學校，由教化臺派遣上中下之官，從事教育；神事、太政二臺，也派出中下之官，以爲輔佐。各村「教育所」的生徒，其優秀者，送入小學校，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禮，並使讀四書、小學、近思錄及六經。有時集合村民，演講道學。卽下民之子，如有英敏者，亦送至王都的大學校；凡庸者，則歸家習產業。小學校是教化臺的派出所，有三臺（神事、太政、教化）的職員，所以也執行當地的神事及政事。陸軍府也設官吏於此，產業方面的官署，也設於小學校的鄰近。在學校的支配之下，更設「廣濟館」以救萬民的窮困；設療病館，以救萬民的病苦；設慈育館，以養育貧民的小兒；各村建「遊兒廠」供七歲以前的小孩游玩；設「教育所」以教育八歲以上的兒童，且對於村民的善惡予以獎懲。「教育所」及「遊兒廠」每約一石之地各設一所。「慈育館」相當於今日的託兒所，「遊兒廠」相當於今日的幼稚園，「教育所」相當於今日的小學校。信淵所說的「小學校」是教育年齡和「教育所」相同而特

別優秀的生徒。要之，信淵是想以神事和教育爲中心，實行社會的大改革，雖不免有些近於烏託邦，但却說得非常透澈，其對於託兒所和幼稚園的計劃，尤具卓見。

第十一節 兒童的養育與教育

兒童的養育 在江戶時代，婦人懷孕後，於第五個月「着帶」此舉和前一個時代相同。妊娠期中，避免過勞，又肉食可使胎兒得胎毒，故以多吃植物性的食品爲主。其在上流社會，則設「產屋」，於第九個月遷居其內，但中流以下，無法作此設備，所以第一次分娩在母家，第二次分娩多在夫家。嬰兒於出世後未呱呱發聲時，立即以捲在手指上的柔和的絹，揩淨嬰兒的口中，其次以竹刀切臍帶，再汲井水或自西東流的河水浴身（稱「產湯」）浴後暫以布包身，其後着「產衣」。先飲仁「甘蓮湯」（以黃蓮及甘草等配合而成）等，以去胎毒，然後授乳。第三日集親朋慶祝，第七日剃胎髮。此時以前，先定「幼名」，至加冠後乃定「實名」。定名的方法，是取親名的一字，或依木性、火性等「生性」定名。生後一月出「產屋」，母子乃同謁產土神。滿一百二十日，舉行「食初」的

祝典，滿一年，舉行誕生的祝典。誕生的祝典每年舉行，直至親歿為止，大概是慶賀親子都極健全的意思。

小孩滿三歲，不論男女，都舉行「置髮」的儀典；在此以前，每月剃髮三四次。滿七歲，男女都穿無紐的衣服，此等儀典，稱「帶直」或「紐落」。

關於養育的理論，因醫學及儒學的進步，而大見發達。禮記的內則及列女傳中所述的胎教。日本學者甚為信奉，所以在此時代，關於胎教的論述極多。

養育的方法，在漢醫方面，香月牛山的小兒必用養育草，最稱大成。他是貝原益軒的弟子，益軒對該書推崇備至（養生訓卷八）。到了幕末，小兒科的醫學，極有進步，此種進步，是以蘭學的醫方為根據的。牛山在小兒必用養育草中，對於須使小兒飲母乳及常帶三分飢和一分寒等養育法，一方徵引古醫的話，一方加入自己的意見，敘述得極為周詳。在其後所刊行的育兒書籍中，桑田立齋的愛育茶譚（安政年間）、岡勁齋的小兒戒草（文政三年）都極有名。這些書籍，大體上雖在今日，亦足供參考。天保年間，種痘法亦自中國傳入。

這時代的論者，對於育兒多主嚴格。當然，所謂嚴格，要須適應年齡的高下，並不是徒然使小孩發生畏怖，祇是自幼卽不應使小孩恣意放肆，這是多數論者一致的意見。

關於小孩的遊戲，藤樹在鑑草卷四中，益軒在和俗童子訓卷一中，均有敘述，但是都是消極地主張不妨害小孩的遊戲，至於積極地確認遊戲在教育上的價值的，則不多觀。僅牛山曾經說過彎弓、競走和放紙鳶等，足以使身體強壯，而模倣燒飯煮菜的遊戲，足以使女孩習知家務，此等遊戲，都有其教育上的價值云云，這實在是一種卓見。

這時代的遊戲極多，至於玩具的增加，實在難以計數。一年四季，全家攜着辨當，到郊外去欣賞艷花楓葉，以及正月、上巳、端午、七夕等歡遊，對於小孩的健康，都能給與良好的影響。

兒童的教育 關於幼兒的教育方法，多數學者的論述，都以禮記的內則爲根據，否則亦僅是斷片的訓戒。其中以牛山的小兒養育草，對幼童的管理法，敘述特詳。他曾經說：

當幼兒逐漸會站立時，乳母等應從旁幫助之，說：「立呀，立呀，」教他站立。當快會步行時，說：「走呀，走呀，」教他步行。

小孩的訓育，如果一味姑息，必易使之爲惡，雖然如此主張，可是牛山的重視順應兒童的自然發展，尤其於施行嚴格主義。蕃山和徂徠亦然。但在江戶時代的多數儒者，却說毋寧採取嚴格主義。常盤潭北在他的民家童蒙解卷下之二，對於嚴格主義，敘述特詳，他並且引古語的「波濤之魚不知浪，嚴家之子不知嚴」以說明嚴格主義的合理和適用。再者惕齋的尊重兒童的學說（比賣鑑卷一）在當時是極爲難得的見解。

當時，一般地說起來，職業是世襲的，農工商的方法，是小規模的，所以小孩在家庭中，看慣了父母及其他長輩的行事，就可以獲得一般的常識和職業的知識。再者，當時對父母長輩的儀禮，極爲重視，進退應對，不容絲毫疏忽，而以之爲訓育的標準。因爲如是注意德育的鍛鍊，知育的發達或未免因是感到遲緩，但受了當時的教育的人，道德都是很完美的。不論家庭、社會以及學校，對於德育的訓練，都極注意。

第十三節

朝臣的教育

江戶時代，「明經道」方面，因中原氏寢衰，常任爲助教，「明經博士」僅限於清原氏的子孫的伏原、船橋二家。「文章道」方面，從菅原氏分流的高辻、唐橋、五條等，獨告繁榮，任「文章博士」及「大學頭」。但是擔任天皇的侍講的，僅限於清原氏的兩家。此等博士家，使用新註的，祇有大學和中庸，其他都根據古註，後光明天皇認漢唐之說爲粗淺，程朱之說則理氣明白而公正，乃勅令自此以後，必須以新註爲準；於是博士家就都使用新註了。

朝臣對於儒學及音樂、和歌、習字等學習，大體上是因襲平安時代的，所以在幕末以前，未有學校。到了幕末，因幕府及諸藩的學校設施，朝廷方面，也開始建設學校的計劃；寬政四年（二四五二），老中松平定信，發起設立學校之議，於是有中井竹山的貢獻建學私議。到了仁孝天皇的天保十三年（二五〇二），終於爲矯正朝臣子弟的操行及教以學藝起見，開始在建春門前建築學校，至弘化二年（二五〇五）落成，天皇賜名爲學習院。該院每日念書，至於講解每月僅有三次。弘化四年三月間的講釋，有如下九科：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詩經 書經 孝經 國史 國學

幕末之際，公卿脫離向來因循的生活，而努力於朝威的振興，這一方面是時代的力量，一方面也是學習院的力量。文久和元治年間，該院成了國事的議會，各地的志士也有任職於該院的，於是學習院即有如尊攘論者的俱樂部。

第十四節 武士的教育幕府經營的學校藩學

武士的教育 在室町時代以前，武士雖勵行文武兼備，但尙有不學的人。在江戶時代，武士一因須養成政事上的才能，二因欲成爲其他三民的道德上的模範，於是就非學文道不可了。江戶時代的教育論中，文武的關係論之所以特多，就是起因於此。優秀的武士，對於文武諸般的藝能，都極練達。月尋堂作的今樣二十四孝卷三中，曾詳述一武士名松川竹右衛門者，有博學，工書法，對騎馬、大刀、長刀、弓矢、洋鎗、茶道、聯句、謠曲、琴鼓等，無一不精，且有孝行。

如果以文武的藝能爲知育，那麼武士的訓育，便是心志堅定，行儀端正，重視義氣，以及周旋中禮等。此等道德的精神的修養，大抵是在家庭中養成，或是模倣同藩中長輩的行動。關於知育的訓

練，據西鶴的武道傳來記卷二的記載，當江戶時代開始時，武士的子弟有在寺院中作初步的學習的，但一方面因幕府及諸藩的學校漸次發達，一方面私塾又復進步，所以其後武士的子弟，便不復往寺院學習了。諸藩的學校，多數是文武並行，但亦有不如是的。幕府的學校，雖然並非不習武道，但大體上也是傾向於文道的。

昌平坂學問所 德川幕府直轄的學校，在江戶有昌平坂學問所，在甲府、駿府、長崎、佐渡、日光等地，也各各設有直轄的學校。

昌平坂學問所，略稱昌平齋，這都是寬政九年以後的呼稱，以前單稱聖堂。當寬永七年（二二九〇）將軍家光將江戶的忍岡（在現在上野公園之內）之地，給與林羅山，羅山大喜，於其地築書院塾舍。寬永九年，尾張侯德川義直，於其地建廟宇，祀孔子，配祀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寬文三年（二三二二）將軍家綱，賜以弘文院之號，將該書院稱爲弘文館。寬文四年，幕府命林氏撰本朝通鑑，林氏即於此開史館。寬文六年，本朝通鑑完稿，於是增加林家的秩祿，並規定以前使用於史館的費用，永爲學生的費用。但因弘文院之地狹隘，於元祿三年（二三三〇）將軍綱吉，重新勘測湯島之

地（現在的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之地）擴大規模，將聖廟遷移過來，綱吉自書大成殿的額字，給與林家。並根據孔子的生地（魯昌平鄉）稱該地爲昌平坂。翌年，廟宇落成，是年二月，修釋奠，綱吉親自蒞臨。於時羅山之孫信篤，任從五位下大學頭，林家後嗣累世充任大學頭，以管理聖廟，其家塾由幕府支配，但幕府改林家的私塾爲官學，則並不在此時。

其後盛衰無常，當明和及安永年間，是最衰微的時期。迨將軍家齊繼任軍職松平定信任老中，遂盡力於儒學的復興，寬政三年，聘柴野栗山和岡田寒泉爲廟學的教官，並禁在聖堂講朱子以外的異學。三年，增學糧，聘尾藤二洲爲教官。四年，改築學舍，恢復舊觀，且設教官宅，並開始試驗經義、史學、時務、作文等四科。同年，聘古賀精里爲學賓。五年，因林家無嗣，以岩村藩主松平能登守乘蘊之子述齊繼其家。

同年（五年）詳細規定學制，始置學規及職掌二制，茲將其要點錄述如下。學規有五則：

一、入學 凡僧徒、商工、樂伎及姓名籍貫不確實者，不得入學。但雖爲商工而捨其本業專心向學者，仍准其入學。

二、行儀 篤實謙讓，守信重禮，禁議國政，切戒怠惰、博弈、玩戲、美衣美食等。

三、修業 依據學生個性，分經史、作文等科，但開始時均須習四書及小學。敗俗非聖之書，新奇怪異之說，均在嚴禁之列。每年施行試驗，三年落第者，令其退學。

四、講會 在討論義理講究精微之際，必須有所典據，無稽臆說，在所切禁。又當作詩爲文時，須向前輩領教。

五、出入 校門的開閉從嚴，出入必須向門監說明姓名。卯時（六時）開，酉時（六時）閉。寄宿生除疾病外，不准外宿。

職掌分八條：

- 一、員長 教育生徒二人。
- 二、司監 督促勉勵，告誡遊惰並掌理儀式二人。
- 三、司講 協助員長從事教授。無定額。
- 四、司計 掌會計，保管器物二人。

五、司籍 保管書籍一人。

六、司漏 掌時刻報告一人。

七、司記 保管賬簿一人。

八、司賓 接待賓客，指揮校門開閉，保管鑰匙二人。

同年又設「童科」。松平定信於寬政五年引退，而於寬政九年，幕府斷然改聖堂爲官學，稱「學問所」。以前士庶兼收，廣求英才，自是以後，不收普通生徒，祇許任幕臣的大夫、士及其子弟入學，以官費教育幕吏。但幕臣欲入他塾，亦無不可。總之，朱子學的修養，是任官時人物銓衡的一個條件。寬政十年，大興土木，重建聖堂，於十二年全部落成。面積廣及一萬一千六百坪，分大成殿（聖堂）、聽堂（座敷）、講堂（稽古所）、學舍（寮）、教員的官宅等。

自是以後，內部的組織及教育方法，都受幕府的指揮。該所在幕府管轄下的校制是這樣的：教員方面，林大學頭任「總教」，但不從事教授。其下有「儒者」（亦稱教官）四五人，司生徒的教育。更有幫助「儒者」從事教授的「出役」等。所謂「出役」是在其他方面有本官，而於此幫助

教授事宜的。一年的經費爲一千五百石。對於生徒，不收束脩及謝儀。

生徒分「通學稽古人」（通學生）和「寄宿稽古人」（寄宿生）二種。二者可以任意選擇，但在初步學習時期，則僅許通學，不准寄宿。每日自晨七時至午十二時，在「稽古所」（講堂）由「出役」教授「素讀」（念書）。午後可以作「會讀」或「質問」從事自由研究。逢三八日，在同所舉行講解試驗，此一試驗，由教師熱心指導，目的在充分鍛鍊學力，和單純記取分數的不同。學業稍進後，在寄宿寮的南樓，每日自晨七時起，終日作自由研究，爲期一年，如提出請求，可以繼續，仍由教官或「出役」等担任輪講、會讀、質問等指導，書籍可以借閱。再者，南樓的「通學稽古人」於春秋二季各舉行試驗一次。

寄宿寮本有三幢，每幢十室，一室收容一人，故全部定額爲三十人，自天保年間以降，又復增建，共容四十八人。一切食物、炭油、醫藥，完全供給。書籍可以借閱。對於寄宿寮及南樓的生徒，每月逢一六日，在「稽古所」舉行經書的講解，逢二七日，舉行輪講。南樓生徒每日舉行的輪講及會讀，寄宿寮的生徒，亦可出席。逢三八日，舉行講解試驗，和通學生相同。此外，有和南樓的通學生相同的，便是

春秋二回的試驗。自文久三年起，逐日須將課業記入日記，於春秋二季試驗前，繳出檢閱。這時候，和諸外國間的交通開始，和親條約及通商條約，都已締結，洋學研究之風極盛，但該所對於寄宿生，嚴禁取閱橫行文字的書本，由此可知幕府及林氏的固陋而缺乏變通之才。再者，以前的「大學寮」是規定有最長年限的，而昌平校似無此規定，祇是寄宿以一年為限，如有希望繼續的，必須於退學之外，再請求入舍。幕府對武士是主張文武並行主義的，所以寄宿生之希望練習武藝的，可在舍內自由操練。

逢四九日，在寄宿寮的北樓，舉行講釋，聽講者是三千石以上的幕臣；於四七九日，在「座敷」（聽堂）舉行講釋，聽講者是「旗本」、「家人」及寄宿生。在「稽古所」逢一六日所行的解釋，外來的亦可聽講。再者，在仰高門東舍的「日講所」每日舉行的講釋，不問士庶，凡提出姓名的，都可聽講。仰高門是大成殿的大門。這是一種成人的講座，是從林鳳岡之時開始的。

修業的次序，分「素讀所」、「復習所」、「初學所」、「講釋」、「會讀」、「試業」等。「素讀所」是使幼年者練習四書五經小學的「素讀」（祇念不講之意）其內容組織，從大學起至小

學止，分爲七等，每等又分十人爲一組，逐日練習。「復習所」是使習過「素讀」的人復習之所。學完了「素讀」就升入「初學所」。在這裏，讀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也讀蒙求、十八史略等。在「初學所」的人，又須聽下列的講釋，即是逢四七九日在「座敷」（聽堂）舉行的講釋，逢一六日在「稽古所」（講堂）舉行的講釋和在仰高門舉行的日講等。在「初學所」學畢者，出席於小學的「會讀」，其次依序出席於論語、詩經、書經、易經、周禮、左傳等的「會讀」。在「會讀」時，由教師一人或二三人出席指導。「會讀」除上述經科外，尙有「漢土史料」、「本朝史料」、「刑政科」等。再者，有「會讀」程度的生徒，對於詩文的學習，亦不可怠忽，每年舉行詩會二回，文會四回，寄宿寮和南樓等的生徒皆出席。

關於「試業」每月逢三、八日，及春秋二季的試驗，已如上述。此外又有每年十月的「素讀」試驗及每年夏冬二季的詩文試驗等。

上述的教授順序及其方法，和今日的學級及學年，極爲不同，像「素讀」等，也有分組，這就是個別教授的方法。雖無學年之別，但依科別遞升，其進程定得十分精細。像今日的不論優秀或凡愚，

均在同一年級內學習的事，在當時是完全沒有的。當時是依據學力的高下，而自由地登第的。規定時日以學習，則和今日相同。

在此種情形之下，昌平坂學問所，是大大地整頓起來了。當時獎勵向學，不遺餘力。自寬政年間到天保年間，是學問所的盛時。當幕末之際，一方因世事紛繁，一方因洋學擡頭，於是漸趨衰頹。明治元年，昌平校收歸政府，明治三年，改稱大學校，其後又改稱大學，明治四年，學制革新，乃將該校廢止。昌平齋中的研究，限於朱子學，對於經史的註解，限制綦詳，所以沒有自由新穎的研究。但因學校地位極高，為諸藩學校的模範，所以對於江戶時代的教育，貢獻仍多。這一點，和平安朝的大學相似。當時的漢學教授法，不論何處，都和昌平校相彷彿。

昌平坂學問所直轄的江戶市內的「教授所者」有三：其一在深川，享保八年（二三八三）幕府撥地，使儒者菅野彥兵衛，從事教授；其二在麻布，天保四年（二四九三）大鄉金藏得幕府的許可後開始教授；其三在麴町，寬政三年（二四五—）借地與儒者服部善藏，使之教授，這三者都是鄉學。

幕府設立的其他學校 在昌平坂學問所以外，尚設有各種直轄的學校。和學講談所，在江戶表六番町，略稱和學所。該校是於寬政五年，由塙保己一向幕府請求而設立起來的。寬政七年起，該校置於昌平坂學問所的支配之下。

醫學館，在江戶神田佐久間町，建於明和二年（二四二五），由醫師多紀安元教授。其時稱躋壽館。寬政三年，重訂規則，改爲官學，始稱醫學館。自此時起，成爲幕醫的教育所，對於藩醫及町醫，僅許旁聽。館主由安元的子孫担任，分眼科、小兒科、外科等。於有系統的講釋外，尚有對患者的實地診察。其後並採取荷蘭的醫方，但仍以漢醫方爲主，所以教授法方面，在講釋之外，亦有「會讀」及「輪講」等，和儒學的教授相同。

其後外國船艦行駛日本近海的日多，終因美艦的泊於浦賀，強請開國，以及鎖國政策的終止，於是西洋的思想文物，接踵輸入，而洋學就勃興並普及起來。幕府於安政二年（二五一五）設洋學所於九段坂下，使從事於荷蘭文的翻譯。安政三年，改洋學所爲蕃書調所，任纂作阮甫、杉田成卿爲教授，於譯文之外，並教授荷蘭語，而於翌年開校。萬延元年（二五二〇）將蕃書調所移至小川

町，加授英法兩語，設化學科，其後又加授德俄兩語，文久元年（二五二一）又在該所內設物產局，又改革以前僅許幕士入學的制度，許諸藩士亦得入學。文久二年，蕃書調所移至一橋門外，改稱洋書調所，開始遣留學生至荷蘭。文久三年，移交昌平坂學問所主管，教授洋式數學，並改稱開成所。是年，遣留學生赴俄國及英國。慶應元年，移交陸軍奉行主管，加授物理學。慶應二年，移交「外國奉行」主管，始聘荷蘭人任教師。翌年，將學則全部改正，採取外國式的教授法。明治元年，朝廷接收該所。明治二年，改爲大學南校。明治四年，歸文部省管轄。明治五年，改稱開成學校。明治十年，改稱大京大學，這就是今日的東京帝國大學的文理、經濟等學部的前身。

荷蘭醫方逐漸得勢，於是於安政五年，荷醫伊東玄朴、竹內玄洞等相議結果，建種痘館於江戶的內神田。文久元年，幕府接受之，改稱西洋醫學所，而與醫學館相對立。更於文久三年，單稱醫學所。自這時起，西洋醫方終於壓倒了漢醫方。明治元年，醫學館改爲種痘所，而歸醫學所管轄。同年，朝廷接收醫學所。二年，改爲大學東校。五年，改爲第一大學區醫學學校。七年，改爲東京醫學學校，並將長崎的醫學學校併入。十年，和開成學校一同改爲東京大學，這就是今日的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濫觴。

此外，在幕府的學校中，尚有安政二年設立的講武所。這是因歷久太平，「旗本」（將軍的親兵）的武勇漸衰，而當時海警頻傳，於是乃有該所的設立。該所建於江戶的築地，編成鎗隊，練習刀、槍、弓術、砲術、游泳等。安政五年，另設練兵所在深川越中島，供鎗隊調練之用。萬延元年，將講武所移至小川町。再者，於安政五年，在築地設軍艦教授所，至講武所遷移後，即於其故地設軍艦操練所，以供航海術的練習。慶應二年七月，將軍艦操練所改稱海軍所，同年十一月，將講武所改稱陸軍所。慶應三年，陸軍所招聘法國教官，而海軍所則招聘英國教官担任教授。

現在再來列舉幕府領內的學校如下：儒學方面，在長崎有聖堂，一稱明倫堂，始於正保四年（二三〇七）醫生向井元升的創立立山書院。該堂教授漢學和學醫學，歷代都以向井氏的子孫任祭酒，收取生徒的束脩謝儀，士農工商均可入學。在甲府有徽典館，一稱甲府學問所，寬政年間創立，以教育「旗本」「家人」的子弟為主，僅收通學生，不收束脩謝儀。天保十四年（二五〇三）復興之後，再為發達，教官從昌平校派遣，館內並置有醫學所。此外尚有下列諸學校：

修 教 館 佐渡 相川 文政七年（二四八四） 教授官吏及醫師。漢學之外，亦教和學。

溫故堂 伊勢 山田 弘化四年（二五〇七） 本稱中儀館。

明新館 駿府 安政五年（二五一八） 許幕臣及農商入學。教官田昌平學派

遣。

日光學問所

日光 文久二年（二五二二）

教授幕臣、輪王寺之僧、農官、農工商。教官由昌平校派遣。

洋學、兵學、醫學方面，在橫濱，於文久元年，設有英學校，同年，另設修文館，以爲漢學的學校，明治二年，將兩校合併，仍稱修文館。在長崎，於文久三年，設有語學所，教授華、俄、英、法、荷五國語言，後來改稱濟美館。又於安政四年，幕府遣松本良順赴長崎，學習荷蘭醫方。良順請於幕後，建立醫院，稱養生所，文久二年，改爲學校，稱精得館，以荷蘭軍醫波都溫任教師，這是日本以洋醫教授醫學之始。又在元治七年（二五二四）在神戶設立軍艦教練所。

藩學 自儒學普及文化顯著發達之後，各藩也各各興建藩學，並設鄉學，以教育藩士及藩民。藩學多數設於藩地，其中也有設於江戶的藩邸中的。因爲是在江戶時代，所以以漢籍爲主，也

習武藝，有時也習國學及醫學。校規和教授的方法，都是大同小異，模倣着幕府的學問所的法制。漢籍的註釋，也多根據朱註，特別是寬政年間禁止異學以後，對於朱子學，尤爲注重，但其中也有傾向於陽明學，採用古註，或是折衷新古的。學校的費用，由藩負擔，多數不向生徒徵收束脩及謝儀。因以教育藩士的子弟爲主，所以普通都不教庶民入學。寄宿者少，多數是通學的。

幕末之世，和外國間的關係，頓見頻繁，幕府既建設了教授種種新科目的學校，各藩也感到實施新教育的必要，於是教授荷語、英語、西洋數學、荷蘭醫學、航海術、洋式的砲術及練兵等的學校，也漸見增加。其中也有選拔優秀人才，遣赴江戶或其他處學習的。

現在，將重要的藩學列表如下，然後，再將特別重要的，加以若干的解說。

校名	藩名	所在地	創立年代
總稽古所	大和郡山	同	享保年間（一二四八〇頃） 明治二年稱敬明館，同三年改稱造士館。
菁莪堂	攝津高槻	同上	寬政年間（一二四五〇頃）
有造館	伊勢津	同上	文政三年（一二四八〇）

崇廣堂 同 津 伊賀上野 文政四年（二四八一）

立教館 同 桑名 同上 不詳

明倫堂 尾張名古屋 同上 寬永年間（？二二九〇頃） 初名學問所，寬延二年改稱。

弘道館 常陸水戶 同上 天保九年（二四九八）

弘道館 近江彦根 同上 寬政十一年（二四五九） 初名稽古館，天保元年改稱，明治二年改

爲文武館。

敬教堂 美濃大垣 同上 天保八年（二四九七） 初名致道館，維新後兼習洋學。

文武館 上野高崎 同上 寶歷年中（二四二〇頃） 初名遊藝館，安永三年罹火災，閉校，明治

元年復興。

日新館 陸奧會津 同上 寬文年中（？二二三〇頃） 初名稽古堂，元祿三年稱講所，天明八年

改稱日新館。

敬學館 同 二本松 同上 元祿年中（二二五〇頃） 另設武藝所、習字所及文武學校二十一

校。

明德堂	陸奧三春	同上	天明年間（二四四五頃）	
明義堂	陸奧盛岡	同上	寬永十三年（二二九六）	初名文武場，後改明義堂，又改作人館。
養賢堂	同 仙臺	同上	元文元年（二三九六）	初名學問所。
興讓館	出羽米澤	同上	元祿十年（二三五七）	初僅稱學校，安永五年改稱。
正義堂	越前福井	同上	文政二年（二二七九）	
明道館	同 福井	同上	安政二年（二五一五）	明治二年改稱明新館。
明倫堂	加賀金澤	同上	寬政四年（二四五二）	別有名隆武館的武道學校。
壯猶館	同 金澤	同上	安政元年（二五一四）	洋學及砲術的練習所。
時習堂	同 大聖寺	同上	安政元年（二五一四）	
尙德館	因幡鳥取	同上	寶歷六年（二四一六）	
修道館	出雲松江	同上	寶歷八年（二四一八）	初名文明館，次改明教館，其後再改修道館。
好古堂	播摩姫路	同上	元祿四年（二三五一）	設有支校仁壽校。

修道館 安藝廣島 同上 天明二年（二四四二）

延享年中已設研究所，天明二年設學問所，慶應二年改稱修道館。

誠之堂 備後福山 同上 天明六年（二四四六）

初設弘道館，安政元年設誠之館。

明倫館 周防山口 長門萩 享保四年（二三七八）

安政三年分設兵學校。

醫學校 周防山口 長門萩 天保十一年（二五〇〇）

初名醫學所，後改濟生堂，再改好生館。

博習堂 同 山口 長門萩 安政三年（二五一六）

是西洋學問所，安政三年自醫學所分出，研究航海術。

學習館 紀伊和歌山 同上 正德三年（二三七三）

初名講釋所，後稱講堂，寬政年中改稱學習館，設有醫學館。

長久館 阿波德島 同上 寬政三年（二四五二）

教授館 土佐高知 同上 寶歷十年（二四二〇）

文久二年設致道館，廢教授館。

明善堂 紀伊久留米 同上 不詳

初名講談所，又稱修道館，後稱明善堂，萬延年中稱學館。

修猷館 筑前福岡 同上 天明四年（二四四四） 初名東學問稽古所，另有西學問稽古所。

弘道館 肥前佐賀 同上 天明元年（二四四一）

五教館 肥前大村 同上 寬文中（二三三〇頃） 初名學校，元祿七年改稱靜壽園，寬政年中分設武術的學校。

時習館 肥後熊本 同上 寶歷二年（二五一一） 兼授武道。武校稱東榭及西榭。醫學學校稱再春館。

廣業館 日向延岡 同上 明和五年（二四二八） 初名學寮，嘉永三年定校名。

造士館 薩摩鹿兒島 同上 安永二年（二四三三） 翌年於館內設醫學院。

藩學中的最早的，當係名古屋的明倫堂，爲藩祖義直所設立，初名學問所。義直夙好儒學，聘窩四天王之一的堀杏庵等，提倡學問。學問所的創立時期，不甚明瞭，大概是在寬永年間，寬永十三年，招儒者深田正室，以建立此校。同年，在陸奧盛岡藩，設文武場，天保十三年，改稱明義堂，慶應二年，又改稱作人館。此等初期的學校，和初期的昌平校相同，以半官半私的爲多。根據日本教員史資料第一冊至第三冊，創立年代分明的藩學，在江戶時代有二二三所，在維新以後有四六所。現在將江

戶時代的藩學，關於其創立年代，作成統計如下：

期間（始終紀元）	年數	將軍	年	號	創立學數	一年間創立學校平均數
二二六三—二三四〇年	七八	家康・秀忠 家光・家綱	慶長・元和・寬永・正保・慶安 承應・明歷・萬治・寬文・延寶		三	〇・〇三九
二三四一—二三七五年	三五	綱吉・家宣 家繼	天和・貞享・元祿・寶永・正德		一三	〇・三七一
二三七六—二四〇四年	二九	吉宗	享保・元文・寬保		一〇	〇・三四五
二四〇五—二四四八年	四四	家重・家治	延享・寬延・寶歷・明和・安永 天明		五七	一・三〇〇
二四四九—二四八九年	四一	家齊	寬政・享和・文化・文政		七〇	一・七〇七
二四九〇—二五二六年	三七	家慶・家定 家茂・慶喜	天保・弘化・嘉永・安政・萬延 文久・元治・應應		七〇	一・八九二
	二六四				二二三	〇・八四五

明治四年廢藩置縣後，藩學大多廢止，其中的少數，改爲高等學校、中學校或小學校。

名古屋的明倫堂，上面已經說過，是藩祖之時創始的。其後曾一度廢止，至延享五年復興，寬延

二年（二四〇九）稱明倫堂，宗睦之時，天明二年（二四四二）大興屋舍，以細井平洲爲總裁。文化年中，冢田大峯繼任總裁，以大峯註的十三經爲教科書，這是屬於古註方面的。天保四年（二四九三）以鈴木朗任教授，於是兼授國學。自慶應年間以後，授武道。平民不許入學。

鹿兒島的造士館，是安永二年島津重豪倣照昌平校而建立的。曾經一度衰落，傳到他的曾孫齋彬之時，加以復興。生徒都出自費，但對優秀者十五人則給與津貼。課程分漢學、和學及筆道。平民不許入學。於安永三年另設醫學院，後來又設演武館，齋彬之子忠義的時候，另設教授英語的開成所。

荻的明倫館，是享保四年毛利吉元所建，其始因受徂徠門人山縣周南的臂助，所以奉徂徠學，其後改習朱子學。課程極多，分漢學、音樂、天文、地理、算術、筆道及各種兵法。十四五歲以前習文，其後兼習文武。至於醫學校，開始時教授古方家的漢醫，其後增加荷蘭醫方，開始種痘。嘉永三年分科，許町醫入學。安政三年，移設於明倫館之內，元治元年，添設解剖、生理等課程。再者，安政三年，又設博習堂於明倫堂之內，是洋學校的性質，研究兵術。慶應元年，合併於三田尼的海軍學校。此外，在山口有

明倫堂，在三田尻有講習堂，在江戶藩邸有有備館，以教授和漢之學及其他。

在熊本，文道的學校稱時習館，武道的學校稱東西兩榭，是寶歷二年細川重賢所建。士卒可隨意入學，平民之優秀的亦得入學。漢學、習字及儀式，每日在館中學習，算術、音樂及古典，在教授的私宅及館中學習，兵術平素亦在教授的私宅中學習。漢學以三年為一期，經試驗之後，無希望者，令其退學。在學期間，以九年為最長。開始時在句讀齋習句讀（素讀），其次在蒙養齋獨習文義，進一步更在堂講參加「會讀」及「輪講」，再進一步，便寄宿於菁莪齋，從事學習。生徒不一定兼習文武，可以隨己所好。至於醫學校，稱再春館，是寶歷六年所創立。

米澤的興讓館，為上杉綱憲在元祿十年所創立。其後，治憲（鷹山侯）師事細井平洲，致力牧民，於安永五年，復興學校，始稱興讓館。士族全部入學，僧侶及農商，則禁止通學。通學生自十歲前後入學。使二十歲以上的藩士中秀俊者二十名寄宿，供給其飲食炭油。亦可自費入舍。特別俊秀者，給與學費，使赴江戶學習。以儒學為主，也稍稍學習禮式。其始以徂徠學為主，其後改為朱子學。其醫學校稱好生堂，是寬政四年治憲聘平賀鳩溪所創建，其後他藩的醫生亦相率來學，盛極一時。至兵

學校則稱演武校。

會津的日新館，創始於寬文初年藩祖保科正之的建立稽古堂。正之曾聘致山崎闇齋，崇信神道和宋學，因此全藩歷久遵循不衰，且傳統地注意學習歌曲及神道。此外，授以洋學、醫學、算術、筆道、禮式及各種兵術。士族自十歲起，必須兼習文武。長子以二十五歲，次子以下以二十一歲為退學之期，學未有成，不許退學。如學能速成，那麼就是修習期未滿，也可退學。文武都分四等，以一等為大學，其生徒稱大學主。

水戶的弘道館，是天保九年德川齋昭所建。齋昭的弘道館記中有云：「忠孝無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羣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光圀開史館，藩中學術大昌，到了齋昭之時，終於有弘道館的產生。分文武二館。文館分「居學」、「講習」、「句讀」及「寄宿」等四寮，附有「編輯」、「系纂」等局。武館分「兵學」、「軍用」、「劍術」等十一場。另外有「歌學」、「天文」、「數學」、「音樂」、「軍事」等局。「句讀寮」後廢止，改在弘道館的教師的私宅學習。諸士以上的子弟，十歲以上，必須學「素讀」，十五歲左右，試行論語、孝經的講釋，入「

講習寮，「先參加「會讀」次參加「輪講」。其優秀者，送入「居學寮」在此自由研究。生徒均於午前學文，午後習武。入弘館不須試驗。在館的中央祀鹿島大神，館外祀孔子，以示尊內疎外之意。另有醫學館，在漢方之外，當幕外之際，加授蘭學，生徒須經甄別，不可任意入學。此外，在江戶的藩邸中，也設有弘道館，其一切制度，均以水戶的弘道館爲準。

第十五節

庶民的教育

寺子屋

鄉學

私塾

庶民的教育，卽在江戶時代，亦由庶民自任。因此，教育不普及的地方，大半是無智文盲。江戶等大都市或中央部，十人中有九人就學於「寺子屋」或其他教育機關，但在地方上，因政教未經普及，所以風俗不良，少年耽於飲酒、博奕、歌劇，父兄每多漠然置之。但當時極端重視主從長幼的關係，已如上述，所以內在家庭，外至鄉黨，少者都須嚴守長輩的訓戒，所以雖在知育上多不足觀，但在訓育上却有足多者。到了幕末，鄉學、私塾、寺子屋開始普及，弊風漸見改革。前二者是士庶共同的學校，而後者爲庶民的學校。

「寺子屋」(學房) 寺子屋，是從前施行的寺院中的俗弟子教育的繼承。至江戶時代，便和前代不同：由於儒教的發達和教育的進步，在寺院以外，有幕府及各藩的學校的設立，以教育士人，並有許多鄉學、私藩的興起，以教育士庶，在此種情形之下，寺院在大體上，便僅擔任庶民教育的一部分。而且，大的寺院，是專心致力於僧侶的教育的，因此，擔任教育庶民的子弟的，就僅限於小的寺院。也就因為這樣，其程度頗低，也就是一種初步的庶民教育。其生徒稱「寺子」。在寺院以外，神官和醫者等，開設和寺院的寺子教育同程度同內容的私塾，而所謂「寺子屋」也許就是包括寺院以外的此等私塾的總稱。所謂屋，是米屋、魚屋的屋（中井竹山草茅危言卷三）因此，「寺子屋」的名稱，是醫者、商人等在寺院以外教授習字以後才有的。但是，此一名稱的使用，以關西為主，在奈良，所謂寺，是僅指興福寺而言，稱其他小寺為「庵室」，所以亦稱「寺子屋」為「庵室」。在關東，或許是因為寺院經營的初步學校較少，所以沒有「寺子屋」的名稱，而稱為「習字師匠」。在大都市，以和人口的對比說，寺院是少的，而且，在寺院以外，堪以擔任初步的教授的又很多，因此寺院以外的習字指導，早已發達了起來，但是，到了鄉間，情形就完全相反，所以到了後世，寺院的教育還

是相當地保留着。現在特將幕末及明治初年的三府的寺子屋校主的身份職業，分爲市部和郡部，根據日本教育史資料，作成統計如下：

	華族	士族	僧侶	神官	醫	平民	不明
東 京 市	〇	一二三	一〇	七	〇	一五五	〇
市 部 京 都 市	一	七	二	一	〇	三四	三三
大 阪 市 及 堺 市	〇	九	〇	一	四	八八	一
東 京 府	〇	三三	三六	四	四	一一三	一
郡 部 京 都 府	〇	六九	一七〇	三八	五六	一三四	二三
大 阪 府	〇	二五	一五三	一一	一七	一五二	四

在教育進步了的江戶時代的末葉以後，郡部方面，寺子屋還是很多，如果追溯到江戶的中期和初期，因爲教育沒有像末期那樣的普及，所以僧侶以外的教師，定然很少，而在寺院學習的比率，當是更多。這樣地加以推究，而作成這樣的結論：「供庶民作初步學習的私塾，是從寺院中俗弟子

的教育發達變遷而來的，「想來並無不妥。就是從文獻上稽考起來，可知江戶初期的庶民的初步教育，其大部分確是在寺院中施行的。

幕府對於「寺子屋」既不予保護也未加以干涉，爲政者對於庶民的教育可說是未加置意。惟在將軍家宣之時，當正德元年（二三七一）曾對江戶的「習字師匠」頒布命令，命其不可僅教書道，且應糾正風俗，恪守禮儀，訓導忠孝；又在吉宗之時，命室鳩巢將六諭衍義譯成平易的和文，頒給江戶的「習字師匠」以爲習字帖，復命鳩巢作五常五倫名義，以爲習字帖；迨天保十四年，命「習字師匠」負起糾正風俗訓導忠孝之責，而以幕府的法令實語教大學、小學、女今川、女孝經等爲習字帖。至若諸藩，像富山藩的干涉寺子屋的內容，勝山藩的令將生徒的姓名及出席記錄於每月底送呈檢閱，小濱藩的令繳出席勤惰簿，芝村屋的每年令官員巡視藩內，將「寺子屋」的成績優良者報告藩主而定獎賞。這些固是事實，但以一般而論，對於寺子屋，是一向任其自然的。

江戶時代的文化，自天明、寬政年間起，特別發達，因此「寺子屋」亦於是時起，顯著地發達起來。寺院中的「寺子屋」祇要寺院存續，擔任先生的僧侶縱然死亡，就有替代的僧侶繼其後，所以

「寺子屋」可以長久延續。至於俗人的「寺子屋」於先生死亡，或轉居遠方，或變更職業後，就往往歸於廢止。因此，俗人的「寺子屋」就很少相繼承襲的，但也有例外，例如在江戶，歷時最久的是淺草區三間町的龍淵筆學舍，始於元祿十一年（二三五八），迄於明治十年，歷時約一百八十年。其次，是京橋區南八丁堀的龍雲堂，始於寬延二年（二四〇九），迄於明治三十年頃，歷時約一百五十年。

小孩到了六七歲，由其親率領，攜帶書案、硯、紙、筆及束脩，進「寺子屋」，這叫做「入寺」。江戶時代的「寺子屋」不像室町時代的有寄宿，這大概是因為「寺子屋」普及了，在適當的距離，就設有「寺子屋」的緣故。授業從上午七八時到下午二三時，但沒有時間表。每晨前往，將書案擺列開來，歸時將書案置於室隅。離家近的歸家午膳，離家遠的攜帶辦當。午膳後略事休息，其他時間沒有休憩，和今日的情形不同。普通的「寺子屋」有三四十人，教師僅一人，但也有親子或夫婦任教的，也有女教師僅收女生徒的。設有學年的區別，但因有初入學的，有已經三年四年的，所以多數分成二組或三組。依男女分組，尤為普遍。

教科以習字爲主，「往來本」(參閱第五章第六節及第六章第五節)一方面是習字帖，同時又是讀本。先生據「往來本」一方面教授讀法，同時教授書法。教時先生就上座，生徒到先生處學書法及讀法，然後回到自己的書案練習。練習時先生來回巡閱，持生徒之手以校正其運筆方法。習字帖普通從「假名」開始，其次是收集生徒所住地方的町村之名而成的町名及村名，再次是收集姓名所用文字而成的名頭。此種開始練習時所用的習字帖，大抵是先生自己寫成。再進一步，就是練習「往來本」。此種「往來本」有的是買來的，有的也是由教師自己寫成的。如是經過二三年，將各種「往來本」學習後，如欲作進一步的研究，就學習四書的「素讀」。至於女子，則多學習小倉百人一首及女大學。

江戶時代的「往來本」以「往來」爲書名的，爲數已在五百以上，如果再把不以「往來」爲書名的一併計數在內，爲數必然更多。在室町時代，「往來本」已經分成專供信扎模範之用的和專供學習知識之用的兩種，到了江戶時代，這兩者還各各分成若干形式。專供信扎模範之用的「往來本」中，在風月往來、知古往來、年中往來、文章雙魚之外，還有很多「某某文章作法」之類，以

提示文例。

屬於知識方面的「往來本」最稱發達的，是地理類和實業類。這大概是因爲當久治之世，各業發達，京都、大阪、江戶等大都市趨於繁榮，交通又極便利之故。地理方面的「往來本」有駿府往來（慶長十七年即二二七二年作）、江戶往來（一名自遣往來）、龍田詣、日本往來、洛陽往來、攝河往來、都名所往來、海津往來、隅田川往來、東海道往來、新撰大和往來、中仙道往來、松島往來、箱根往來等，種類殊多。大概說起來，是關於一地方的「往來」最先發達，其次是巡拜名勝古蹟的「某某詣」之類（詣是拜廟的意思），像東海道往來，是說明交通路線的。自維新以後，有世界國盡地球往來等關於全世界的往來，以及關於日本全體的往來，又有關於府縣的往來。關於實業方面，在元祿年間，有京都的名叫堀流水軒的「習字師」匠所作的商賣往來，接着有諸職往來、農業往來、百姓往來、大工番匠往來等，更分化而成問屋往來、本屋往來、萬作往來、養蠶往來、地方往來等，更有以商品物產爲內容的諸國名產往來、江戶名物往來、吳服往來等，自維新以後，又有萬國新商賣往來、世界產物往來、開化農商往來等。

關於教訓方面的「往來本」，像室町時代的實語教，當不能認為純粹的「往來本」。到了江戶時代，才有着金平往來、謹身往來、孝行往來、養育往來等。關於歷史方面的「往來本」，在江戶前期，以收集古人的信札而成的居多。在元祿年間，有太平記忠臣往來。其後，有直接敘述史實的天神御一代往來、弓勢爲朝往來等。到了幕末，同着尊王論的影響，而有南朝忠臣往來。除了上述以外，尚有以禮法、法令、宗教等爲內容的「往來本」。再者，「往來本」中，專供女子閱讀的，亦復不少，最主要的，有女今川、女大學、女實語教、女庭訓等。

檢討上述「往來本」的內容及形式的發展，可知室町時代以前的「往來本」，縱令帶有一「和習」，大抵係屬漢文，但到了江戶時代，就有雜入「假名」的文字。因爲多數的「往來本」，其刊行及著作的年月不明，所以那一本是最初雜有「假名」的，難於遽然作答。但被認為江戶初期最早的風月往來、年中往來等，已經是雜有「假名」的了。惟至江戶時代，也依然是有用漢文寫成的，像文章雙魚一書便是。

又在江戶時代，「往來本」逐漸放棄了習字帖的目的，而僅供閱讀之用。因爲僅供閱讀，所以

沒有印成大字的必要，而是用小字印成小本子。這也就是說，讀法一科在庶民教育中是獨立起來了。

「寺子屋」中，也有教授禮式、茶道、插花、珠算、謠曲中的一種或數種的，但並非常例。珠算的教科書，以寬永四年吉田光由所著的塵劫記爲最有名。

在上述的知育以外，「寺子屋」對於德育方面，也極注意。

每月的一日和十五日是假期，二十五日大抵也放假，因爲這是天神的祭日。凡「寺子屋」都以天神爲文道之神，所以信仰極篤，在二十五日，師匠往往率領「寺子」參拜天神，還令「寺子屋」誦讀類似佛經的天神經。由寺院經管的「寺子屋」對於天神崇拜並不若何顯著，只能說是禮拜寺中的佛像或是教授簡單的經文。又以文殊菩薩是智慧的菩薩，故對奉祀文殊菩薩爲佛像的奈良興福寺東經堂舉行文殊會之日，「寺子」的前往參拜者極盛。「寺子屋教育」的根柢，有着顯著的宗教的色彩，這是值得注意的。其他種種節日及年末年始，當然放假。運動雖非特別獎勵，但當春秋二季，也有團體參觀及遊山之舉。

「寺子屋」的考試叫做「浚」，雖無確定的方法，但普通每月複習「往來本」的讀法一次。又於每月的第五日或第十日，從事謄寫。在年末舉行「大浚」，即使之視讀背誦抑或默寫「往來本」若干册。也有於每月的二十五日，舉行書法展覽的。

「寺子屋」雖還不免有缺點，但因普遍發展，生徒之長者在學達五六年或五六年以上，所以對於初等教育，貢獻良多。教材雖不多，但像反復練習、個別指導及師弟親密諸點，即以現代眼光觀察，還是一種可貴的方法。幕末的「寺子屋」根據日本教育史資料，其數達一萬五千，實際上恐已超過此數的數倍。因江戶的「寺子屋」一般均謂有九百至一千之數，但上書僅載二百九十七，即是僅載實數的三分之一而已。當時的任何地方，其「寺子屋」均較今日的小學為多，今日的小學校全國達二萬六千，那末當時的「寺子屋」當二倍於此數，而為五萬，或許全國達十萬以上，亦未可知。「寺子屋」對於庶民教育的貢獻，由是可知。

鄉學 是指在幕府及諸藩的支配之下的學校而言，目的在於教育各地方的士民，又稱鄉校。依據設立者分類起來，可以分爲幕府或諸藩所設立的，以及藩臣中的地方官或地方的士民所設

立的。幕府所設立的，已記述於上文昌平校的項內，現在再將此外的若干有名鄉學，列舉於下：

校名 藩名 所在地 創立年代

明倫堂 近衛家

攝津川邊郡伊丹
昆陽口村

天保九年（二四九八）

總宿老小西新右衛門，請於領主近衛忠熙而設立者。

時習館 名古屋

尾張名古屋
花之木町

天明之頃

藩士志水甲斐守忠喬所創設。

石和教諭所 甲州

甲斐八代郡
市部村石和

文政七年（二四八四）

郡宰山本大膳，請於幕府，設立該校，稱由學館，建於山城村，後移至市部村。

延方鄉校 水戶

常陸行方郡
延方村

文化五年（二四六八）

郡宰小宮山昌秀，建議設立，天保年中，加以擴充，增設數校，兼授武道。

安中鄉學校 安中

上野碓冰郡
五料村

安政二年（二五一五）

岩井友之丞所創立。

閑谷學校 岡山

備前和氣郡
木谷村

寬文六年（二三二六）

藩主池田光政所創立，其聖堂現尚保存。是鄉校中最有名的。

多久學校 佐賀

肥前小城郡
多久村

元祿十二年（二三五九）

國老多久茂文所創立，初名東原庠舍，又稱鶴山書院。其聖堂現尚保存。

在岡山藩，池田光政侯於寬文七年（二三二七）曾在領內各地設「習字所」供給若干經費，教授習字，算術二科，且依生徒志願，亦教其讀書。翌年，「習字所」達一二三所，教師一二九人，生徒二二五八人。這便可說是公立的「寺子屋」。其後於第八年間，乃全部合併於閑谷學校。

日本教育史資料卷九，載有官立以外的鄉學，其創立年代分明的，明治以後有五〇校，明治以前有七九校。

期間（紀終紀元）	年數	將軍	年號	創立校數	一年間設立學校平均數
二二六三—二三四〇年	七八	家康・秀忠 家光・家綱	慶長・元和・寬永・正保・慶安 承應・明歷・萬治・寬文・延寶	六	〇・〇七七
二三四一—二三七五年	三五	綱吉・家宣 家繼	天和・貞享・元祿・寶永・正德	三	〇・〇八六
二三七六—二四〇四年	二九	吉宗	享保・元文・寬保	二	〇・〇六八
二四〇五—二四四八年	四四	家重・家治	延享・寬延・寶曆・明和・安永 天明	六	〇・一三六
二四四九—二四八九年	四一	家齊	寬政・享和・文化・文政	二六	〇・六三四

二四九〇—二五二六年三七	家慶・家定・天保・弘化・嘉永・安政・萬延 家茂・慶喜・文久・元治・慶應	三六〇・九七三
三四		七六〇・三〇〇

鄉學的經費，有的由藩主支出，有的出於捐募，但大多數則是徵收生徒的束脩。

私塾 江戶時代，學者輩出，各自設塾講學，以推弘教化，所以大小私塾，滿布各地。日本教育史資料所載的私塾數，全國達一千五百。實際上當較此數為多。茲將其重要的，略舉如下：

校名	所在地	創立者	備註
講習堂	京都東堀川丸太町下	松永尺五	寬永年間，所司代板倉重宗，給地以創立者。明治初年廢止。
藤樹書院	近江高島郡小川村	中江藤樹	慶安元年創建。一稱德本堂，係光格天皇勅賜之名。今尚存。
古義堂	京都東堀川下立買上	伊藤仁齋	寬文二年創設，明治初年廢止。
懷德堂	大阪東區今橋四丁目	三宅石庵	享保十一年創設。由將軍吉宗給地助其成立。明治初

年廢止，近年再興。

梅園

豐後東國東郡富清村

三浦梅園

寶歷年間設立，寬政元年廢止。

廉塾

備後深安郡川北村

菅茶山

元明元年創設，文政八年廢止。初名黃葉夕陽舍，後改鄉學，名廉塾。

咸宜園

豐後日田郡堀田村

廣瀨淡窓

文化二年創設，明治四年廢止。

洗心洞

大阪北區與力町

大鹽中齋

中齋的家塾，天保八年起亂，死之。

松下松塾

長門萩城下松本村

玉木文之進

天保十二年創立，後由吉田松陰繼承，安政五年廢止。

上表中的懷德堂，亦稱懷德書院，是中井菴庵於享保十一年，獲得幕府的許可，於是在大阪船場尼崎町（現在的東區今橋四丁目）設立起來，聘三宅石庵爲教授。其後菴庵亦任教授，再後，五井蘭洲、石庵之子春樓、菴庵之子竹山（二三九〇——二四六四年）相繼任教職。寬政四年遭回祿，得幕府的資助而重建。竹山時代，是書院最盛之時，執關西教學的牛耳。懷德堂的一派，代代考究朱子學，斥異學，但並不是純朱子學，而雜有陽明學在內。竹山也不外此，他還極力攻擊山崎學和徂

徠學。關於他的對於教育行政的意見，見於建學私議和草茅危言中。他的子孫相繼不絕，以迄明治之世。

三浦梅園（二三八三——二四四九年）的私塾，始於寶歷年間。他名晉，其塾稱梅園。他在豐後的山中，沉思默慮，組織成一種哲學。人格極高，深深地感化了鄉黨。藩侯厚遇之，但一生未仕。一般地說起來，當時的私塾，以沒有規律的爲多，但他的私塾，却極爲整飭。他訓導學生，絕不用夏楚威嚴，而重在促其反省。

廣瀨淡窗（二四四二——二五一六年）名建，字子基，通稱求馬。其塾咸宜園的門人，先後達三千人，其中如高野長英、大村益次郎等人材輩出，因此極受幕府的器重。他不拘泥於任何學派，採取折衷主義。他的教導弟子，不事勉強，而惟注力於發展弟子的所長。但咸宜園的學風，極爲嚴肅，該塾的趨於盛大，決非偶然。咸宜園和梅園，同爲幕末九州的兩大私塾。

第十六節

社會教育

宗教的感化。從室町時代起，佛教漸漸形式化了。僧侶流於安逸，重視俗權的掌握甚於純真的信仰。所以在江戶時代，佛教的力量漸形微弱。其衰落的第一步，是元龜二年（二二三一）織田信長的燒毀叡山，其後北陸的平泉寺、出羽的羽黑山、近畿的東大寺、興福寺、本願寺、高野山、根來寺，九州的彥山等，或衰，或滅。而佛教的衰落，直接由武將所致，至其根本的原因，即在於僧侶的墮落。德川氏爲禁絕外教起見，以佛教爲國教，所以佛教在表面上極爲隆盛，但因江戶時代，臻於太平者達三百年，當時武士對於民政上的修養，及道德上的成爲其他三民的模範，極有必要，武士欲實現此種目標，佛教既無能爲力，因此捨却以治國平天下爲理想的儒學莫由。室町時代興起的朱子學，漸次傳播國內，而朱子學却是攻擊佛教爲異端的。學習朱子學的青年僧侶，對於朱子學及佛教，何去何從，不免徘徊歧途，像藤原惺窩、林羅山、山崎闇齋等，則不信佛而歸儒。其他多數儒者，均極力攻擊佛教。在室町時代以前極受信奉的極樂、地獄之說，到了江戶時代，已不爲識者所信。特別是熊澤蕃山，且猛烈駁擊輪迴因果之說。

至於神道，從室町時代起，已稍稍顯示出了和佛教分離的傾向，至江戶時代的初期，神道和儒

教相結合，再到了江戶時代的後期，一般國學者就努力探求不受儒佛影響的古代的純神道。總之，佛教是受到了神儒兩面的攻擊。

但是，在儒者之中，也有承認佛教是有着社會教育的力量，像中江藤樹以輪迴思想爲中心而著教訓書鑑草，猪飼敬所說「如果沒有佛法，世間便不可治」（書柬集第五）而且國民大多數相信佛教，希望往生淨土。特別是當江戶時代開始時，承戰亂之餘，目覩世變無常，因而虔誠地進佛門的人，不在少數，鈴木正三便是其中之一，著有因果物語，二人比丘尼等佛教文學書籍，平爲春原是德川賴宣的重臣，後來也出了家。

到了江戶中期以後，僧侶在質的方面顯著惡劣起來。先是有爲的人物，有身分的人，因真摯的信仰而出家的很多，到了江戶中期，就很少了。雖也有自幼因親長的意志而入佛門的，但以身分低微，家世貧窮，身體衰弱的爲多。在此種情形之下，年青者的念佛和禮拜，就往往成爲被人嘲笑的材料。以佛教爲題材的文學，也漸漸減少起來。

心學 心學爲江戶末期通俗社會教育的一大勢力。將軍吉宗之時，享保十四年（二三八九，

（石田梅巖開始在京都車屋町御池上東側開設講筵，其後逐漸普及於全國。梅巖（二三四五—二四〇四年）名興長，通稱勘平，丹波南桑田郡東縣村人。自幼受父親良好的薰陶，二十三歲入京，爲商家的徒弟，平日努力修養，不稍怠忽，其後從僧了雲學習，通性理之道，而於享保十四年，四十五歲時起，開始講釋，極力化導當時沉淪於社會下層不能辨別道義的商人階級。其門人中有手島堵庵和慈音尼兼葭。堵庵善承師教，爲心學建築了堅實的基礎，其子有和庵、上河淇水，門弟子中有中澤道二、脅坂義堂、布施松翁、薩埵德軒、德軒之門有柴田鳩翁，淇水之門有奧田賴杖。

最初，慈音尼赴江戶，布教於關東，繼而中澤道二亦赴江戶，推廣心學。當時恰巧是松平定保以勤儉尚武致力於風俗的矯正之時，所以心學就立刻在江戶廣佈起來。道二和京都的上河淇水，同爲心學界的重鎮。道二、淇水，卽值寬政、享和文化之頃，是心學的最盛時期，當時的「舍」（講釋心學的場所），全國在二百以上。

心學之名，一方面是指陽明學，一方面是指程朱學。因此，石田梅巖所倡導的心學，特別稱爲石門心學，以和其他相區別。也有人認爲石門心學是繼承陽明學的系統的，此種看法，並不正確，實際

上石門心學是完全繼承朱子學的系統的。這祇要一讀心學者的著作，便可明白。梅巖的主要著作都鄙問答，其中徵引程朱之語頗多，但陸王之語全然未經提及。陽明學是使用古本大學的，但都鄙問答中所引用的大學，明明是程朱派的改定本。

其他社會教育家 二宮尊德（二四四七——二五一六年）給與了一部分人以深切的影響，自幕末以迄今日。他生於相模足柄郡柏山村，通稱金次郎。五歲之時，酒白川氾濫，家產盡失，其父努力於恢復，未告成功，而於尊德十四歲時逝世。其後再遭氾濫，尊德努力經營，復興家產，並幫助各家恢復舊觀，不遺餘力，有席不暇暖之概。他還努力研究學術，折衷神、儒、佛，綜合道德和經濟，而自成一種教說。著書二千餘卷，他的事蹟和學說，從他的門人所著的報德記和報德外記等書中，可以窺知一斑。

他注力於自己的及他家的家產的復興，創導道德的和經濟的學說，躬行示範，以感化社會。其人格的偉大，可以垂諸永久。其教因是以「以德報德」為根本要義，故稱報德教。他認為人是受天地人三才之德而生活，所以應報天地的大德。報德的方法，以至誠、勤勞、分度、推讓四者為主。而最

重要的便是分度和推讓。所謂分度，是節制的意思。循天命所定之分，守其限度，叫做勤；節約而生有餘，叫做儉。亦勤亦儉，以有餘推及他人，叫做推讓。以我之有餘讓與他人，則一家安樂，一國和平。一切道德，均由此開始。父讓子爲慈，子讓父爲孝。一家而能讓，則一家和睦；一國而能讓，則一國和平。

晚年之際，在塾的弟子，常在一百人以上。他的德化，實廣被於遠江、伊豆、駿河、相模、甲斐、武藏、上野、下野、常陸、下總及陸奥。他的遺澤，至今不絕，因欲實行他的學說而設立的報德社，即在今日，尙達六百社之多。

和尊德同時，有大原幽學（二四五七——二五一八年）倡導「性理學」以改良農村。他的籍貫不明，但似是尾張藩士。天保二年，赴房總，講性理學，開導村民。爲欲挽救香取郡長部村的衰弊，於是斷然實行耕地整理，發起產業組合。嘉永五年，因受傳播天主教之嫌，被拘江戶。七年，其間他的門人有因支出他的費用而毀家的，也有陷於不孝不義的。幽學爲對他們表示憂憫和勸告起見，於赦免之年自殺。他的事業，和尊德極相似。他的教義，對神、儒、佛兼收並蓄，也和尊德相同，但含有武士道的要素極多，這一點是和尊德不同的。

幽學認爲，教育所以使人有優美的道德，至其方法，須適應身分和器量，而並非一成不變，由此看來，他是主張個性主義的教育的。平日重視胎教，而且認爲教育應與年齡相應合。他和心學者一樣，充分利用講釋的方法，但爲適應聽衆起見，分別設立男子會、婦人會和小兒會。他時常舉行修學旅行，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事。禁止門人飲酒，自己終生不娶。

民衆教育家的代表，尙有下述二氏：

常盤潭北（二三三七——二四四〇年）上野烏山人，名貞尙，性極質直。喜愛和歌，並常出外旅行。因鑑於社會教育的必要，所以時常集合鄉村的老幼男女，向其講學。他的思想，見於他所著的民家分量記中。所謂分，是長幼尊卑之別，所謂量，是貧富之差。人應熟知並安守自身的身分和貧富，適應分和量，以從事相依相助。他的學說，以宋學爲基礎，並參酌以佛道和神道，對於教育，他主張嚴肅主義，每論述人的不良，輒謂是因幼時教育不良之故。他的感化，廣及上野、武藏、下總及常陸。

西川如見（二三〇八——二三八四年）名忠英，字如見，號求林齋。享保年中，任長崎的譯官。性喜天文，對於民間教育，亦極努力，著有百姓囊、町人囊等書，以貢獻於平民教育。他和上述四人

同，是一個著述上的社會教育家。這一點，和貝原益軒相似。他的學說，和潭北同樣近於石門心學者。總之是主張安分守己和知足的。

第十七節 女子教育

江戶時代，繼承室町時代而壓抑婦人。因此對於這一時代的一切社會事象給與理論基礎的儒學，說明女子的地位較男子為低，女子應當絕對服從男子。成為儒者的絕對信條的論語，關於婦人的地位，就有着如下的一節：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陽貨篇。）

女子成長之後，嫁與他家，所以應特別教導女子從順。在大家都認為女子應當從順的時代，女兒出嫁之後，如果任性行事，必將被棄於翁姑及丈夫，致受大歸之恥，而無法收拾。凡為父母者都是這樣憂慮着。當慶長之頃，有名助四郎者，夫婦時常爭吵，夫叫妻離去，妻堅不肯去。有人看到他們爭吵，就說：「女子犯了七出」（註一）就應當離去夫家，不去是不行的。「助四郎之妻沒法，就訴諸」

代官所，」說：「我隨夫迄今已二十年，有一個十二歲的男孩，一個七歲的女孩，今年又復懷妊，所以已經是三人的母親了。但我夫叫我離去，請傳他來，予以訓斥。」代官聽了，就告諭她說：「夫婦爭吵，在所不免。女子應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所以女子無論如何是應當服從男子的。」助四郎之妻感到毫無幫助，就哭泣着回去了。（註二）婦人應當片面的服從，這是當時的婦人觀。

女子和男子不同，是有着家事、裁縫、洗濯等雜務的，所以男女能力縱屬相同，但女子却不能獲得和男子同等的學問，這是顯然的事。何況當時的女子教育的目的，在於訓練女子性情柔和，不違逆男子的心，學問少些無妨，祇要對於家務和裁縫等事熟習就夠了。

至於中流以上社會的女子，則須相當能夠習字讀書，學習茶道、插花、三味線、彈琴等。從十歲前後至出閣前的少女，有「寺子屋」的學習及裁縫的學習等，終日忙碌，殆無暇晷。

註一：所謂七出，是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妬忌、惡疾。見大戴禮本命篇。

註二：見長慶見聞錄卷之七。

第十八節 江戶時代的教育思想總說

德川時代的教育學說，在當時有組織地敘述出來的，極爲罕觀。但優秀的教育竟見，時有產生，卽在今日，仍多足供參考的。

江戶時代的教育論，概括地說起來，一切都是道德主義，細究起來，武士的教育，其目的內以修身齊家，外以治國平天下；一是道德而二是政治。因此，當時的學生，如果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那末實際上縱不參與政務，但總存經世濟民或是治國安民之念。政治的根本，首須砥勵道德，這是不待言的。至於平民的教育，大抵是以使受教者柔順地服從上層的政治和安分知足爲目的。

人爲什麼非修德不可呢？對於這一問題，當時最占勢力的宋學的解答是這樣的：萬物均受天理而生。其中人是受天地之精而生的，所以成爲萬物之靈。因此，人就非順從天理，以天地之心爲心，去實現天理不可。所謂天地之心是什麼？天以仁爲心，生育萬物，絲毫不怠。天地又常以信爲心。春來則開花萌芽，至夏而成長，至秋而結實；季節之序，絲毫不紊。人也應如此，體會天理，篤行仁而堅守信。

儒者從天道來說明人應遵守道德。他們是採取一種客觀的自然主義的（室鳩巢駿臺雜話卷二、貝原益軒五常訓卷一等）。

稟受天理以生而先天的具有絕對的善性，所以萬人皆同等。對此可尊的天性，是不能予以捨棄的。所應捨棄者為掩蔽此性的人欲，以充實本然之性。儒者根據此種觀點，所以力主人都有受教育的必要。這是日本教育史上最初的教育機會均等論。但是，儒者忘却了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差，是因周制而來的相對的差別，而信以為絕對的差別，於是在教育上也主張建立起差別來，這分明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見解。因為如此，所以當時唯有准許庶人入學私塾，而幕府的學校及藩學，通常便不准許庶人入學了。

同屬儒者，而徂徠一派，不以「道」為天地自然之道，而以之為聖王因治理世間起見而創造起來的，其內容是多元的：在這種見解之下，道德就無法應為至上，而有害於世道人心者不少。但素行和仁齋，指摘出宋明之學的缺點，這是一種功績。不以「道」為理想主義的，而是唯物主義的，這種想法，立刻給與國學者以影響。國學者認為「道」是出自皇祖的靈，靈則賦人，以人所應有的性

能：這種學說，足以招致否定教育修養的結果。

以上諸說，都不承認「道」的「當爲性」，所以不認性是天賦的。仁齋稱教育的可能性爲性，徂徠稱各人各樣的先天的個性爲性，素行稱「理」和「氣」的妙合爲性，他們在不承認絕對的善的天理的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依據宋明之說，修養之後可以達到的結果，是自始就明瞭的，所以在修養上實具有確信，至於上述諸說，則不能獲得此種確信，這是古學派的最大的缺點。

所謂「學」，當然應以知育爲先，但知育實僅是「學」的一面。學問還應包括「實行」在內。
論語學而篇：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學派提倡窮理格物，主張對於事事物物，應當窮理盡知，而窮理就是誠意、正身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出發點，所以窮理的終極目的，還是爲了德行。

論語述而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可以說是知育，行可以說是德育，而忠信是學習者的心地。四者多尚實踐，所以孔子是實行主義者。實行主義的教育，決不採取注入式，而是採取啓發式，惟有啓發式的教育，才可以適應個性。孔子的教育方法，就是如此。再者，既是崇尚實行，學生的強固的決心，便屬必要，儒者常以立志爲言，大概就是起因於此。假使將立志一事，解釋爲確定一生的方針，那末必須在充分研究之後，始克臻此，孔子尙且是十五歲始有志於學。在受初等教育時，是談不到立志的。但是，對於每個小問題，都使生徒立志自行研究，此層如果教師運用巧妙的指導，就是小學校的兒童，亦無不能之理。喚起學習的動機，就是促成立志的指導手段。

孔子對於不能深究學問的弟子，勸其力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但對於專心修學者，還是指導其先求博學，最後從事實踐，中庸中說：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程子說：「此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其他多數儒者，也以此「五段」爲知德修養的順序。先博求知識，凡有疑問，必須詳細向人詢問。當然，這裏所說的「博」，僅指自己所專心研究的學業，而並

不是使頭腦成爲百科全書之謂。因此，樊遲問稼圃之事於孔子，孔子說：「吾不如老圃」（論語子路篇）。如果不博學審問，那末在任何事情發生之時，就不知正確的抉擇。但僅僅能博學審問，也不過徒然集聚一些死知，尙不足以分別是非。因此，還有周詳思考明辨正邪是非的必要。學問、思辨四者之中，學問二者，賴乎師導，思辨二者，賴乎自修。學問、思辨四者充分做到之後，才可以不再迷於是非的判別，也才可以篤行了。德川時代的多數學者，都是這樣地相信着。

此種階段說，以統一教授及訓育爲其特色。西洋的階段說，僅能注意到知識獲得的順序，而忽略了訓育，但上述階段說，則無此缺點。

關於學問的指導，江戶時代的教育家，以讀書、作文、習字、武藝爲主。學問自六七歲起。最初須習字，並熟記「假名」，日常普通的文字以及書簡用語。庶民的要求，大抵僅是如此，所以「寺子屋」也未超出此種程度。讀書從儒書的「素讀」開始，年齡大抵從十歲左右起。「素讀」亦稱「句讀」，其法是不解釋意義，而僅是機械的誦讀。這種方法，是古代「大學寮」的教授法的延續。「素讀」大體上自孝經、大學、中庸開始，繼爲論語、孟子、小學，再進至五經。「素讀」完畢後，再聽「講釋」。

「講釋」以小學和四書爲主。益軒認爲祇須將小學熟習之後，其他書籍，便自然地可以了解（文訓下之未）意思就是說初學者不可貪多務得。闇齋派也極力提倡要約的工夫。佐藤一齋在初學課業次第中，也主張「講讀」應以四書爲限。他們重視要約之功，是完全一致的。「講釋」之後，再從事「會讀」「輪講」。關於「會讀」「輪講」初學課業次第中，列舉出下列各書：

小學 十八史略 孔子家語 大戴禮 劉向說苑 劉向新序 蒙求 春秋左氏傳

國語 史記

上述各書讀過之後，其他各書，就可以自由閱讀，所以一齋還將經史子集各方面的書詳舉出來。以上所述讀書的順序，都是從習字開始，進而至於讀書，但鈴木郎的主張則和此相反，是先讀書而後習字，已如前述。

「寺子屋」的習字，其所以用「往來本」爲法帖者，是因便於練習信札之故。但信札均偏於實用，所以受稍高教育的人，也練習普通的作文。普通是在講釋過四書而進於「會讀」時練習作文，這是因爲此時已熟習文字及成語了。一般學者也練習作詩，但山崎闇齋不喜詩文，所以他的門

弟子中，能文工詩的不多，理由是恐怕玩物喪志。

武士都講習武藝。再者，文武都有本末之分，不可重末而忘本，不得已時，捨末可也，但忘本則不可（中江藤樹翁問答上卷末、室鳩巢駿臺雜話卷二、鈴木郎離屋學訓第七章等）。

學問修養的根本目的，在於德行，欲達到此目的，先須學問、思辨，最後達於篤行，換一句話說，其順序是先「末」而後「本」。至於武道的學習，也有不少的人主張先「末」而後「本」，由武藝養成義勇的精神。現在再將當時使生徒充分獲致德行的方法，臚列如下：

第一個訓練的方法，是教師的感化。苟有志向學者，必須追隨良師。良師能躬自督率弟子，使弟子於不知不覺中感化起來。如果不追隨有德行的真正的儒者，那末雖然每日學習，也不能得到優良的感化。江戶時代的鴻儒碩學，都極端審慎言行，躬自爲弟子的模範（貝原益軒和俗童子訓卷一、太田錦成梧窗漫筆後編上、室鳩巢駿臺雜話卷一等）。

第二個訓練的方法，是師道的嚴格，及師弟間的極形親密。在今日，當入學之前，將受那一位先生的教是不得而知的，當在學期間，先生又或許會在什麼時候更調，但在以前是並不如此的，大體

上在入學以前，就仰慕師的聲望，因而入學，並且永承師教，說是在畢業後，還是受師的照拂，而永不失師弟之禮，所以師弟間的情誼，極爲親密。師長的一言一行，都爲生徒所嚴格遵守。此外，像山崎闇齋和山鹿素行，還特別提倡師道的嚴格，俾能澈底訓誡，加深感化的力量。廣瀨淡窗的塾則，對於這一點，也特別標舉出來。

第三，是使生徒自動勤勉精進。除實習洒掃應對及進退之禮節外，凡寄宿舍及學舍內的一切事務，均由生徒自治。當時學校的規則，和今日不同，例如三浦梅園的塾則中，稱生徒爲諸賢，足徵教師對於生徒的人格，極爲尊重，因此生徒都能自動努力精進。

第四，是生徒相互間的規勸。此種方法，對於德行的進步，極有裨益。

第五，是信念的堅固。當時的學生，不論任何學派，都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共通的信條，因爲目的專一，所以意旨強固，信念甚堅。

上述五點，便是當時教育成功的原因。

第八章 明治大正時代的教育

第一節 時代的概說

慶應三年（二五二七）十月，德川慶喜奉還政權，江戶幕府崩潰。同年十二月，發布王政復古的大號令，上承神武天皇的創業，以復古的精神為政治的方針，創建維新的大業。翌年即明治元年三月，天皇頒發誓文五條，立定確切不拔的國是，新政的基礎愈見堅固。其後朝野共同孜孜努力於國運的發展及文化的進步，日本在過去長時期內蓄積起來的潛在力量，於此充分發揮，到了六十年後的今日，列於世界第一等強國之林，其間於世界大戰後，担任支持世界和平的國際聯盟的主要聯盟國，而成爲肩負完成重要任務的偉大責任的強國。

在此時間，國家的政治、經濟、學問、藝術等，均有飛躍的進步，其中教育的進步，亦極爲迅速。當江戶時代，各種學校，雖云普及，但幕府及各藩所設立的學校，均以教育士人以上爲主，至於教育平民

的私塾及「寺子屋」幕府及各藩對之均採取放任態度，所以在私塾及「寺子屋」普及的地方，大部分的兒童固然受到教育，但在不普及的地方大半的兒童便不克接受教育了。而且，江戶時代是壓抑女子的時代，所以女子的就學者，還不及男子就學者的半數。但自維新以後，教育次第普及，無論任何荒村僻地，都已遍佈讀書之聲，無論任何下層之民，都能以文字表達意志。小學校中學齡兒童的就學比率，已經近於百分之百，當每年徵兵檢查對壯丁實施學力調查的結果，完全不知讀法及算術者，百人中不及一人。而且此等無教育者的大部分，或是有着身心上的缺陷，或是成長於極度隔離的小島之上，因而不容易接受教育。

成就此一偉大發展的理由之一，是模倣並擴充歐美的教育，而將以前的教育予以改良。自新井白石著采覽異言及西洋紀聞之後，對西洋情況的研究，即告開始。接着，因將軍吉宗許可閱讀無關宗教的洋書，更展開了以閱讀荷蘭書籍以研究西洋情況及學術的風氣。先有杉田玄白、前野良澤等的譯出解體新書，後有大槻玄澤的著成蘭學楷梯。自是以後，研究荷蘭學的人，逐漸增多。其始以研究醫學爲主，不久即廣及物理學、化學、西洋的地理歷史，又對西洋的兵法、砲術、航海術，亦經研

究，世界的大勢，已次第爲識者之所熟知。

使幕府滅亡的思想上的力量，以尊王攘夷論爲主，但自熟知世界大勢之後，攘夷的不可行，即在攘夷論者，亦甚明瞭。因爲容納攘夷論者之說，對安政五年幕府和北美合衆國及其他各國締結條約的批准，稍覺遲延，列國就使日本的關稅率改成不利於日本的狀態，以爲承認條約調印的遲延的代價。日本自幕末以後約三十年間，頗爲此項關稅的更改所苦。此外，於文久三年，薩摩藩在鹿兒島和英吉利作戰受損，翌年卽元治元年，長州藩在下關和英吉利等三國作戰不利，更因對歐美諸國的情形及學術的研究和理解，於是日本的短處和缺點，就分明地暴露出來。在此種情形之下，採取外國的長處以補足本國的短處的思想，就爲任何日本人所共有。而且，以前所以提倡攘夷的目的，僅在陷幕府於窮地，所以幕府一朝崩潰，攘夷論者就完全一變而爲和親論者。這原因，就在於想以外國之長，補日本之短。結果，當明治初年時候，認以前所有的舊文化，完全係屬無益無效，破壞舊物的風氣，瀰漫高漲，凡是西洋的文物，一概稱之爲文明開化，而努力加以輸入。這種情形，在今日回想起來，固然也有過份之處，但因此種關係到了六十年後的今日，日本的物質文明，已經進於較

西洋毫無遜色的程度了。所以明治大正的日本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及教育制度差不多也完全由西洋輸入。對於西洋過去數百年進步發展起來的，繼續不斷地予以輸入、模倣而消化之，這便是明治時代的教育史。不能明瞭歐美的教育史，對於明治時代的教育史，便也無從理解。

但是，如果認為明治大正時代的教育的顯著發展，僅是由於歐美教育的力量所促成，這是絕對錯誤的。這是因為唯有日本三千年來的文化的長足進步，才構成了輸入、模倣和消化的基礎。這基礎，就是在悠久的國史間所蓄積起來的精神文化，特別是當江戶時代的鎖國期間，在絕對未受外國影響所蓄積起來的精神。迨至和外國交接且吸收其文化的時候，唯有恃着此種潛在的力量，才可以充分消化西洋的教育，而使之成爲己有。如果沒有此一基礎，那末無論怎樣大量輸入，總無法予以消化，而以顯現今日的盛況。

第二節 明治初年的教育

明治天皇之五誓文 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明治天皇駕詣紫宸殿，將誓文五條，誓於天神地

祇，其中第四條及第五條如下：

破舊來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

求知識於世界，以振起皇基。

在誓文中規定了明治維新以後的政治的方針，同時也決定了教育的方針。根據開國進取主義，採外國之長以補本國之短，同時不拘泥於泰西文明，而一本天地間的公道，實施公明的政教，以促進全體國民的智識之聖意，由此便可見到。

皇道主義的教育與大學設立 維新成功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尊王論和攘夷論，但攘夷論在維新以後，是完全消失了。成爲尊王論的背景的國學者和神道家，勢力雄偉，擬大興國道及神道，以發揮國體。乃於明治元年三月，在京都復興學習院，在其寮中，不祀孔子而建皇祖天神社，任學習院之長官的「大學別當」爲其神官。翌月，將學習院作爲古代大寶令所規定的大學寮的替代，至九月，廢止大學寮的替代，而新設皇學所及漢學所。在其佈告中，規定辨國體，正名分，而以漢土、西洋之學爲皇道之羽翼。皇學所中，祀皇祖天神大宮。又於五月，改長崎的濟美館爲廣運館，以國學爲本，兼

授外國語，六月，復興江戶的昌平黌、醫學所、開成所。翌年即明治二年六月，改昌平黌爲大學校，而以開成學校、兵學校、醫學校屬之，並以大學校統轄府縣的教育行政。九月，廢皇學所及漢學所，十二月，改大學校爲大學，改開成所爲大學南校，改醫學所爲大學東校。東校、南校，是大學的豫備校。大學的目的，也以辨國體爲主。明治三年七月，令諸藩選拔生徒，送至南校。明治時代的社會的指導者，多數出自南校。明治四年七年，廢藩置縣，廢大學，設文部省，任大木喬任爲第一任文部卿，使掌管全國的教育事務。

中小學校的開始 先是當文久三年（二五二三）江戶幕府改革幕政時，擬在江戶市中設置小學校，但因幕末多事，無暇建設，而幕府旋即滅亡。到了明治元年，因鳥羽、伏見之戰之罪，朝廷使德川慶喜蟄居，而命家達承繼其家，受封於靜岡。德川氏於同年十二月，在沼津設兵學校，並附帶設立小學校，這是明治年代小學校設置之始。舊幕府直轄之地，到了明治年代，就改爲府縣，而成爲政府的直轄地，所以該地的教育情形，也比較諸藩更適合於實施新制度。明治二年二月，政府發布府縣施政順序，其中有設置小學校的規定，是年五月，京都府率先根據是令，設立小學校，在是年歲暮

以前，共設有六十四校。明治三年二月，大學發布中小學規則，規定小學自八歲入學，中學自十五歲入學。中學之名自此始。同年六月，於東京府設小學校六所，九月於同府設中學，閏十月於京都府設中學。又於明治二年九月，政府在大阪府設洋學校。對於此等設施，諸藩也起而倣行，或新設藩學及鄉學，或將原有者之內容加以整理充實。明治四年七月，廢藩置縣，於是由文部省總管全國的府縣立學校。當時需要人材孔急，所以外務省於明治四年二月設語學所，工部省於同年八月設工學寮，司法省於明治五年七月設明法寮，北海道開拓使於同年四月設農學的臨時學校。此數校的地點，均在東京。要之，當時學制尙未統一，內容較諸江戶時代的學校，幾無多大進步。

私學的發達 維新之後，政府對於教育，極爲努力，而民間有志之士所設立的私學，對於教育，也在極大的貢獻。安政五年，福澤諭吉（二四九四——二五六一年）所設的慶應義塾，雖經維新的變動，未嘗稍衰，其後益見發達，培養出了許多人材。近藤真琴（二四九一——二五四六年）於文久三年建攻玉社，教授蘭學、數學、航海術，於明治元年關閉，明治二年復興，教授數學、英語和漢學、航海術等。此外，福田理軒於天保五年，在大阪設順天堂，教授算數，至明治四年，移至東京。在法語

方面：村上英俊於明治元年建達理堂；在英語方面，尺振八於明治三年建共立學舍，算作冬坪建三又學舍，明治五年中村正直建同人社，各各從事於教育。漢學方面：鳥田重禮的雙桂塾，川田甕江的逢源學校，林鶴梁的端塾，都極有名。

第三節 學制頒布以後的教育

學制的頒布 明治五年八月，頒布學制，勵行全國統一的教育制度，其旨趣在前一月太政官發布的仰被出書中，明瞭地表示出來：

人欲立其身，治其產，昌其業，以遂其生，其法無他，唯有脩身開智，長其才藝而已。而欲脩身開智，長藝才，捨求學其莫由，是故有學校之設立，以教授日常言語書算，以迄士官農商百工技藝，及政治經濟天文醫療等。人能適應其才，勤勉向學，庶可治生興產昌業也。夫學問者，立身之本，世人豈可不學哉。彼迷於出路，陷於飢寒，破家亡身之徒，蓋不學使然也。考學校之設立，雖歷年已久，但或因不得其道，致人誤其方向；或因以學問限於士人以上，對農

工商及婦女，則置諸度外，於是不知學問爲何物；又因士人以上之少數爲學者，動輒高唱學問之責在國家，而實則不知立身之基，或趨於詞章記誦之末，或陷於空理虛談之途，其論調雖似高尚，但頗多不能身體力行者。凡此種種，皆係因襲之積弊，而文明有欠普遍，才藝不增而貧乏破產喪家者衆多之所由來也。是故人皆不可不學，而爲學又不可誤其旨趣。茲者文部省有鑑及此，乃訂定學制，改正教則，佈告週知。自今以後，一般人民

華士族農工商及婦女

務期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爲人之父兄者，宜善體此意，厚其愛育，必須使其子弟向學而後可。

高深之學問，一任其人之材能，至於幼童，不分男女之別，均須令其入小學，非然者，卽爲父兄之失責。

再者，以前因襲之積弊，卽是以學問限於士人以上，並高唱學問之責任在國家，於是凡學費以及衣食等費，多仰給於官廳，倘非如此，卽不思向學，而自暴自棄，此實大惑不解者也。自今以後，應革除此等積弊，一般人民，必須自動奮發，悉力向學。上述各節，地方官應向其治下，作週詳之曉諭，並依據文部省所訂規則，致力於學問之普及。

明治五年壬申七月

太政官

學制頒布時的教育思想，看了上引被出書，就可以知道當時的政府，是怎樣的熱心學問，並努力以提高國民的教養。但是，這種思想，却不是明治維新當時勢力雄偉的皇道主義，而是採取了美國式的實利主義和功利主義。原來當時是開國進取的思想極盛的時期，因為北美合衆國是催促日本開國的國家，在地理上又是和日本接近的國家，日本人之遊海外者，以就學於美國者爲多，所以，美國式的思想，就隆盛起來了。而且，江戶時代的「學問所」最缺少的，是自然科學，在教育上實有補救此種缺點的必要，因此，實科主義就自然而然地興盛起來了。並且當時指導教育界的，又是極力提倡功利主義的第一人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 天保五年生於豐前的中津藩士之家。當美國彼理來航浦賀之時，受兄之勸告，刻苦研究蘭學，後赴大阪，入緒方洪庵之門，繼續研究。安政五年，赴江戶設塾，悉蘭學已不適用於時勢，乃改學英語。當時英語之學尙未開，因是學習極感困難，其後隨幕府的使節，遊歷歐美達三次之多，見聞爲之大擴。慶應四年（即明治元年）移其塾於江戶之芝，稱慶應義塾，從事於教育之餘，並致

力於著譯及新聞事業，終生以筆墨致力於新日本的建設，毫不間斷。明治元年當江戶上野之戰之際，諭吉毫不以為意，仍孜孜為其生徒講解蔚蘭（Weyland）的經濟學，由是可見其信念之深。當明治初期，需用洋學者孔殷，其供應大半出自諭吉之塾。

他是富於常識且極穩健切實之人。他的主義，在於排斥漢學的迂遠的舊思想，而推弘英美的功利主義的思想。他還提倡打破階級制度，鼓吹獨立自尊，提高女子地位，重視商工業。因此他的教育也重視實學而以養成實用的人物為主眼。他的著作，為西洋事情、世界國情、學問之進步等，都極有名，其中學問之進步一書，銷售達七十萬冊以上，足徵深受讀者所歡迎。該書第二編的緒言中說：自來世人均僅以閱讀文字為學問，此實大誤。夫文字僅係為學之工具，猶建屋時之應用槌鋸。槌鋸雖為工匠所不可或缺之工具，但僅知槌鋸之名而不知建屋，不得謂為工匠。學問亦然，僅讀文字而不辨事物之理，不得謂為學者。此即所謂讀論語而不解論語是也。雖能背誦日本之古事記，而不知米之行市，是所謂為暗於家政之學，雖能明悉經書史類之奧義，而不知商賣如何物者，是所謂為拙於經濟之學。

這一段話，是最可以表出諭吉的主義的。

摩萊 明治六年，駐在華盛頓的辦理公使森有禮，向北美合衆國的名士，徵詢關於日本教育的意見。當時，摩萊(D. Murray)教授有詳盡的意見回答。大概就因這個緣故，他就爲日本所聘，而服務於文部省。他在明治六年十二月，曾向文部少輔田中不二麻呂建議，暢論教育應較軍事及實業等尤加重視，但此項教育，應爲適於國民性的教育，適於國民要求的教育，而且，男女應有同樣受教育的機會。他於明治十一年十二月任滿歸國，留日五年，對日本的教育事業，有着非常的努力。

再者，明治四年十一月，田中不二麻呂被派赴歐美視察教育，對於美國的教育制度，調查特詳，明治六年三月歸國，同年四月，因大木喬任轉任參議，乃擔任文部少輔，攝行文部省務，明治七年九月，昇任文部大輔，於是美國式的教育，更見盛行。

學制的內容及其變遷 根據前記的被仰出書而作成的學制，連關於一切學校的規則都包括在內，所以極爲完整，而且是採取中央集權。該學制規定全國的教育事業由文部省統一，分國內爲八大學區（明治六年四月改爲七大學區），每區置一大學；分一大學區爲三十二中學區，每區

設一中學校；再分每一中學區爲二百十個小學區，每區建一小學校。依此分法，全國計有中學校二百五十六，小學校五萬三千七百六十。當時各項制度，多係模倣美國，但此項學校分區制度，却完全採用法國的學制。爲斷然實行此項學制起見，命令以前的藩學及鄉學，完全廢止。自是以後，文部省就統轄了全國的教育。

其中最注力從事的是小學。關於小學，在相當於今日幼稚園的幼稚小學之外，分爲尋常小學、女兒小學、村落小學、貧人小學、小學私塾、廢人學校等六種，各依地方需要而設置。女兒小學是女兒的尋常小學，村落小學是簡易的尋常小學，小學私塾是教師之獲有准許證者在其私宅設置的小學。自滿六歲起入學，其所尋常小學分上下二等，在學年限各爲四年，以學年爲半年，分四年爲八級，以最下學年爲第八級，最上學年爲第一級。以言教科，初等小學是：一綴字、二習字、三單語、四會話、五讀本、六修身、七國體、八書牘、九文法、十算術、十一養生法、十二地學大意、十三窮理學大意（物理）、十四體操、十五唱歌；高等小學除上述教科外，加授：一史學大意、二幾何學大意、三掛畫大意、四博物學大意、五化學大意、六生物學大意；且斟酌地方情形，加授外國語一或二，以及簿記、圖畫、政體大意。

等。在中學區中，設置十名乃至十二三名的學區取締（管理者），從事於勸導區內兒童的就學；並掌理學校的設立及其他教育事務，在大學區有督學局，在文部省亦有督學局，都擔任上級的視學事務。小學校的補助費，每年由國庫撥與府縣，金額自七十萬圓至二十萬圓。依據學制，小學的就學，在正則的尋常小學，是六歲入學，十三歲畢業，實施時如有不便，可略予以變通。似此獎勵就學，所以在明治六年，小學校公私立合計一二五五八校，生徒男女合計一一四五八〇二人，就學比率為百分之二八。明治十一年，公私立小學校合計二六五八四校，生徒二二七三二二四人，就學比率達百分之四一·三〇。政府雖獎勵男女同樣就學，但實際上女子的就學者僅及男子就學者之三分之一。當時的教科書，係屬明治時代所著成者，至江戶時代的「往來本」之類，以及美國書籍的翻譯等，依然相互混用。

因為希望小學教育的發達，師範學校非先整備不可，所以於學制頒布的前三個月即明治五年五月，在昌平齋的遺址，創辦東京師範學校，聘請明治四年赴日的美國人斯考脫（Scott）為教師。於是年九月開校，斯考脫用英語教授，坪井玄道任翻譯。其教育的內容和方法，都和美國的小學

校一樣，教科書也是採取美國的。年限初爲一年，翌年改爲二年。其後，在大阪、宮城、愛知、廣島、長崎、新潟等大學建設預定地，建置官立師範學校，又於明治七年三月，設東京女子師範學校。明治八年八月，在東京師範學校中，設中學師範學科。明治十一年，伊澤修二和高嶺秀夫自美歸國，伊澤任東京師範學校校長，高嶺補助校長襄理事務；明治十二年，小學師範科及中學師範科，均定豫科期限爲二年，本科爲一年，校務漸見整飭。其時各府縣立師範學校，也漸次整頓，所以自明治十年起，次第廢止東京以外的官立者，而以補助費撥與府縣，促其發展。

關於其他學校，中學爲小學畢業者入學之所，分爲上等及下等，修學期合計六年。二等之外，有工業學校、商業學校、農業學校、通辯學校、諸民學校（近乎今日的補習學校）等。中學自學制頒布後，大量增設，在明治十二年，公私立合計七八四校，生徒男女合計四〇〇二九人，超出學制規定的校數約三倍，但內容複雜，程度參差，亦有不符規定而僅授漢學及數學者。再者，文部省於明治五年二月，在東京建立東京女學校，這是女學校之始，程度係屬初等教育，以小學程度的內容而加授英語，實施西洋式的教育。但因成績不佳，於明治十年廢止。明治五年，在京都也設立女學校。又於明治

九年，在東京女子師範內，開始設置幼稚園。

前述的大學南校及東校，自大學廢止後，單稱南校及東校，其後廢「貢進生」曾一度關閉。自學制頒布後，南校稱第一大學區第一番中學，翌年改稱開成學校，成爲教授法學、理學、工業學、鑛山學、諸藝學等五種專門學藝的學校，其後移至一橋通，改稱東京開成學校，其舊校舍與外務省的語學所合併，成爲東京外國語學校。至於東校，自學制頒布後，成爲第一大學區東京醫學校，明治十年與開成學校合併，成爲東京大學，分法、理、醫、文四學部，始成一綜合大學。又於明治七年，在愛知、廣島、宮城、新潟，新設外國語學校；明法寮於明治八年廢止。至在長崎以前的精得館，曾經改爲長崎醫學校而遺存下來，明治七年廢止，而於明治九年復興。工部省的工學寮，自明治十年起，改爲工部大學校，明治十八年工部省廢止，工部大學校乃移置於文部省管轄之下。

私學的隆盛 當時的小學校，漸見整飭，專門學校係繼承江戶幕府的設施的，所以內容也相當完備，但中學校尙多缺乏，因此私學極爲發達。江戶時代遺下的私塾，學生均有增加。此外，佐原純一的共學舍、鳴門義門的鳴門塾、佐野鼎的共立學校、高橋秀雄的弘通學舍、江原素六的集成舍、中

江篤介的佛學塾、安井息軒的三計塾、芳野金陵的逢源堂學等，地址都在東京而極有名者。在京都，於明治八年，新島襄（二五〇二——二五五〇年）建同志社，實施基督主義的教育，其主旨在養成有信仰而具備有高尙品性的紳士。

女子教育的私塾中的重要的，在東京，有明治五年星野康齋設立的水交女塾，明治八年跡見花蹊設立的跡見女學校，明治九年櫻井氏所設立的櫻井女學校等，都同等於小學校程度。

教育學的研究 當時忙於樹立教育制度，對於教育學的研究，尙屬幼稚。所出版的教育書籍，當學制發布前後，關於學校制度者甚多。現在將其重要者列舉如下：內田正雄將西紀一八五七年的荷蘭的教育法規翻譯而成的荷蘭學制二冊（明治二年）、小幡甚三郎敘述西洋各國的教育制度並翻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制而成的西洋學校軌範二冊（明治三年）、佐澤太郎和河津祐之翻譯法國教育法規而成的法國學制十冊（明治六年）、田中不二麻呂記述歐美各國教育制度的理事功程十五冊（明治六年，其後改爲洋裝一冊）、柴田承桂翻譯普魯士小學校與師範學校的教則而成的普魯士學校規則一冊（明治八年）及明治九年田中不二麻呂赴美國搜集各

州教育法規並譯成美國學校法二冊（明治十一年）等。

其次，在教育理論方面，以關於教授的方法及學校管理的方法等爲多，惟尙未有系統的教育論的研究，且取材也僅限於美國的文獻。現在將其主要者，列舉如下：美國維加歙姆（Wickersham）的學校經濟（The School Economy），由箕作麟祥譯成學校通論（明治七年）；美國哈脫的教室內（In School Room），由文部省命荷蘭人卡斯泰爾譯成學室要論（明治九年）；美國那騰（Northend 一八一四——一八九五年）的教師的助手（The Teacher's Assistant），亦由卡斯泰爾譯成教師必讀（明治九年）；又有那騰的教師與父母（Teachers and Parents），由小泉信吉等譯成那騰小學教育論（明治十一年）；美國裴齊（Page 一八一〇——一八四八年）的教授的理論與實際（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由卡斯泰爾譯成彼裴氏教授論（明治九年）等。這些書籍，除掉裴齊的以外，都不能謂爲組織嚴整的著述。

關於日本教育史的著述，以明治九年在美國費城（Philadelphia）博覽會中用英文寫成的出品爲最早，同年即以英文本出版，翌年即明治十年，又用日本文出版，書名稱爲日本教育史略，

這是日本教育史問世之始。

第四節 教育令發布以後的教育

教育令的發布 前述學制的內容及外形，俱極完整規模亦甚偉大，但因實施時頗感困難，且干涉意味太深，反足以使人厭棄學校教育。加以當時美國式的自由主義，普遍流行，田中不二麻呂乃研究美國的教育制度，擬成改革方案。其時適逢明治十年之役，財政上受了一大打擊，遂於明治十二年九月，廢止學制，而頒布教育令，其中有小學校、中學校、大學校、師範學校、專門學校等的規定。並首先將學區廢止，小學校由一町村單獨或數町村連合設立，在設有私立小學之地，可以不再設立公立學學。校科較前更見簡單。廢止學區管理人，而另設由居民選出的學務委員。公立小學校的修學年限本為八年，以縮短至四年，每年授業期限要四個月，因此，義務教育的年限，規定為十六個月以上。除去全國劃一的束縛，盡量使各地方自由選擇。甚至有如下的規定：即縱使不入學校，而有以其他方法受普通教育，亦即以就學看待。

改正教育令的發布與變遷。但是這種自由的制度，和日本的教育上的根本方針並不一致。且因地方的自治制度尙未完備，過於自由實足以招到教育的衰微，於是在明治十三年二月間，田中不二麻呂因責任問題的追究，不得不調任他職。文部省即於是年十二月，改正教育令，規定各町村必須單獨或聯合設立小學校，就學義務年限延長爲三年，學務委員的選任應從嚴格。但國庫補助自此時起廢止，實是一種退步。翌年即明治十四年四月，福岡孝弟任文部卿。是年五月，爲欲統一向來由各小學校任意規定的教則起見，發布小學校教則綱領，以爲教育令的補充。這時候，小學校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種，前二者均各三年，高等科則爲二年。

關於中學校，也於明治十四年七月，發布中學校教則大綱，規定中學校兼具高等普通教育及大學豫備科之目的，初等科爲四年，高等科爲二年，並整飭以前複雜的內容。但高等中學科，即不設置亦可。此外，亦可設置普通文科、普通理科及農工商的專修科。女子的中學教育，向來不甚發達，到了明治十五年，在東京女子師範學校中設附屬高等女學校，以代替明治十年廢止的東京女學校，而所施的教育漸次適合於日本的國情。當時在櫛木、岐阜、德島等數縣，已設有女學校，逐漸模倣官

立的女學校，而設法加以刷新。但因女子教育的需要尙未爲一般所理解，所以女子教育歷時許久未能迅速普及。

關於師範學校，教育令是強制府縣設立的，明治十四年八月，並發布關於師範學校的教則大綱，將以前各府縣分歧的教則統一起來，而且與小學校相一致，分爲初等、中等、高等三科，俾便養成小學校各科的教員。並爲養成中等教員起見，在東京師範學校的中學師範學科之外，於明治十一年設體操傳習所，於明治十二年設音樂考察課，以圖養成體操及音樂的教員。

文部省如是努力振興教育，所以在明治十五年左右，已經收到相當的成效。府縣立的專門學校及實業學校，也逐漸設立起來，又於明治十六年，頒布醫學校通則及藥學校通則，明治十六年，頒布農學校通則，明治十七年，頒布商業學校通則。

至明治十二年，並頒布學位令，規定授與大學畢業者以學士號，是爲學位，明治十六年，授與大學畢業者以「得業士」的稱號，其後對通過試驗者均給予學士號。

教育令的再改正 明治十六年十二月，大木喬任任文部卿。而自明治十七年起，經濟界連年

遭受不景氣，爲節減經費起見，於明治十八年八月，將改正教育令再度修正，規定在無力設置小學校的町村，可以使用社寺或民家的一部以爲小學校舍，並許可設立半日學校及夜間學校。以前小學校的徵收學費與否可以隨便，新教育令則規定必須徵收。此外，並廢止學務委員。但此項新教育令僅歷八個月即行廢止，所以在實際上殆未發生任何效果。當時更將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合併於東京師範學校，各府縣立的女子師範學校，合併於各該師範學校。

私學的狀況 明治時代的私學，和以前不同，以教授法學者爲多。明治十二年，有和佛法律學校（現在的法政大學）的設立，翌年即明治十三年七月，以政府發布刑法及治罪法爲契機，有專門教授經濟法制的專修學校的設立，翌年有明治法律學校（現在的明治大學）及東京專門學校（現在的早稻田大學）的設立，以培植立憲國民的素養。特別是東京專門學校，是大隈重信於明治十四年脫離政界，完全以學術獨立的立場，以期養成學生獨立自主的風氣而於翌年所創立之學校。

其他特殊教育，這時候也見發達。在前述的學制中，雖有廢人學校的名目，事實上並未設立。到

了明治十一年，京都方面有私立盲啞院的設立，這是盲啞學校之最早者，翌年改爲京都府立。明治十三年在東京設立的共立訓盲院，至明治十八年，由文部省直轄，即是現在的東京盲學校和東京聾啞學校的前身。

教育會與教育雜誌 教育會以明治九年第一大學區的學務吏員、學區管理者及學校教員的集會，協議教育設施要項爲始，而私立的教育會，以明治十六年組織的大日本教育會爲嚆矢，該會其後改爲帝國教育會。其後各府縣及各大都市，多次第成立教育會。至於教育的雜誌，其始由文部省於明治十年發行，到了明治十六年，發刊帝國教育，明治十八年，發刊教育時論，其後各種雜誌，相繼發行，與教育會對教育事業同具偉大的貢獻。

當時的道德思想 明治初年以後，忙於西洋文物的輸入，歐化主義，極爲發達，於是極度重視知識，教育也偏重於知育的訓練。結果，不惜破壞日本舊時的文物，並且忽視修身彝倫，甚至傷害國民道德。其時適逢明治七年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有設立民選議院的建議，明治十一年有板垣退助的結成愛國社，並提倡自由民權之說，於是希望議院政治之聲，洋洋盈耳，自由思想，

風靡天下。政府也認爲將來應行議院政治，遂於明治十四年十月，由明治天皇頒下詔書，勅准於明治二十三年，召開國會。

文部省爲防止煽動民心以妨害治安的自由主義，及偏重知育而足以招致輕視道德的弊害起見，乃從教育界方面以講求種種對策。遂於明治十三年三月，在文部省設置編輯局，使其從事編纂中小學校的教科書，並使地方學務局調查民間出版的教科書，而公佈其良否。這便是日本教科書核定制度的開始。同年十二月，更令府縣注意不可採用有害治安紊亂風俗的教科書。在翌年五月頒布的小學校教則綱領中，將修身科置於各項教科的首位，增加該科教授時間爲三少時，每半小時爲一節，共計六節。排列修身科於各項教科的首位的習慣，嗣後未曾更變。是年六月，福岡文部卿發布小學校教員須知，明確提示德育的應予尊重及尊王愛國的精神。此項須知，今尙實行。翌年即明治十五年十二月，明治天皇頒布勅選的修身書幼學綱要於各學校，曉諭明倫修德之要，且曾於是年一月對軍人頒下勅諭，令其重視武德尤應在武藝之上。

明治十五年，在伊勢的大廟中設神宮皇學館，在東京設皇典講究所，在東京大學中設古典講

習科，翌年更設中國古典講習科。這時候，在民間，國粹主義也次第昌盛，如西村茂樹的發起日本弘道會等，總之，對於物質的歐化主義，漸起反感，世人的重視國民道德及尊重古時文物的思想，逐漸顯著。

教育之學的研究 當明治八年爲調查師範教育起見，伊澤修二（二五一—二五七七）和高嶺秀夫（二五一四—二五七〇年）有美國之行，二氏於明治十一年歸國，任職於東京師範學校，以前的教授法，是注入式的，僅是教科書的講讀而已，而伊澤、高嶺二氏，介紹當時美國盛行的裴斯托洛齊的啓發的教授法，極力提倡應當啓發兒童的自然性。伊澤修二於明治十五年出版教育學二冊，日本人所著教育書籍以前雖非無有，但讀者之衆以及影響的深遠，當以此書爲始。

外國教 文獻之經介紹者，在前此以美國的爲主，但此時則以英國的爲多。現在將其中重要的記述如下：英國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一八二〇—一九〇三年）的教育論（Education），由尺振八譯成須氏教育論一冊（明治十三年），並有有賀長雄全譯的標註斯氏教育學

二册（明治十九年）英國倍因（A. Bain 一八一八——一九〇三年）的科學的教育（*Education as Science*）由添田壽一氏譯成倍因氏教育學三册（明治十六年）蘇格蘭基爾（J. Gill）等的著書，由西村貞譯述而成小學校教育新論五册（明治十四年）此外尚有美國的，如霍諾特（J. Johnnot 一八二三——一八八八年）的教授之原則與實際（*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由有賀長雄譯出，書名如氏教育學二册（明治十七年）又有由高嶺秀夫譯出的教育新論四册（明治十八年）如霍諾夫之著述，是闡述啓發主義的教授法的，所以當時極受讀者的歡迎。若林虎三郎、白井毅兩氏編纂的改正教授術（明治十六年）依據在美國推廣裴斯托洛齊主義的希爾頓（Sheldon）的著書而寫成，也是闡述啓發主義的，此書亦受廣大讀者的歡迎。在此種情形之下，啓發主義，幾有風靡天下之勢。

以前的教育書籍，以求其立即適用於實際的常識性質的爲多，但到了此時，像上舉各書，却已是系統整然的學術的著述了。再者，斯賓塞等的學說，是以知育爲主的，而裴斯托洛齊的啓發法，也注意於知育的啓發，所以當時的思想界，大部信任科學萬能以及功利主義。

第五節 國家主義教育的確立

各種學校令的頒布，第三期教育令（明治十八年八月時代）還是教育制度的試驗時代。前後僅六年間，而法令的更改，達三回之多。最後的教育令，爲適應經濟界的情況起見，承認以簡易方法實施教育，但這決非適合國家進運之道，而改正以前的教育令以樹立更進一步的制度，實屬必要，故於明治十八年十二月改革官制創設內閣制度，任命森有禮爲文部大臣，於是努力於教育制度的改革。

森有禮（二五七六一—二五四九年）是鹿兒島的藩士，於慶應元年十九歲時，赴美國留學，明治元年歸國，供職外交界，明治六年，和福澤諭吉、加藤弘之、西村茂樹等，創立明六社，努力於文化的促進。他對於教育事業，研究有素，所以於明治十八年十二月，任文部大臣，注力於教育制度的改善。

翌年即明治十九年，由於有禮的努力，在是年三月，以勅令發布帝國大學令，又於是年四月，以

勅令發布師範學校令、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及諸學校通則。今日的教育法規，多係淵源於是。此等學校令，便可以說是構成了現代教育發達的新基礎。根據此等法令，以組成一貫的學校系統，即是小學校、中學校及師範學校，均各分尋常及高等二科，畢業於高等小學者，經尋常中學校及高等中學校，進入帝國大學；或經尋常師範學校，進入高等師範學校。且自明治初年以後，政府的教育方針，極注意於國家本位。這一點，即在以儒教為基礎的江戶時代，已見端倪，而森文部大臣時所發布的學校，尤具顯著的特色。列如規定帝國大學以教授適應國家需要的學術技藝並攻究其蘊奧為目的，即其一證。

小學校分尋常及高等二科，修學年限各四年，以尋常小學校的四年為義務教育期間，但視地方的情形，得以修學年限三年的簡易科代之。至於教科，在尋常小學校，以修身、讀書、作文、習字、算術、體操為必修科目，以圖畫、唱歌、裁縫（女兒）為選修科目。在高等小學校，以修身、讀書、作文、算術、地理、歷史、理科、圖畫、唱歌、體操、裁縫（女兒）為必修科目，以英語、農業、商業、手工為選修科目。教科書僅許使用經文部大臣檢定的。小學校的經費，以徵收學費及捐款為原則，其不足之數，規定由町村

支付。此種對於國民教育，實亦不無遺憾，但從當時的財政狀態看起來，實在也是不得已的事。

中學校也分尋常及高等二科，修學年限，尋常中學校爲五年，高等中學校爲二年。尋常中學校，限每府縣各設一校，高等中學校由文部省直轄，全國設五校。自學制頒布以後，中學校得以任意設立，其間大部分都不完整。經明治十四年的中學校的教則大綱予以淘汰的很多，更經明治十七年頒布中學校通則加以取締後，於是逐漸減至府縣立七十六校，町村之五十四校，私立二校。而森文部大臣更決定裁減至每府縣各爲一校，並積極充實其內容。至中等校的高等學校則僅以官立爲限。

國運的發展，有賴於普通教育的振興者極鉅，而普通教育的振興，又有賴於師範學校的進步。森文部大臣有鑑及此，所以力圖師範學校的改善。以前府縣立師範學校是無限制的，自森文部大臣時起，規定一府縣設立尋常師範學校一校，而督促其努力充實內容。並規定師範學校校長得兼任府縣的學務課課長，俾使普通學校易收統一之數。對於師範學校的生徒，除養成順良、信愛、威重等三種德行之外，獎勵從事兵式體操，並使之入住軍隊式的寄宿舍，俾便造成剛健及規律的習慣。

高等師範學校即以從前的東京師範學校改辦，主要的目的，在於養成尋常師範學校的教員。同時，以東京女子師範學校爲高等師範學校的女子部，以養成尋常師範學校女子部的教員爲目的。再者，明治十七年八月，曾頒布中學校師範學校許可規程，但明治十八年的新令中，對於中學校教員的養成一項，未經提及，所以於明治二十二年，更規定中學校教員，由帝國大學的文科和理科以養成之。

至於大學，於明治十八年，將原屬司法省創設的明法寮演變而成的東京法學校，合併於法學部；經理學部中分出工藝學部；將文學部中的政治學科歸入法學部，並將法學部改爲法政學部。翌年即明治十九年，帝國大學令發布，將以前的東京大學和工部大學校，合併而成帝國大學。帝國大學內設大學院和法醫、工、文理五科。其後，於明治二十三年，合併東京農林學校而增設農科大學。至東京農林學校，則是在明治十九年，合併明治七年成立的駒場農學校和明治十年成立的山林學校而成的。

教育勅語 當時的政府，在外交上急於博得外人的歡心，屢屢與外人共同舉行跳舞會等專

心於皮相的西洋模倣；世人也都熱心於西洋物質文明的吸收；因此，歐化主義就極爲昌盛起來。特別是在明治二十年前後，歐化主義最稱發達，此種情形，有害於往昔良風美俗者甚鉅，其在另一方面，則國粹保存主義，却也漸漸蓬勃起來。尤其是明治二十一年，三宅雪嶺氏、志賀重昂、杉浦重剛、井上圓了等，組成政教社，出版日本人雜誌，極力以國粹論反對歐化論。到了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更有帝國憲法的頒布，翌年十月三十日，又有關於教育的勅語的下賜，由是不論在政治上及國民道德上，均已確立根本方針，輿論也趨於中正，思想界的不安動搖，至是遂告滅絕。

宗教與教育的關係問題 因歐化主義而最受益處的，是被視爲文明宗教的基督教。原來基督教乘歐化主義擡頭的機會，積極布教，像明治學院、東北學院、關西學院、東洋英和學校、宮城女學校、廣島英和女學校等基督教的學校，相繼設立。但至明治二十二年以後，歐化主義式微，而國家主義大昌，到了明治二十五年，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井上哲次朗氏攻擊基督教，指摘該教與教育勅語及國體不符之點。因此，基督教不得不斂其鋒芒。明治五年所訂定的學制，對於在學校內宣傳宗教教旨，已加限制，此項方針，其後日益嚴格化，終於到了明治三十二年八月，文部省發布訓令，規定

一般學校，不得舉行宗教儀式及實施宗教教育。

小學校令的改正 自明治二十二年四月起，施行「市町村制度」為適應此項制度起見，於明治二十三年十月，訂定地方學事通則，以改正小學校令。小學校令的第一條是：

小學校以留意兒童身體的發達，並授以在道德教育及國民教育的基礎上及其生活上所必需的普通的知識技能為本旨。

並規定尋常小學校的修學年限為三年或四年，廢除簡易科；高等小學校的修學年限為二年、三年或四年；尋常科和高等科，都得設置三年以內的補習科；經費的來源，原來以學費為主體，但現在改由市町村支出，學費歸入市町村收入項上；並設郡視學，使執掌郡的視學事務，市町村設學務委員。於翌年即明治二十四年十一月，更發布小學校教則大綱，制定各教科的程度及要旨。

國粹主義的教育與實業教育 明治二十六年三月，井上毅（二五四〇——二五五五年）任文部大臣，以國家主義和國粹主義為目標，致力於教育的發達，繼森有禮的後，在教育界立下偉大功績。他於弘化元年生於熊本。以制定法令為其主要的功績，而對於振興實業教育的努力，亦有

足多者。他又極力排斥由西洋崇拜而來的重視外國語學習的學風，督促注重國語及漢文的教授，並倡導修身教育。認為國家的興隆，繫於實業教育的振興，遂於明治二十六年十一月發布實習補習學校規程，又於翌年即明治二十七年發布實業教育費國庫補助法及工業教員養成規程，以期普及科學與技術互相配合的教育。

高等學校的改正及其他 明治二十七年六月，由於井上文部大臣的努力，而有高等學校令的頒布，將以前的高等中學校，改為高等學校，以教授專門教育，置四年程度的醫學部、法學部、工學部之一或二，此外併置三年程度的大學豫科。但此項措施，結果顯見失敗。因應當處於從屬地位的大學豫科，反形發達，而專門部大體上未克成功，或歸廢止，或成了獨立的學校。自明治二十六年五月起，「町村組合」得設置尋常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自明治二十七年起，許可中學校畢業生入高等師範學校。再者，在以前，畢業於高等小學校者，始可升入尋常中學校，但自明治二十七年九月起，修了高等小學校第二學年者，即可升入尋常中學校，在學校系統上，節省了二年的歲月。

私學 在此期間，私學也大見進步。慶應義塾於明治二十三年一月，增設大學部，發揮了自主

獨立的學風。同志社也產出了衆多的人材。新島襄（二五〇三——二五五〇年）在同志社中所施的教育，是崇尚基督教主義的，所以對於歐化主義、雖具根柢，並以宗教爲德育的根本，對功利主義，則予以反對。

新島襄生於上野安中藩之家。學習測量術及航海術，仕於幕府，元治元年（二五二四年）往遊北美合衆國，研究基督教。有志於以宗教教育改善日本的教育，於明治七年歸國，翌年與其同志創設同志社於京都。

其他，像東京專門學校，於明治二十三年，創設文學部，不久即成文藝界的重鎮；哲學館是明治二十年，井上圓了根據帝國大學文科大學之制，爲振興東洋各種學術而創設起來的；國學院是明治二十三年，在皇典講究所內創設起來的。至在基督教方面，於明治十六年設青山學院，明治十九年設明治學院及東北學院，明治二十一年設關西學院等。在佛教方面，自江戶時代起，各宗教備有宗教機關，其後適逢國粹運動興起，並鑑于基督教的教化事業的成功，而從事於改革教育事業，明治十五年，曹洞宗建大學林，真宗大谷派設真宗大學寮，明治十七年，真宗西本願寺派創設可使僧

俗共同入學的學校，至明治二十一年，改設養成僧侶的大學林，淨土宗則早於明治三年設有大學林，至明治二十年，仍改設宗學本校。

教育學的研究 明治二十年左右，啓發主義，漸見式微，其時，能勢榮（二五一二——二五五五年）介紹法國康拜來（Compaire 一八四三——一九一三年）的學說，對於以前的功利的知育本位的教育，主張調和知情意三方面而促其發達，並主張將實利和道德折衷起來。

能勢榮生於舊幕臣之家。明治三年渡美，明治五年就學於俄勒岡州的派斯斐克大學，明治九年畢業歸國，歷任岡山縣師範學校及其他學校的教師，明治二十年任文部省書記官。明治二十一年，根據康拜來的學說，著成教育學一書，抑稱此書實為日本有組織的教育學之始。當時適值企圖調和歐化及國粹兩種主義並開始並重知德二育的時候，因此該書大受歡迎，直至介紹赫爾巴爾特的學說，乃漸失其勢力。

當時的歐化主義，大體有三：一是英國及美國式的功利主義，大隈重信、福澤諭吉等為其代表；二是法國式的自由主義，板垣退助、中江兆民等屬之；三是德國的國家主義。當時，新興的德意志帝

國，國運大昌，而俾斯麥尙方圖發展。當時適值日本起草憲法之時，因國情較爲類似，且德國方興未艾，其間足供參考之處頗多。故從這時候起，政治以及其他各方面，很有不少的地方是學習德國的。森文部大臣的主義，亦諸多私淑德國國家主義之點。到了明治二十二年，請德人好斯克乃希特（Hausknecht）一八五三——一九二七年）在帝國大學講授教育學，他介紹海爾巴脫（Herbart）派的學說，於是日本的教育學的研究，也逐漸離開英、美的學風，而學習德國的學風。

原來，所謂歐化主義，不外在促進日本文化的發達，從這一點上看起來，歐化主義和國粹主義均係憂慮國民道德的日趨頹廢而竭力圖謀國家將來的安全，其目的正復相同。因此，兩種形似相反的主義，自國家主義的教育倡導以後，就逐漸成熟了調和的機運。海爾巴脫的教育學說，以陶冶品性爲教育的主要目的，此層足補救以前的歐化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弊點，而且，海氏的祖國德國，原爲西洋的一國，所以歐化主義的長處，依然可以保存。

好斯克乃斯特渡日後，在帝國大學招收教育學科的特約生，以造就高等中學校及尋常中學校的師資。海氏門下有文學博士谷本富氏者，最爲傑出。當時雖非就學於好斯克乃斯特的人，但當

時凡研究教育學的人，都是研究着海爾巴脫的教育學說的。

現在將海爾巴脫特派的人們的著書，已經譯出的，敘述如下：克倫（Korn）一八二〇——一九九一年）的教育學綱要（Grundriss der Pädagogik），是爲供應教科書而作，內容極爲扼要，即在德國本國，也極受歡迎，日本方面，有三種譯本，即是譯柳政太郎、立花銑三郎合譯的普通教育學（明治二十五年）、山口小太郎譯的教育精義（同年）、國府寺新作譯的克倫教育學（明治二十六年）。倫瑙（Lindner 一八二三——一八八七年）的教育學教科書（Lehrbuch der Pädagogik），經湯原元一氏譯成倫氏教育學（明治二十六年）。弗勞立（Frohlig）的科學的教育學（Die wissenschaftliche Pädagogik），經岡田五兔氏譯成同名的書（明治二十五年）。萊因（Rein 一八四七——）的教育學綱要（Pädagogik der Grundriss），經能勢榮譯成萊因氏教育（明治二十八年）。至海爾巴脫（一八七四——一八四一年）本人的書有教育學主義綱要一書（Umriss Pädagogischer Vorlesungen），經藤代禎輔譯成赫爾巴兩特教育學（明治二十八年）。

研究海爾巴脫教育說的著述，也有很多，其中最佳的，是谷本博士的實用教育學及教授法（明治二十七年）科學的教育學講義（明治二十八年）及教育學講義速記錄等（明治二十九年）。這三書，對於當時教育學界，貢獻極大。說是教育學在日本真正具有組織，係由谷本博士的科學的教育學講義一書始，當非過言。迨甲午戰役以後，海爾巴脫派的學說，漸見式微，新的學說，逐漸興起，但對於日本教育界影響的深遠，終未有如海爾巴脫的學說之甚者。

現在再將海爾巴脫派以外的著書的翻譯，敘述如下：赫智爾派的魯森克蘭齊（Roseikranz 一八〇五——一八七九年）的組織學教育學（Die Pädagogik als System）經國府寺新作譯成魯氏教育學（明治二十年）。洛克（一六三二——一七〇四年）的教育意見（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經大日本教育會譯成洛克氏教育思想（明治二十七年）。埜質斯（Dittes 一八二九——一八九六年）的教育教授學綱要（Grundriss der Erziehung-Unterrichtslehre）經藤代禎輔譯成埜氏實踐教育學（明治二十七年）等。但這些書籍的介紹，在當時的教育界，僅是一種支流而已。

第六節 甲午戰役以後的教育

制度的改善 明治二十七八年之戰役（甲午戰役），日本戰勝中國，發揚國威。其原因強多，而國民教育的普及，確是重要的原因，因為這樣，所以此後教育界也驟見隆盛之勢。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山縣內閣成立，樺山資紀任文部大臣，奧田義人任次官，上田萬年氏任專門學務局長，澤柳政太郎任普通學務局長，岡田良平氏任實業學務局長。於是，當明治三十二三年，日本的文教，就盛極一時。貴衆兩院，並向政府建議將中國賠款之半數，移供普通教育之用，政府採取此項建議，於明治三十二年，撥出賠款中的一千萬圓，作為教育基金，而以其利息，作為普通教育經費。從此小學校兒童的就學率，急速增加，各種學校，屢有增設，尤其是以前比較忽視的女子教育和實業學校，更有顯著的進步。

明治三十三年八月，頒布現行的小學校令，同時並制定施行規則。合讀書、作文和習字之種為國語科，限用漢字約一千二百字，「假名」的字體歸於一律；此種規定，對於國語、國字問題，得到相

當的解決。這也是因戰勝而來的國民自覺的一個表現。此外並規定減少各教科的教授時數，義務教育的年限爲四年，學費以不徵收爲原則。師範學校方面，於明治三十年十月，將以前的師範學校令予以改正，尋常師範學校僅稱師範學校，取消以前一府縣限設一校的限制，以適應小學教育的進步，又將女子部改爲獨立的學校。且將前此高等師範學校，僅以養成師範學校教員爲目的者，改爲養成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等教員。明治三十三年，制定現行的教員許可令及教員檢定規程。檢定規程至明治四十一年，經修改而成現在之所實行者。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將尋常中學校改稱中學校，頒布現行的中學校令，更於明治三十四年頒布中學校令施行規則，至明治三十五年頒布中學校教授要目。關於高等女學校，曾於明治十九年的中學校令中有所規定，到了明治二十八年一月，制定高等女學校規程，明治三十二年二月，頒布現行的高等女學校令，明治三十四年，頒布高等女學校令施行規則，明治三十六年，頒布高等女學校教授要目。

隨着國力的發展，實業教育就勃興起來，因於明治三十年十月，在文部省中設置實業學務局，於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制定實業學校令及工業學校規程、農業學校規程、商業學校規程、商船學校

規程，於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制定水產學校規程，明治三十五年一月，制定實業補習學規程，明治三十七年三月，制定徒弟學校規程。關於私立學校的管理，曾於明治三十二年八月，頒布私立學校令及施行規則，對於設立手續、校長教員的身分及設備等，均有所規定，如果認為在教育上有妨害時，府縣知事便得命其改變設備及授業等，必要時且得勒令關閉。又隨着中等教育的發達，中學校畢業生，頗多希望更進一步以學習高等的學術技藝者，於是在明治三十六年三月，頒布現行的專門學校令，規定修學年限為三年以上，入學資格為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畢業以上。私立學校令和專門學校令，使私立學校，大形發達。

關於學校衛生方面，明治三十九年，曾在文部省中設置學校衛生顧問會議，並設學校衛生主事，於明治三十三年，設學校衛生課。明治三十一年一月，規定學校清潔方法，翌年即明治三十一年，公布學校醫職務規程及學校傳染病及消毒方法。明治三十年三月，制定直轄學校衛生身體檢查規程，明治三十三年，更將此項規程普及於一般學校。明治三十三年的小學校令施行規則中，列有關於學校的設備標準，而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規定，但其後因經費問題，此項

設備標準，頗受非難，乃予以廢止。

就學的進步與學校的增設 小學校的校數，殆無若何增加，且明治二十七八年較諸明治十三年左右，反見減少，但就學率却有顯著的進步。當明治十一年，就學率男女合計，為百分之四十一，明治二十七年，為百分之六一·七，明治三十六年，為百分之九三·二〇。女子的就學率也大見增加，在明治三十六年，較諸男子，僅少百分之七。

中學校經森文部大臣整理的結果，明治二十三年，公私立中學減少為五十四校，但頗能順利發達，明治二十七年為八十一校，生徒二二三三一人，明治三十六年達二六八校，生徒九七六六一人。高等女學校的發達，更為顯著，明治二十七年公私立十三校，生徒二〇二六人，明治三十六年為九十校，生徒達十一倍之多，計二五三八六人。至於實業學校，明治二十七年公私立二十七校，生徒三五八〇人，其後顯著發達，明治三十六年，計有三十六校，生徒達三一六三人（實業專門學校及實業補習學校除外）。

專門學校以上的學校，由文部省直轄的，有明治二十九年在大阪設立的工業學校，明治三十

年四月在東京設立的外國語學校（高等商業學校的附屬學校）是年六月設立的京都帝國大學、明治三十三年在岡山設立的第六高等學校、明治三十四年在鹿兒島設立的第七高等學校、造士館、明治三十五年設立的廣島高等師範學校、盛岡高等農林學校、神戶高等商業學校、京都高等工藝學校、及五所臨時教員養成所、明治三十六年在福岡設立醫科大學（當時是京都帝國大學的一部）、明治三十八年改山口高等學校爲高等商業學校、又在長崎設高等商業學校、在名古屋設高等工業學校。此外，京都、大阪、愛知、熊本的公私立醫學校，均承認其爲專門學校。

私學之新設立者，除明治三十四年在東京設立的日本女子大學校之外，並無知名的。至於以前設立的私學，則依據專門學校令提高或改善其內容；對於無法適合專門學校程度者，則令其廢止；因此，私立學校，內容大見改良。而於明治三十五年，承認東京專門學校改稱早稻田大學，其他私立專門學校，亦多倣行：東京法學院改稱中央大學，和佛法律學校改稱法政大學，明治法律學校改稱明治大學，日本法律學校改稱日本大學，京都法政學校改稱京都法政大學（現在的立命館大學），關西法律學校改稱關西大學，哲學館改稱東洋大學，佛法各宗的學校，也多改稱大學。

圖書館 圖書館是社會教育的重要的機關。帝國圖書館於明治五年以東京書籍館開始，自明治三十年四月起，稱帝國圖書館。各地的圖書館，也次第設立，於是在明治三十二年，制定圖書館令，俾資統一。

國定教科書問題 明治二十九年二月，貴族院鑑於小學校修身科，是國民道德上重要的教科，所以提出如下的建議：關於是項教科書，不得委之於民間，而應以國費產生完全的著作；明治三十三年二月，衆議院也有類似的建議，故在明治三十三年，文部省內便有修身教科書調查委員會的設立。其後適值明治三十五年，有教科書事件的發生，就是小學校教科書的發行書肆，對於有決定採用教科書之權的知事、書記官、地方視學官、府縣郡視學、師範、中學、高等女學校等校長，有贈賄之嫌，司法官就着手檢舉，而有多數官吏及教育者均被拘禁。結果，自明治二十七年度起，小學校的教科書，除却少數例外，都係採用文部省的著作。

教育學的研究 甲午戰爭之後，隨着教育的隆盛，關於教育學的書籍雜誌，刊行甚多，而各地教育會的舉行教育講習會，亦極流行，在此種情形之下，教育學的研究，就愈見熱烈了。不過在這時

候，海爾巴脫的教育學說，已經衰替。原來海氏的學說，以重視品性陶冶，爲其優點，但大體上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教育學，所以在國民的自覺達於高潮的當時的教育界，並不適合。爲補救此種缺點，就將挪安普（*Natorp* 一八五四——一九二四年）和倍格曼（*Bergemann* 一八六二——）的社會教育學及屬於海爾巴脫派而富於社會教育思想的衛爾曼（*Wilhelm* 一八三五——一九二〇年）等的教育學說，予以介紹和研究。但關於教授的實際方法，海爾巴脫的思想，依然保持其地位。

此種新傾向，在書籍方面，可以說是由法國福里（*Fouillée* 一八三八——一九一二年）的從國家的見地觀察教育（*L'Enseignement au Point de Vue Nationale*）一書，經久津見恩忠譯成國家教育論（明治二十九年）開始。但因該書僅屬理論，缺少實際方法，所以未受歡迎。明治三十年，谷本博士參酌衛爾曼的教化學的教授法（*Didaktikals Bildungslehre*）和福里的著作，講演「將來的教育學」。其後，倍格曼的科學的社會教育學（*Soziale Pädagogik als Wissenschaft*）亦經介紹過來，熊谷五郎的最近大教育學（明治三十六年）便是以此書爲藍

本的。倍格曼的學說，依據生物學的經驗的立場，便於理解，極受一般人的歡迎，但那妥普的教育學說，是依據新康德派的哲學的，此種哲學，當時在日本尚未周知，因此那氏的教育學說，在當時恐亦未爲所理解。關於教授法，在明治三十二年，有樋口勘治郎的統合主義新教授法的出版，這是兼採海爾巴脫派的統合主義和福祿倍爾的活動主義而成的。

第七節 日俄戰爭以後的教育

明治末年的教育 明治三十七八年，日本爲着和平而與俄國戰爭，因獲大勝，國威爲之大振，戰後在教育上，亦有許多新設施。小學校方面，於明治四十年，規定尋常的學校的修業年限爲六年，以此爲義務教育年限，高等小學校的修學年限，規定爲二年或三年。因年限變更，於是便對尋常小學校中的高年級，加授日本歷史、地理、理科、圖畫、裁縫（女子）並於第一學年起，加授唱歌。

明治四十年，改訂師範學校規程，原來女子師範學校年限較短，現改爲和男子同屬四年。高等女學校，亦自明治四十三年起，爲以學習家政學科爲主者設置實科。此外又於明治四十三年，改正

師範學校教授要目，明治四十四年，改正中學校和高等女學校的教授要目，注重修身、國語、歷史等教科，以鼓勵國民德道的向上。

最近的進步 隨着國運的發展，教育的進步，也異常迅速。

小學校方面，於日俄戰役後，就學率爲百分之九十六，現在已達百分之九十九，雖在遐村僻地，亦無不設小學校之所，由於教育的高度發達，市町村的教育費就大量增加，其經濟負擔，極爲繁重，於是政府自大正七年起，每年自國庫中支出一千萬圓，以充教員優遇及地方教育費之用。其後，此項金額，次第增加，至最近每年支出達七千五百萬圓。

中學校方面，自大正八九年，起，入學者激增。公私立中學校，於明治四十五年，計三一三校，生徒一二八二六一人，到了大正十三年，達四九一校，生徒達二七二九七三人。公私立高等女學校，在明治四十五年，計二九七校，生徒七四三一六人，到了大正十三年，達七四六校，生徒達二七一三七五人。公私立實業學校（實業專門學校及實業補習學校除外），在明治四十五年，計五一八校，生徒七五六六〇人，到了大正十三年，達七三七校，生徒達一八六六〇八人。校數及每校的平均收容力，

雖都增加，但入學難之聲，依然不絕於耳。

官立的專門學校方面，於明治三十九年設立熊本高等工業學校、仙臺高等專門學校、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明治四十年設立東北帝國大學，明治四十一年設立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第八高等學校（名古屋）、鹿兒島高等農林學校，明治四十二年設立新瀉醫學專門學校、秋田鑛山專門學校，明治四十三年設立九州帝國大學、小樽高等商業學校、米澤高等工業學校、上田蠶絲專門學校。

關於高等學校及大學的制度的改革，自甲午戰役告終之時起，已成輿論界討論的問題，政府也於明治二十九年十二月，設置高等教育會議，使之審議學制，明治三十四年菊池大麓任文部大臣後，更努力於獲得改革的方案，後因日俄戰爭爆發，無形中宣告停頓。大正二年，奧田義人任文部大臣，廢止高等教育會議，設教育調查會。大正六年，岡田良平氏任文部大臣，立即設立內閣直屬的臨時教育會議，集各方面的有力者使從事審議，對於小學教育、高等普通教育、大學教育等，都議有成案，當即以此成案為基礎，於翌年重新頒布大學令及高等教育令。規定高等學校以完成男子的

高等普通教育爲目的；以前僅限於官立者，嗣後對公立及私立的，亦一併予以認可；年限爲七年，高等科三年，尋常科四年，亦准僅設高等科。大學以設置數個學部（相當於以前的分科大學）爲原則，但亦准予設置一學部。除官立以外，對公立及私立，均得予以認可；年限醫學部四年以上，其他學部三年以上；又須設置研究科，如設置數個學部時，爲取得研究科間的聯絡起見，可設立大學院。大正七年，原內閣成立，中橋德五郎氏任文部大臣，力謀高等教育機關的擴張，自大正八年以後，新設高等學校十七校、專門學校及實業專門學校三十一校，又專門學校及實業專門學校昇格爲大學者六校。

以前私學都僅爲專門學校，慶應義塾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申請准予昇格，特於大正九年，予以認可，其後私立大學，次第增加，至大正末年，私立大學達二十二校之多。國立的醫學專門學校，亦都昇格爲大學。

高等女學校方面，於大正九年，新設高等科及專攻科，俾使高等女學校本科畢業生得作進一步的研習。又爲適應歐戰勃發以來情勢上的需要，自大正三年起，每年從國庫提出補助費，用以振

與實業教育。且於大正九年十二月，改正實業補習學校及其他各種實業學校的規程，藉以改進實業學校的制度。其他改進師範學校的問題，也是多年討議的懸案，直至大正十四年四月，乃改正其規程，規定本科第一科的年限爲五年並廢止預科而新設修業年限一年的專攻科，對於教授要目，亦略加以改正。

至大正十五年，爲求高等小學校更適切於實際生活起見，對於男兒，增加圖畫、手工、實業三科爲必修科目，對於女兒，除上述三科外，並增加家事一科以爲必修科。

幼稚園以前原視爲和小學校類似的學校，其後幼稚園顯著發達，於是在大正十五年四月，制定幼稚園令及幼稚園施行規則，注意保姆的修養，有接近於託兒所的傾向，倘有特殊原因即滿三歲的兒童，亦可使其入學。

國民精神振作的詔書 因鑑於國民精神的健全，爲國家興隆之本，故於大正十二年十一月十日，頒下振作國民精神的詔書，自詔書下賜後，朝野都努力於聖旨的奉戴。其努力之一，即是設立青年訓練所，以鍛鍊青年的心身，而謀國民資質的向上，到了大正十五年四月，即有青年訓練所令。

及青年訓練所規程的發布。

如上所述，日本的教育，其外形既已非常整飭，其內容亦已較諸歐美實無遜色，但像義務教育年限延長問題、中學校與高等學校高等科的連絡問題等，尚不乏應加改善之點。

教育學的研究 日俄戰爭後，民國的自覺增高。恍然於追隨西洋的後塵有所不足，所以對於力求站在穩實的基礎上以研究教育學的風氣，日趨顯著。明治三十九年，文學博士小西重直氏將萊摩門（Lay Meumann）的實驗教育學說，在雜誌上予以介紹，至明治四十一年，有乙竹岩造氏的單行本實驗教育學的出版。瑞士愛倫凱（Ellen Key）一八四九——一九二六年）的思想特別是關於其所著兒童的世紀（The Century of the Child）一書，亦由小西博士予以介紹，接着大村仁太郎即將該書摘錄出版，定名為二十世紀為兒童的世界（明治三十九年）大村仁太郎且將柴爾曼（Salzmann 一七四四——一八一一年）的三名著蟹的小說（Krebschneckenlein）考來德幾弗（Konrad Kieffer）蟻的小說（Ameisensbüchlein）譯成我子的惡德（明治三十七年）我子的美德（明治三十八年）教育者的教師（明治三十九年）相繼出版。明

治四十五年之際，意大利蒙台梭利的幼兒教育的思想，亦經河野清丸氏等介紹過來。

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三日，頒賜戊申詔書，勅誠戰後浮華輕佻的人心，自是以後，勤儉力行之風大盛。在這時候，德國喀欽斯泰納（Kerschenteiner）的勞作主義的教育學說，亦經介紹過來。

大正三年，世界大戰發生，向來僅依賴德國輸入的染料等的物質的供給，歸於杜絕，日本頗以爲苦，於是高唱理科學的改良及獨創的教育的必要，在此前後，德國歐庚（Eucken 一八四六—一九二六年）的精神生活的哲學，極受贊許，以此種哲學爲基礎的人格的教育學，亦經介紹過來，其主要的祖述者，是中島半次郎。中島氏有人格的教育學的思潮（大正三年）等著作。接着，新康德派的理想主義的哲學，在日本受到熱烈的研究，對於以新康德派哲學爲依據的挪安普的學說，於是重新加以探討。挪氏的哲學與教育學（*Philosophie und Pädagogik*）經田制佐重氏譯出（大正十二年），社會的教育學（*Sozialpädagogik*）經稻垣末松氏譯爲基於批判主義的哲學的教育（學大正十三年）在另一方面，有美國杜威（Dewey 一八五九—）的教育學說

的傳入，自大正七年左右至大正十二年左右，極受歡迎。杜威的民本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經帆澤理一郎氏譯成教育哲學概論（大正八年）自大正十二年左右起，斯普萊求（Spranger 一八八二——）一派的文化教育學，由乙竹岩造、入譯宗壽、長田新諸氏予以倡導，乙竹氏的研究，見於文化教育學的新研究（大正十五年）入譯氏的研究，見於文化教育學說（大正十五年）斯普萊求的生活型（Lebensformen）經過幸三郎氏譯成文化哲學概論出版（大正十五年）

教授法方面，海爾巴脫派的影響，歷時頗久，但自大正初年起，情形完全不同，而注意於創造的自由教育。美國的設計教學法（Project method）及道爾頓制（Dalton Plan）自大正十年左右起，亦經介紹過來，而知能測驗和教育測驗，亦經引用。設計教學法的研究方面，有松濤泰巖氏的全我活動的教育（大正十一年）

綜上所述，可知日本的教育界，不斷地授受歐美新思潮的影響，逐漸獲得健全的發達，且在此期間所創作的名著，也相繼出版。現在將其重要者，略述如下。

教育學方面：

- | | | |
|-----------|----------|--------|
| 教育學精義 | 森岡常莊 | 明治三十七年 |
| 教育學講義 | 大瀨甚太郎氏著 | 同 三十七年 |
| 新教育講義 | 谷本富氏著 | 同 三十九年 |
| 關於教授階段的研究 | 槇山榮次氏著 | 同 三十九年 |
| 學校教育 | 小西重直氏著 | 同 四十一年 |
| 系統的教育學 | 吉田熊次氏著 | 同 四十二年 |
| 實際的教育學 | 澤柳政太郎氏著 | 同 四十二年 |
| 教育的美學 | 佐佐木吉三郎氏著 | 同 四十四年 |
| 現代教育的研究 | 小西重直氏著 | 同 四十四年 |
| 教育學概論 | 野田義夫氏著 | 大正四年 |
| 宗教教育原論 | 谷本富氏著 | 同 五年 |
| 批判的教育學的問題 | 篠原助市氏著 | 同 十一年 |

藝術教育

阿部重孝氏著

同十一年

教育學大全

谷本富氏著

同十二年

教育學概論

佐藤熊治郎氏著

同十二年

最新教授學精義

小川正行氏著

同十二年

學習原論

木下竹次氏著

同十二年

教育精神與體驗

福島政雄氏著

同十三年

新教育學講義

大瀨甚太郎氏著

同十三年

現代教育哲學的根本問題

長田新氏著

同十五年

西洋教育史方面：

歐洲教育史

大瀨甚太郎氏著

明治三十九年

其後又發行續歐洲教育史、最近世歐美教育史。

近代教育思想史

入澤宗壽氏著

大正三年

西洋教育史概說

吉田熊次氏著

同九年

第八章 明治大正時代的教育

歐美教育史 大瀨甚太郎氏著 同 十四年

日本教育史及東洋教育史方面：

日本教育史 佐藤 誠實著 明治二十三年

日本近世教育史 横山達三氏著 同 三十七年

明治教育史 野田義夫氏著 同 四十年

東洋教育史 中島半次郎著 同 四十三年

本邦教育史概説 吉田熊次氏著 大正十一年

第九章 結語

最後，將從太古起以迄今日的教育嬗變情形，作一鳥瞰。

太古時代，尚無自覺的及有組織的教育設施，迨儒佛二教傳入，教育也次第成爲自覺的和有組織的，在聖德太子之時，有留學生的派遣，法隆寺竟成爲學問寺，而留學生之中，有於歸國後開設私塾的。迨天智天皇毅然實行大化改新，在大津建立與宗教無關的學校，該校後來便以成功爲「大學」。惟當時的「大學」，僅爲貴族的修養所而已。到了平安時代的初期，可說是「大學」的最盛時期，中期而後漸就式微，至平安時代之末而消滅。自推古時代以迄平安時代初期，輸入唐代燦然的文化；而日本的文化，也次第發達，當時以注重文藝爲其特色。在宗教方面，也有着美的特徵，所以優美的藝術品，頗多遺留於後世。「大學」以教授漢學和書道爲主，所以當時的漢學，並非如後世的注重倫理，而實以詩文的研究爲目標。貴族則在漢學之外，嗜好音樂和和歌，加以遊惰的貴族

不喜嚴格的「大學」所以私塾極爲發達。

貴族階級，每於花朝月夕，耽於詩歌管絃等優美的生活，對於政治全屬茫然，所以都城和地方，漸呈衰頹。當大寺院置僧兵以自行守護之時，地方民也執武器以自行守衛，而武人化的下民，成爲世襲的階級，這便是武士。其後朝臣也想引用武士以維持其威權，藤原氏也以武士爲其後盾。於是源賴朝以後，經鎌倉、室町時代，在貴族以外，武士也活躍於社會的表面。武士是以參與戰爭爲職務的，所以除須擅長武藝以外，還須篤守忠君、規律、義理、禮儀等道德。沒有武道，是無法戰勝的。這便是武士道發達的理由。而且，武士原是由平安時代中期的不學的地方民勃興起來的，所以武士在開始時是沒有學問的，但成爲政治階級之後，不能再是文盲了。上流的武士，就京都的儒者學習。中流以下的武士，散居全國，因居所的關係，無法隨儒者學習，並且沒有探求高深教育的必要，所以就到寺院去受初步的教育。其目的並非研究佛典，而是學習俗典的初步，但既居於寺院之內，就受了宗教意味濃厚的教育。

武士既以參與戰爭爲職務，所以當武士道衰落時，天下便非再陷於無規律的狀態不可，這便

是室町時代後半期的狀態。其後以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之力，次第統一，而最後的德川家康，認爲欲臻天下於泰平，非藉文教之力不爲功，且酷嗜學問，竭力從事文教的獎勵。因此，在江戶時代，不論幕府或各藩，都盡力於教育事業。佛教因未足供政治的參考，而告衰落，於是，以治國平天下爲理想的儒學，在教育上便大見擡頭。幕府和各藩的學校，都以儒學爲旨。但江戶時代的儒學，和奈良、平安時代的漢學不同，極度注重於倫理。且幕學與藩學，目的在於授與武士以支配階級的素養，所以大體上不許農工商等的入學。至幕府和各藩之建鄉學，以及學者之建私塾，目的雖在使武士及「町人」（商人）入學，但若謂爲已是占着國民大多數的平民的教育機關，殊感不足。平民階級自室町時代起，逐漸擡頭，至江戶時代中期以後，除政治以外，在學問、藝術、經濟等各方面，平民都有壓倒武士之勢，於是平民自己建設教育機關，這便是繼承鎌倉、室町時代寺院中俗弟子教育的系統的「寺子屋」。幕府和各藩的學校、鄉校、私塾，是以儒學爲中心的，其所施行的是道德主義的教育，至於「寺子屋」，則宗教的要素，極爲濃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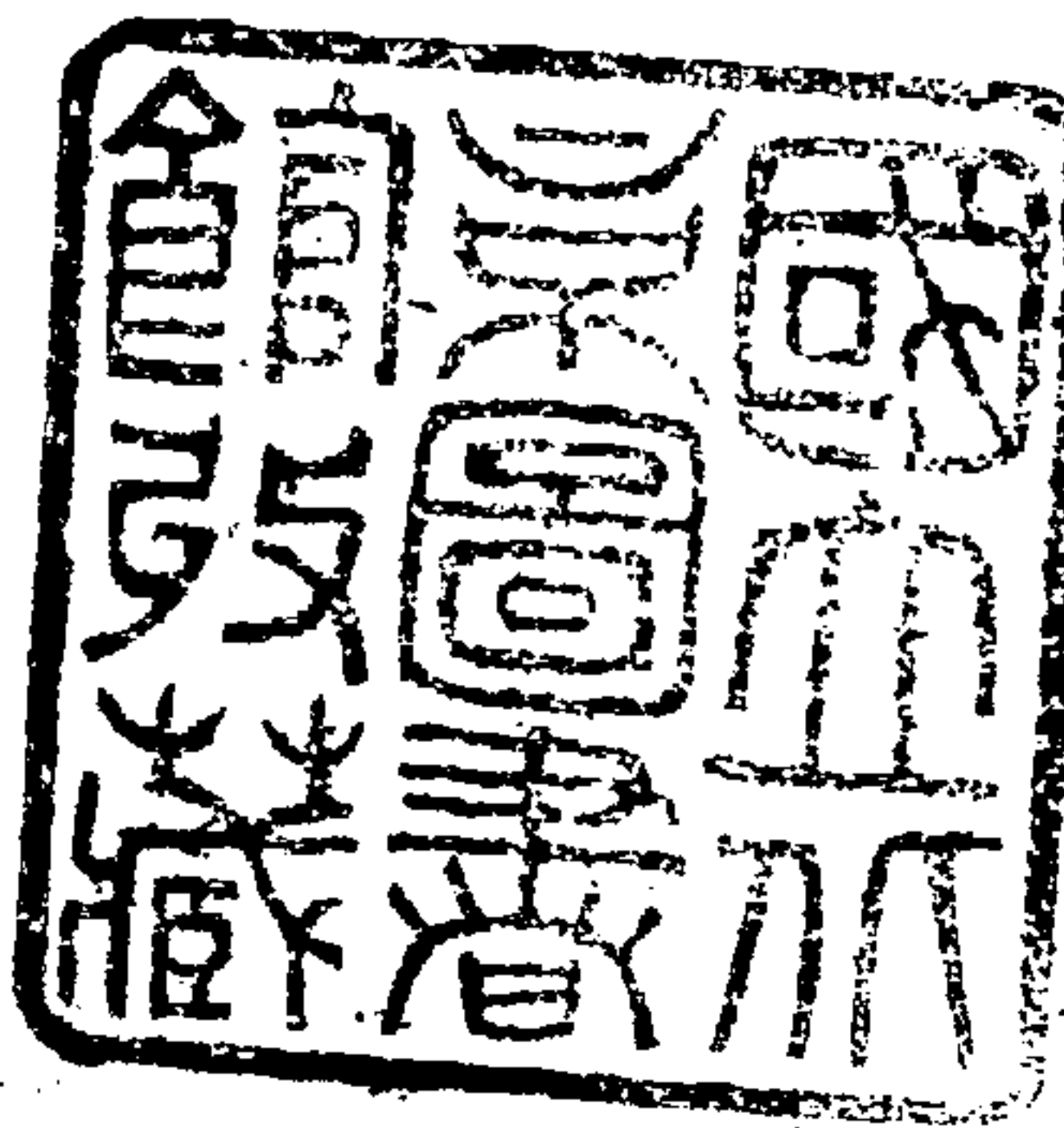
在江戶時代，教育已普及於各種階級，但內因平民的勃興，武士階級趨於沒落，外因歐美的壓

力，江戶幕府趨於崩潰。到了明治時代，階級制度破壞，於是學校組織，爲之大變。原來和西洋和親交通以後，最明晰地映現出來的日本的缺點，是物質文明的缺陷、自然科學的落後，以及商業的不振等。因此，明治時代的教育，就以主知主義的教育、偏重科學的教育、和實利的功利的教育爲主。

再將明治時代以及前此各時代的教育的內容，予以觀察，也可知各時代都具有特點，從其大體言之：奈良、平安時代，是美的教育；鎌倉、室町時代，是聖的教育、健的教育、善的教育；江戶時代是善的教育、政治的教育；明治時代是真的教育、經濟的教育。但教育的內容，實際不能偏於任何一方，而應將各項內容予以相等的重視，這才是真正的教育。至最近的教育，則以普遍注重文化的各種內容爲旨。

再從被教育者的階級觀察：平安時代以前的有組織的教育，以貴族爲主，鎌倉、室町時代擴充及於武士，至江戶時代遂普及於平民，到了明治時代，在教育制度上對於一切階級都一視同仁而無所差別，這就是實行所謂教育上的機會均等。

日本教育史終



張仁叢書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

學術叢書 日本教育史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二元五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高橋俊乘

翻譯者 秦企賢

校閱者 李公鐸

發行者 中日文化協會

南京香舖營二十一號

印刷所 現代印刷公司

總經理處 三通書局

經售處 國內各大書局